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给山姆大叔算一卦



引 言

尽管距离本世纪结束还有几年的时间，但我们无疑是处在一个百年一遇的世纪末时期，处于世纪末期的人类，都有一个难以避免但却可以理解的通病，或者说是心态，那就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特别是对那些惯于从历史发展的长远眼光观察人类命运的人，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热情。

他们看到，20世纪即将过去，新世纪的曙光正在升起！

20世纪是人类历史的一座丰碑，但却是一座正反两面都有着复杂镌刻的丰碑。它表明，20世纪既是科学技术和商品生产充分发展、人类物质文明空前繁荣的时代，又是战乱与灾害频仍、人类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的时代。基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本世纪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此前人类历史上拥有的物质财富的总和，同时，征服的贪欲、政治斗争、民族冲突、宗教迫害、种族灭绝、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以及肆意破坏环境等罪恶行为，也始终伴随着我们，深深地折磨着日益苦恼的“20世纪人”，本世纪单是死于战争和故意屠杀中的人数就有1.6亿之多，大大超过了人类历史上战争和意外死亡的总和。

最近5年来国际战略格局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更具有深刻而持久的意义：它显露出某些征候，预示了世界在下世纪初可能呈现的基本面貌。

1989年东欧剧变，一代强人昂纳克流亡海外，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后死于乱枪之下，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顷刻之间土崩瓦解。那时，踌躇满志的戈尔巴乔夫尚能以一个超级大国总统的身份，在地中海的军舰上同美国总统布什平起平坐，郑重地要求他这位时刻觊觎着东欧形势的美国同行不要轻举妄动，企图从那里的局势发展中渔利。过了不到一年，1990年的10月3日，德国重新统一。尽管这次统一的方式和步伐都让苏联人感到不愉快，但那时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却已失去了将他的“不满”说出口的勇气，更难有行使否决权的壮举。几个月之后，苏联在伊拉克和美国之间的一轮又一轮外交斡旋都告失败，只好坐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它的传统盟国伊拉克进行毁灭性打击。海湾战争结束不到一个月，1991年4月1日，苏联集团的军事堡垒“华约”正式宣告解散，它以前的大部分成员立即开始向“北约”暗送秋波。最后，历史不可避免地走到了1991年12月25日，《明斯克宣言》敲响了苏联的丧钟，列宁塑像被推倒，在克里姆林宫前飘扬了70多年的镰刀斧头旗被扯下旗杆，戈尔巴乔夫走下了他的总统宝座，苏联宣告解体。在戈尔巴乔夫无力阻止东欧的转向、无力阻止两德的统一、无力阻止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的进攻、无力阻止“华约”的解体之后，无情的逻辑必然是，他同样无力阻止苏联的解体。

这一系列急骤的变化，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左右国际关系40多年的两极格局的终结，国际战略格局进入了一个新旧体制转换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世界各种力量在重新组合，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种战略关系在急剧变动，在世界形势总体趋向缓和的同时，武装冲突的爆发日益频繁和多样化。对世界各地那些忧心忡忡的政治家来说，这个过渡时期无异于一个打开了的“潘朵拉魔盒”：从高加索到巴尔干，一向平稳的欧洲开始了持续不断的“地震”；从索马里到卢旺达，从利比里亚到莫桑比克，非洲的战火、饥荒、难民和瘟疫在同时蔓延；从阿富汗到也门，从朝鲜半岛到南沙群岛，亚洲的战火和纷争也在悄悄地发展。1994年9月，在欧洲，波黑

战火愈演愈烈；在美洲，为迫使一位政变军人下台，数千名美军在弹丸岛国海地登陆，开始了美国五年来的第四次海外军事行动；在南美洲，秘鲁和厄瓜多尔两国军队正在边界上激战；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边界谈判再次陷于僵局……与此同时，在世界万花筒的另一端，我们看到了同样重要的变化：不断声称要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的美国，却是债务缠身，囊中羞涩，不得不“借”钱打仗。统一后的德国似乎扔掉了过去的谦逊而变得当仁不让，不但要在欧洲以“马克”打天下，而且要向海外派兵，要争当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在刚刚渡过了空前混乱的一段时期后，宣称要重建其大国地位，要求恢复其传统影响和势力范围。日本虽处在政局动荡和经济衰退中，但却把它的军队派到了国外，在为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进行的游说中，得到了近 50 个国家的支持，在公开要求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地位”时，似乎也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理直气壮。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

这就是 20 世纪末我们所面对的世界。这是一个正在经历深刻变化的世界，也是一个混乱的世界，它不断产生悲剧，但又似乎充满机遇和希望。面对如此情景，每一个关心和思考人类命运的人都不禁要问：世界向何处去？

对本世纪历史的经常性考察使笔者感到，“世界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美国向何处去？”的回答。

然而，预测美国的未来，历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300 年前，在今天的美国东海岸一带，只生活着几十万来自欧洲的殖民者、下层贫民、被迫捕的罪犯和异教徒，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它受英国国王的严酷统治。那时，17 世纪即将结束，18 世纪即将来临，但无论是世界各地的宫廷还是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没有人料到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将起而反抗，挣脱殖民主义的枷锁而取得独立，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200 年前，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刚刚取得独立的新生国家，拥有约 400 万人口和 13 个州，国家的疆界从大西洋沿岸往西，止于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在美国历史学家加尔文·D·林顿编著的《美国两百年大事记》中，1783 年的开篇第一句话写到：“合众国虽已自由，但并不统一，乃是一个由 13 个州组成的松散邦联。”1793 年的评语是：“欧洲战争继续危害美国的团结与安宁。”1794 年写到：“合众国经历了动乱不安的一年。”从这些评语中，可见美国独立初期的艰难和脆弱。那时，在展望新世纪时，包括托马斯·潘恩和托马斯·杰佛逊这样公认的美国思想家在内，甚至没有人预料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美国能取得即使像跨过密西西比河这样微小的进展，更不用说征服蛮荒的中西部到达西海岸、越过太平洋到达远东、上升为一个世界性强国这样大胆的预想了。

在本世纪初的 1900 年，美国已是一个由 7600 多万人口、45 个州组成的强大联邦，国家的疆界横跨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几乎整个北美大陆，当时，作为国家实力重要标志的钢铁产量和制造业占世界总量的份额都位居世界第一，其工业潜力的评估指数也远远超过英国（127/100）。关于这一时期，那鲁大学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他那本剖析最近 500 年来国际列强沉浮的名著——《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写到：“19 世纪后半期到 20 世纪初，在全球实力对比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中，对未来最富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美国的崛起。”但这都只是后来历史学家的结论。在当时，由于美国在总体实力方面

仍不及英国，人们即使预见美国上升为一个世界强国的不可避免性，也未见得就认为它能很快超过英国。但正如历史已经表明的那样，美国超过英国而跃居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变化，在短短 20 年间就完成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帷幕落下后不久，历史上第一次，一向对“新大陆”持傲慢态度的欧洲列强便云集华盛顿，以便按照美国人的设计来重新规划战后世界。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强国地位无与伦比，它在标志国家实力的几乎所有领域都雄居第一：国民生产总值达 2200 亿美元，生产世界一半以上的工业产品，黄金储备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二还多，拥有 1250 万人的庞大军队，其中有 750 万军队驻在世界各地，那时，在展望未来时，没有人预料到后来的美国会在与苏联的疯狂军备竞赛和与德、日两国的经济竞争中逐步走向衰落，但这衰落却在短短 30 年后就成为事实。

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年轻国家的短短 200 多年的历史，充满了变化的活力和出人预料的奇迹。浏览一部美国史，掩卷之后没有沧桑，常常是对难以把握的变化的惊叹。正是这种惊叹，不能不使笔者将预测美国的未来视为畏途。

所幸我们生活在一个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

今天，科技革命的成果正在改变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它不仅日益缩小了世界的未知领域，而且为我们探索世界的未知领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手段。超音速的空中飞行，充分扩展了的全球通讯网络，已将世界各个角落里的国家和人民连成一体，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国家间相互交流的时间和空间，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以高速运转的电脑为手段的测控机制和传播媒介，造成了信息资源的无限扩张和快速更新，使世界变得越来越透明。毫无疑问，这些变化的结果是，世界的可把握性和可预测性增加了，这从而使我们对预测美国的未来略微有些信心。

本书将要展开的论述，就是以笔者目前获得的有关美国的信息为根据，对美国在新旧世纪交替时期的发展趋势所作的一种描述、分析和预测。很自然，这样描绘出来的只能是一个概略的、粗线条的图画，而不是精致、细微的刻画，事实上，任何对未来的预测都难以做到这一点。如果说这件工作是在求解一道方程，那么，笔者所能作的就是尽力求得一个近似值。对此，寄希望于读者能理解笔者为自己的无能所找到的慰藉：历史的发展毕竟不受某种预言的制约，人们都认为历史是苛刻的，但它在对待失落的预言方面也曾表现过少有的宽容。

序

20 世纪即将过去，这是一个世界曾经发生了许多天翻地覆变化的世纪。在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四十多年冷战中饱受痛苦的世界各国人民，无不渴望世界的持久和平，渴望自己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90 年代初冷战结束之时，善良的人们对于世界和未来一时曾满怀希望，但短短几年时间人们环顾现实，不免又深感失望。世界大战的危险减少了，但世界仍然处于动荡中，新的局部冲突持续不断，此起彼伏；世界多极化趋势在继续发展，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恶行仍严重存在，不时引发冲突与紧张；经济正在成为国际关系中占首要地位的因素，国际经济合作有长足的发展，但经济竞争日益激烈，摩擦也在迅速激化，成为新的重要的不稳定因素；科技革命的新高潮正在出现，信息化正在使人们的生活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正在进入新的增长周期，但贫穷与饥饿仍然是世界性现象，有七八亿人（主要在非洲和亚洲）生活在极端困苦之中，而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却反而大为减少了。总之，和平与发展这当代的两大主题，一个都未解决，仍然是世界各国人民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面临的首要任务。

现在，21 世纪已经临近。饱经苦难的世界将向何处去，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我国在本世纪末进入小康水平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后，要在 21 世纪的中期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现代化建设的下一步战略目标。国际环境在新世纪的变化及其前景如何，对此将有重大影响。这需要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单位和国际问题研究人员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细致深入地全面研究，早日得到比较正确的、富有预见性的成果。同时，还非常有必要让广大的工作人员、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对于这些研究成果及时地有所了解。因为更加现代化、更加开放的中国，必须更多地认识新世纪的世界形势。

时事出版社是一个以出版国际问题著作为主的专业出版社，曾经出版很多关于国际问题的学术专著。这次，他们为了向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提供国际形势的变化趋向及发展前景，他们约请一些有一定研究水平的中青年国际问题研究人员，编写出版“新世纪之窗”丛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套丛书将把作者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奉献给广大读者，向读者提供一个观察新世纪中世界向何处去和我国国际环境变化的“窗口”。这套丛书的出版，对加深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解，更清醒地认识我国在新世纪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将是十分有益的。

我相信丛书的出版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黄华

给山姆大叔算一卦

为“山姆大叔”算命

自从“山姆大叔”（美国的绰号）这个形象在 1812 年美英战争中诞生以来，它一直是一个乐观、自信和幽默的象征。

人只有在前途未卜时才算命。因此，“算命”这个词似乎与一向乐观自信的“山姆大叔”的形象不沾边，但本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却着实掀起了一场针对“山姆大叔”的算命热。

1971 年 7 月 6 日，已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演说，战后以来第一次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宣布，当今世界存在美国、日本、西欧、苏联、中国五大力量中心，从而含蓄地承认：美国独霸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世界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演变。然而，一向恃强自傲的美国人并未完全理解这位总统所传达的信息。

时隔不久，阿拉伯人挥舞他们手中的“石油大棒”，将美国推入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在卷入越南 10 年之后被迫撤出越南，以美元支撑的国际货币体系陷于崩溃，伊朗人义无反顾地将听命于美国的巴列维国王逐出境外。这一连串的打击终于使迟钝的美国人似有所悟：也许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并非总是美国说了算的时代。然而，直到这时，美国人对其强国地位面临的衰落仍然停留在将信将疑的阶段。

进入 80 年代，世界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真令美国人跌破眼镜！

1980 年，在世界汽车工业中独占鳌头达 70 年之久（1908—1979 年）的美国，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日本击败，日本成为世界汽车业第一巨头，其产量超过美国 40%。那一年的底特律真是一派颓丧。

1980 年仅有 762 亿美元的美国政府预算赤字，1985 年骤升至 2121 亿美元，到里根政府结束时的 1989 年，已累积达 1.3382 万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近三分之一，为世界各国政府赤字之冠，这一数字竟比美国建国 204 年间累积政府赤字的总和还多。

1981 年时，美国还是拥有 1400 多亿美元对外债权的世界最大债权国，仅仅 4 年之后，1985 年美国就沦为对外负债达 1119 亿美元的世界最大债务国，至 1987 年底，对外负债累积近 4000 亿美元。有人惊呼，世界上出现了“购买美国”的狂潮，美国人一向引以为自豪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纽约埃克森中心的摩天大楼，华盛顿的联邦通讯委员会大楼在一夜之间易主，变成了外国人的资产。大部分美国人难以接受这一事实。

从 1893 年至 1970 年的 80 年中，美国的对外贸易一直是盈余的，1971 年出现本世纪的第一次逆差，直到 1980 年逆差也只有 322 亿美元。1984 年，美国的外贸逆差突破 1000 亿美元大关，至 1987 年底，累积逆差已达 8615 亿美元。

这终于导致了 80 年代中期以来的一场全球性的大辩论：美利坚合众国，兴耶？衰耶？

企业家、大学教授、政府官员纷纷上阵，搜集资料，著书立说，加入了这场空前的大辩论。一时间，人人都在为“山姆大叔”算命。

1983 年，约翰·奈斯比特出版《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向》；1987 年，保罗·肯尼迪出版《大国的兴衰》，克莱德·普雷斯托韦茨出版《交易场所》；1989 年，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出版《大失败》，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1993 年，塞缪尔·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爱德华·路特

维克出版《处在危险中的美国梦：如何阻止美国沦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及如何赢得旨在确保经济优势的地缘经济斗争》；1994年，尼克松“临终遗言”，基辛格再撰新著《外交》……

这些著述或多或少都涉及了美国的兴衰问题，为“山姆大叔”算过命。既然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为“山姆大叔”算命一类，因此，在展开本书的论述之前，我们很有必要浏览一下这些著述中的主要观点。

保罗·肯尼迪：美国必将衰落

在众多论述美国兴衰的著作中，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所著《大国的兴衰》一书是最具代表性的，他是唯一将美国的兴衰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进行全面考察的人，因此，也是最深刻的论述。

1945年，当美国力量处在世界顶峰之时，保罗·肯尼迪在英国北部出生。在他于英国求学和在欧洲各国的教授生涯中，既亲身经历了不列颠帝国的彻底衰落，也捕捉到了美国步英国后尘的种种迹象。1983年，当他离开英国，受聘为美国耶鲁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后，便开始从帝国兴衰史这一独特的角度考察美国的历史与未来。1987年，这一考察的结果《大国的兴衰：1500年至2000年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一书问世。

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对奥斯曼帝国、中国、西班牙、英国、沙皇俄国、苏联、日本、美国等历史上的大国和强国500年兴衰之路的考察，认为“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而在国家实力与军事扩张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外征服与领土扩张既可造成帝国力量的勃兴，也可将一个强大的帝国拖入“泥沼”，直至最后走向衰亡。他指出：

“财富通常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获取和保卫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将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

“帝国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使地区扩展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致使自己日益衰落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持过于庞大的军队。”

基于这一论点，作者认为，目前的美国，也正像1600年前后的西班牙和1900年之后的英国一样，处在“帝国战线过长”的危险中，由于从历史上继承了大量难以履行的战略义务，它的强国地位正面临着两大考验：在军事和战略领域，能否在防务需求和履行义务的手段之间保持平衡；在国家经济基础方面，能否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继续保持技术优势。而美国看起来并没有准备好应付这两大考验，因此，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也将像历史上的其他大国一样，逐步地走向衰落。尽管他认为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即使衰落到占有世界财富和力量的‘正常’比重，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仅仅由于它的规模，美国在一个富极世界中仍将是十分重要的大国”。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一些政治科学家把今日美国的地位同往昔‘衰落的霸权’相提并论是有道理的”。“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对美国能否保持其现有地位这一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的唯一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可见，在美国的兴衰问题上，保罗·肯尼迪是持“衰落”观点的，但他是一个相对衰落论者。

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国际安全问题专家爱德华·路特维克是“衰落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只不过他走得更远，可以说是一个全面衰落论者。他于1993年出版的《处于危险中的美国梦：如何阻止美国沦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及如何赢得确保经济优势的地缘经济斗争》一书，是一本声称美国已全面衰落的代表作。他在书中写到：“美国正在变成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只有采取富有进取性的产业政策、革新教育制度和用新的方法使用国家岁入，才可能挽救它。”他的论述并不以历史见长，而是直面当代美国社会的现实。他认为，今天的美国之所以走向衰落，是因为它患了一种严重的“自

创症”，如：巨大的预算赤字、金融市场的失控、面临崩溃的公共教育系统、失败的社会福利计划、吸毒和犯罪猖獗、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等等，都属于“自创伤”的范畴。尽管他也曾提供了某些治病良方，但由于这都是属于自己用刀子割自己的病症，因此，他认为治愈的希望并不大，美国将带着这些“自创伤”日复一日地走向衰落。

以研究股票和证券市场见长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莱德·普雷斯托韦茨在他的《交易场所》一书中断言：美国世纪已经结束，日本将获取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

美国政治学者大卫·卡里略更加语出惊人，他断言，美国由于其经济的紧张和管理不善，“相对的衰落正在转化为绝对的衰落”。

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佛罗斯特则将1950—1990年的美国同1850—1891年的英国相类比，他认为，正是因为它们都奉行了一味追求自由贸易和固定汇率的僵化政策而导致了衰落。

上面这些学者大都是从经济和军事的角度来看美国的衰落。近来，有一位专门研究美国政治问题的学者凯文·菲利普斯，他的最新著作《傲慢的首都：华盛顿、华尔街和美国政治的挫折》一书于1994年底出版。1994年9月26日《时代》周刊以《臃肿的城市》为题发表了该书的摘介。在这里，作者认为，即使从政治文化现象看，美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他指出：“华盛顿夸夸其谈而又傲慢无礼，它正在毁灭这个国家。华盛顿就像一个没落帝国的寄生的首都，正在步历史上已经衰落的国都，如罗马、马德里和伦敦之流的后尘。”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所表现的特征，同历史上的一些强国，如罗马帝国、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在衰落前夕所表现的特征非常相似，这些特征有些是经济的，有些是文化的，有些是经济文化混合性质的。例如，经济方面的两极分化、财富的集中、巨额债务、高税收、制造业的衰落、金融投机的高涨等；文化方面的堕落、奢侈和原始同时存在、对外国影响的怨恨情绪、旧式爱国主义精神的丧失。对道德沦丧的抱怨等；综合性的：如国家资产负担过重、中产阶级日益衰落、城市状况恶化、教育质量骤降、国家精英越来越强烈的国际主义倾向等等。

这是美国衰落论的最新代表作。

哈佛学派：美国仍然雄居第一

与上述的美国衰落论者相反，相当一部分美国学者认为，尽管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份额在持续下降，尽管美国存在很高的政府预算赤字、外债和外贸逆差，但美国的总体实力地位并未衰落，美国现在是、在未来可预见的一个时期内仍将是世界第一强国，它的强国地位不但现在无与伦比，而且，由于它抢占了当代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并具有很强的适应变化的能力，它的强国地位还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强。这可以说是一种“美国复兴论”。冷战结束后的几年来，与衰落论相比，复兴论的调子越来越高。持这种论调的主要是哈佛大学的两位教授，他们立论系统，陈词慷慨，不妨将其称为“哈佛学派”。

据说，原任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主任的塞缪尔·亨廷顿教授，曾是美国外交政策研究界的泰斗亨利·基辛格的学生。他强烈反对美国衰落论，并从综合国力的各个方面论证了“美国的强盛和优势”。几年前，当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风行于世时，他就是该书观点的猛烈抨击者。他将国家实力划分为以下 10 个方面，并认为美国在所有这 10 个方面都强过其他国家，它们是：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军事力量、人口数量和质量（受教育程度）、科学技术水平、民族凝聚力、政治稳定性、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外交联盟体系、地缘政治态势。不仅如此，亨廷顿认为，美国还具有一些其他国家不具备的“软性”优势，将为美国保持和推进其强国地位作出独特的贡献：一种严格把关的移民制度，确保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往美国；一种奖励竞争和个人奋斗的社会文化；一个多元化和全面开放的社会及人群的高度流动性。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日趋缓和，军事力量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相对下降，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断上升。亨廷顿对世界力量的思考进入了一个更加广泛的、综合性更高的领域，甚至超越了综合国力所能容纳的范围，上升到了人类文明的高度，从各种文明相互较量和优胜劣汰的角度，阐述了属于西方基督教文明体系的美国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1993 年，已改任哈佛大学“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的亨廷顿，主持进行了一项题为“变化中的安全环境和美国的战略利益”的研究计划，该项目的最终成果，便是他发表在《外交》季刊 1993 年夏季号上的长篇论文——《文明的冲突》。文章开篇即断言：

“世界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世界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或经济的。人类不同群体间的巨大差异和占主导地位的冲突根源将是文化性的。尽管民族国家将继续是国际事务的强有力参与者，但国际政治中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隶属于不同文明的民族和人群之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主宰世界政治，文明的鸿沟就是未来的战线。”

他认为，鉴于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界里，“国际冲突将主要发生在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而在将所有文明的特质进行了逐个考察后，他发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具有无可比拟的、绝对的优势，他自豪地写到：

“与其他文明相比，西方处在无可比拟的实力颠峰。它过去的超级对手已从地图上消失。西方国家间的军事冲突是不可思议的，西方的军事力量是无可匹敌的。除了日本，没有谁能在经济上向西方提出挑战。西方主宰着所

有的国际政治和安全机构，如果加上日本，它还将主宰所有的国际经济机制。全球政治和安全问题为美、英、法三国所左右，全球经济问题则为美、德、日三国所左右，它们之间维持着独一无二的密切合作关系，而将大量的、力量弱小的非西方国家排斥在外。联合国安理会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出的代表西方利益的决定，在提交给世界时，就能代表国际社会的愿望。”

不仅如此，在亨廷顿教授看来，西方文明的另一个优势还在于，它的无可匹敌的力量优势，使它获得了随心所欲和强加于人的自由：

“事实上，西方正在运用国际机制、军事实力和经济资源，以一种有利于维持西方统治地位、保护西方利益和促进西方政治和经济价值观的方式操纵世界，以致于‘国际社会’这个词已成了‘给西方的行动以合法性’的一种委婉的说法。”

借用他自己的语言，可以说，亨廷顿教授最新提出的所谓“文明冲突论”只不过是美国复兴论的一种“委婉的说法”。

哈佛大学“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小约瑟夫·奈教授，是又一位反对美国衰落论的代表人物。在 80 年代中期的兴衰大辩论开始不久，他就曾写过《当然的领导者：美国力量发生质变》一书，以新的力量概念——综合国力的“硬指标”和“软指标”——对美国的实力地位进行了考察，得出了美国仍将是处于领导地位的世界强国的结论。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开始畅销后，奈教授便立即站在了肯尼迪的对立面。1990 年春天，他先后在《对话》杂志和《大西洋月刊》发表《世界力量的变化》和《国家衰落的类比：一个使人误入歧途的比喻》两篇论文，全面批驳了以保罗·肯尼迪为代表的美国衰落论和不恰当的历史类比法。他认为，国家力量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有升有降是自然规律，并非任何一种实力下降都代表了国家衰落的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占世界产值的三分之一是不正常的，经过整个世界战后 30 年的经济复兴，这一比重在 1975 年降到四分之一是必然的和正常的，此后便一直稳定在 22% 与 24% 之间，并不像肯尼迪所说是持续下降；更不能将美国与西班牙和英国的衰落相比，它们之间的不可比因素远多于可比因素，这样的比较将使人误入歧途。最后，他得出结论说：

“总而言之，美国在本世纪末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衰落或者被新的霸权所取代，而是如何应付世界政治力量正在发生质变的问题。只要正确地理解了这一形势的实质，美国就能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发挥必要的国际领袖的作用。”

最后，如果以对美国的强盛充满信心这一点而论，《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可能也该算是哈佛学派的人。在这本 1983 年就出版的畅销书中，他虽然也承认美国经济实力的某种衰落，但这种衰落在他看来，只表现在他所说的“夕阳工业”中，是不足惋惜的。他认为，人类正在经历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在标志这一转变的 10 个大趋势中，美国都是站立潮头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信息生产者 and 使用者，它拥有构成未来世界力量的全部资源。这实际上明示美国将是未来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根本不存在衰落的问题。也许正是奈斯比特关于美国社会富有创造性、充满活力、个人的自助和自强、社区精神的发展、人民永远乐观向上和不断追求新事物的描述，为哈佛学派后来特别强调的“软实力”概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布热津斯基：笑看“大失败”

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博士在美国外交和国际问题研究界是一个目光深邃、见解独到的人物。他曾是一名大学教授，后来在70年代末担任过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任内对中美建交作出过重要贡献。离开政府之后的十多年间，布热津斯基博士也曾多次访问过中国，但这并不表明他喜欢中国的社会制度，相反，同致力于中美友好的另一位美国著名人士尼克松先生一样，布热津斯基在意识形态上也是以强烈反共而闻名的。正是这种强烈的反共立场，使他在参与美国兴衰问题的辩论中，很自然地站在美国复兴论的一边。原因很简单，在他看来，美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将使它在任何时候都能立于不败之地，将能确保它永远强大。所不同的是，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布热津斯基博士勇于面对现实，而正是当代世界的严酷现实，使他对美国的强盛和领导地位的看法变得愈来愈谨慎。

1989年4月，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公开性”正在展开、东欧集团的社会主义国家尚未发生变化之时，他出版了《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带着一种多年的预言终于得到验证的自满心情宣称：在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争夺后，共产主义已全面失败并面临着最后覆亡的命运，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将是世界的唯一主宰力量。这里，只需要引用他书中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就可以看出其基本倾向，该书开篇就声明：“这是一本论述共产主义最后危机的书。”该书结尾的最后一句断言：“支配21世纪的将可能是民主政体，而不是共产主义。”

《大失败》出版后不到半年，东欧发生剧变，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被抛弃，两年后，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解体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

最后的预言实现了，布热津斯基博士笑看“大失败”。这时，他对新世纪仍将是美国世纪毫不怀疑，在他看来，美国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盛过，何谈衰落？另外，就在“柏林墙”被拆除前不久，布热津斯基博士的老相识、斯坦福大学的日裔美籍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完全否定了《大国的兴衰》一书阐述的观点，附和了布热津斯基博士的说法，福山的文章认为，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宣告了“历史的终结”。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香西泰先生几年后在评论这篇文章时说，《历史的终结》“实际上向人们揭示了世界正在坚决地朝民主主义的方向迈进这样一种光明的前景。”福山教授也正是带着这样的认识，与布热津斯基博士一同笑看“大失败”的。

然而，苏联解体后引发的一系列混乱和震荡，使美国和西方在突然到来的变化面前无所适从。这一切令布热津斯基博士越来越忧虑，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开始动摇，直至最后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美国能否领导世界？1993年，一本名为《失控：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的书出版了，它负载了布热津斯基博士的全部忧思——兴奋之后的忧思。

本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我担心全球变局失控。”

这是因为，世界力量的变化并未遵循“零和游戏”的规则，在两个对手的较量中，将一方的失败自然地转化为另一方的成功。因此，他看到：“极权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民主自由一定胜利，或已经胜利。”“全球的分化力量仍比整合力量强……世界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因其本身的文化弊病而非经

济因素，难以真正领导世界。”

这一次，连布热津斯基博士也不再是一个坚定的美国复兴论者了。

基辛格：“它将同其他国家一样”

额头上布满皱纹(智慧的象征?)始终戴着一幅深度近视眼镜的亨利·基辛格博士,即使在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刻,也似乎总是充满忧虑,若有所思。同他那幅眼镜相反,这位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和前国务卿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有远见的战略家之一。基于对19世纪欧洲霸权史的独到研究,他从来不对某一帝国的长盛不衰抱有幻想。很自然,他不属于美国复兴论者。在他离开华盛顿权力中心的近20年来,除了对里根执政的某个短暂时期有过赞颂外,他基本上作为美国政府的批评家而站立于战略研究界。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当整个西方世界沉浸在巨大的狂喜中、不断声称要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之时,基辛格保持了他独有的冷静,他告诫说:这一切可能只是麻烦的开始而不是终结,不能高兴得太早。1993年以来,在目睹了克林顿政府因错误估计美国的力量而在外交上接连碰壁的惨状之后,搁笔多年的基辛格终于无法再保持沉默了,他于1994年春天完成了一部名为《外交》的新著。在这本书中,他以一个哲学博士的深刻笔触,在洞悉以往的历史沧桑之后,向美国讲述了国际体系形成的艰难和这一过程中大国力量变化的趋势,美国能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对美国未来实力地位的描述。

针对美国人不断宣称要建立“美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基辛格写到:

“世界新秩序的最后形态要到进入下一个世纪相当长时期后才能显现。在冷战后的世界上,美国的确是唯一能在全球行使干预行动的超级大国,但现在与军事力量相关的问题已退居次要地位。在一个大约有五六个大国和无数小国共处的国际体系中,新秩序的形成必将经历过去几个世纪所经历同样过程,通过调解民族利益冲突和平衡相互对抗的民族利益来完成。”

既然美国不可能按照自己的设计很快建立起新的国际秩序,那么,它将向何处去呢?

“随着21世纪的临近,巨大的全球力量在发挥作用,美国的优越地位将因此而下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的军事力量仍将无可匹敌,然而,美国妄想向今后十多年世界可能出现的许多小规模冲突地区,如波黑、索马里和海地投送军事力量,将容易引起越来越大的分歧。在进入下一个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很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强的经济,然而,它将面临冷战时期从未经历过的经济竞争。美国仍将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那时会有一些国家同它旗鼓相当,它虽然能在某些方面独占鳌头,但在其他许多方面,它将同其他国家一样。”

下一个世纪,美国将同其他国家一样,这就是基辛格博士的结论。

两洋之间，谁主沉浮？

读者已经看到，为“山姆大叔”算命的人们之间的争执是多么大，同一个美国，不同的人看到了不同的侧面。比如，关于美国的政府预算赤字，衰落论者认为这是一笔永远也还不清的恶账，但也有人认为在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这算不了什么，如果再将州政府一级的预算情况平衡起来考虑，美国的预算赤字率远低于德国和日本，仍处在良性循环中，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忧。再比如外债，衰落论者认为外国在美国的巨额投资和大量持有美国政府的债券，代表了外国购买美国、控制美国的危险趋势，但复兴论者却有一番说头：外国争相向美国投资恰恰证明了美国的繁荣而不是衰落，假如以当前美元价格重新估算美国的海外资产，将增值数千亿美元，再考虑其他因素，美国可能还是债权国，再比如美国的巨额外贸逆差，衰落论者认为这是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的结果和象征，但不以为然者也自有高论：现行的逆差只统计了商品贸易（有形贸易）而没有统计美国一直处于顺差的服务贸易（无形贸易），现行统计将跨国公司的贸易和内部资产转移计入产地国而不是产权国，如果采用更切合实际的统计方法，美国的整个进出口贸易可能是大体平衡的。再比如，有人说美国是相对衰落，但有人说现在的美国恰恰是相对复兴，因为它的最大对手苏联已经衰落到最后解体，追赶它的德、日两国都是它的盟友。一些中国学者，持一种万无一失的观点：美国既不是衰落，也不是复兴，而是兴衰并存，抬出了“中庸”之道。总之，看起来每一种观点似乎都有自己的科学根据。

本书并不致力于探究各种研究方法的优劣得失，因此，笔者不打算评判美国兴衰之争的是与非。笔者关心的和将要考察的只是塑造美国未来形象的各种因素的变化情况。简单地说，美国在下一个世纪的全球力量对比中将处于何种地位，需要考察以下问题：

1. 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中，美国能否争得优势？如果美国企图继续维持全球军事存在，并对外承担更多的安全义务，美国的经济能否支撑这样的使命？

2. 美国军事强国的地位能否维持下去？其军事力量能否应付美国面临的所有挑战？武装力量能否完成顺应新时代的转变？

3. 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化趋势是什么？这种变化将为美国的发展提供一种向上的动力，还是将使美国社会日趋涣散？

4. 美国外交联盟关系的演变趋势是什么？它将怎样同世界主要国家相处？

最后，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将形成什么样的实力地位？以美国的新的实力地位，未来的世界格局将可能是美国独霸的“一极世界”呢？还是，美国将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的一极”？

上天赋予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它处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大洋之间，在93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有星罗棋布的湖泊、纵横千里的河流，有肥沃的平原、茂密的森林和辽阔的大草原，地下矿藏应有尽有，更不用说蕴藏在两大洋的丰富的海洋资源……可以说，以国家发展条件而言，美国首先占尽“地利”。美国在短短200年间就成长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地利”是原因之一。200年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辉煌历程，为美国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管理经验，在当今世界，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哪一国执

意要与美国为敌，这又可以说美国占尽“天时”。美国政府为增强其综合国力，提出了“经济优先”的发展战略，美国人民对“过好日子”有着持久不衰的追求，这可以说是具备了“人和”。中国古代圣贤断言：凡事假以天时、地利、人和，无有不成。但西方圣哲也有一句名言：任何规律都有例外。

放眼未来，两洋之间，谁主沉浮？

经济巨人的脚步

美国历届政府都是标榜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但像今天执掌白宫的比尔·克林顿政府这样，将发展经济强调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提出“经济优先”的国家发展战略，使美国的政治、外交、军事、教育等一切活动，都围绕振兴美国经济这一中心而展开，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 1992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从远离华盛顿权力中心的南方小州阿肯色走来的比尔·克林顿，正是靠挥舞“振兴经济”这面旗帜，才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打进白宫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它表明，无论是政坛新星、企业巨头，还是普普通通的美国老百姓，都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种必要性，那就是：美国经济这个烂摊子，已经到了非收拾不可的地步了。

我们不禁要问，美国的经济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克林顿政府有无治病的良药？振兴的希望有多大？这是我们在展望美国力量的前景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昔日辉煌

在现今世界诸强中，以其强国地位的确立而言，美国具有两个不同于其他列强的特点：第一，美国从立国而至世界超级大国，不仅道路平坦，而且所用的时间是最短的，前后不到 200 年。相比之下，法、英、德、俄等国在成为某种程度的世界强国之前，都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曲折奋斗。第二，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更主要的并不是长期穷兵黩武、攻城掠地的军事征服的结果，而是经济和商业扩张的结果。相比之下，19 世纪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主要是经由几个世纪的王朝战争而确立的；20 世纪初英国的世界霸权，则是长达三个世纪的海外殖民掠夺不断积累的结果；如果说俄罗斯也曾经代表着某种世界霸权的话，这要归因于历代沙皇持续不断的对外军事征服。换句话说，美国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世界霸权，要归功于它创造的经济奇迹。

200 多年的美国经济发展史，大体上可分为 4 个阶段。

从独立到美国内战前的 80 年，是美国经济的创业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上新取得不久的独立仍然受到威胁，经济的发展是缓慢的，在北方，它主要表现为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刚刚取得的成果建立各种制造业工厂和作坊，在南方，则是利用黑奴劳动，大力发展棉花、玉米和烟草等种植园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后期，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和外来移民的大量增加，大量的美国人加入了去西部“淘金”的行列，西部拓殖运动的发展开始改变美国经济的布局。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鲍尔·戴维德的测算，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平均只有 0.6%，可见创业的艰难。到美国内战爆发的 1861 年，美国的经济成果从世界范围来看，仍然算不上是主要角色，那时，单是英国一家，就占世界总产值的将近 40%。关于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有两个因素是值得注意的：通过购买（1803 年购买路易斯安那和 1853 年购买加兹登）和战争（1812 年对英战争和 1846 年对墨西哥战争）得到的土地，使美国经济发展本来就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进一步得到了改善；另一个优势是奴隶劳动，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 H·U·福克纳下过一个很明确的结论：“直到南北战争，美国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增加是通过奴役几百万黑人奴隶才取得的。”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奴隶劳动既是美国早期发展的一个优势，又是进一步发展的阻力所在——恰恰是没有成本的奴隶劳动，使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发展走到了它的极限：当北方的工业发展极需大量廉价劳动力之时，将劳动力牢牢钉死在土地上的奴隶制度便成为不能容忍的桎梏，最后只有通过战争来解决。这一时期美国的经济运行基本上是平稳的，但 1837 年的经济衰退和此后几年的萧条，也使尚很脆弱的美国经济初尝了周期性危机的苦果。

从美国内战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是美国经济急剧扩张的时期。据有关的资料记载，1865—1914 年，美国的人口从 3000 万增长至 1 亿，但同一时期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将近 6 倍，人均产值增长了 3 倍，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基本上实现了由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1869—1899 年，农业提供的商品由 50% 以上减至不到 33%，而制造业提供的商品则由 30% 上升至 53%。“到 1900 年，美国就已形成了现代化的工业秩序”。从世界范围的比较来看，美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过英国，居世界第 1 位，关于这一点，美国经济史学家福克纳用一些很难得到的关于早期美国经济的统计数字，给

了我们一个清楚的概念。他写到：“19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制造业国家，美国已在国际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187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左右，当时只有英国的工业产值超过美国，它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份额大大超过30%。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胜利地向英国的领先地位挑战了。1900年，美国工业产值大约占世界总产值的30%，而英国只占20%，德国占17%，法国占7%。”然而，这一时期的疯狂经济扩张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通货膨胀、金融恐慌、失业和劳工运动、企业兼并浪潮等等，这些因素终于导致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1914年陷于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

1914—1945年的两次大战期间，是美国大发战争横财和在畸形扩张中最后确立世界经济霸权的时期。1914年，正当美国经济经过19世纪的急剧扩张后陷于一场前所未有的衰退而无力自拔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给美国送来了大发战争横财的机会。战争期间，主要由于来自欧洲的军事订货的刺激，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创造了快速增长的奇迹。战争使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13年的390亿美元增至1918年的771亿美元。1922年，美国的国民总收入3208亿美元，超过欧洲各国总和；1914年，美国的对外贸易仅有4.35亿美元的顺差，而到战争结束后的1919年，这一顺差增长至38.45亿美元，而当时美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才只有117亿美元；1914年战争开始时，美国的失业人数高达220万人，而到美国参战前夕的1916年底，这一数字降为22万人；战前的1914年美国工人的年均收入只有682美元，而到战争结束后的1919年，猛增至1272美元；战前美国是一个有65亿美元外债的纯债务国，到战争结束时，单是欧洲各国欠美国的债务就达百亿美元，美国一跃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到1919年，美国已占有世界黄金储备的40%。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更加明显。战争使美国的黄金储备由1937年的127.9亿美元猛增至1948年的244亿美元，占当时西方国家黄金储备总额的71.3%，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1938年的34.9%上升到1948年的53.9%，从1941年到1946年，世界各国以各种方式欠下美国500多亿美元的债务，总之，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不但战前笼罩美国经济的衰退阴影已经一扫而光，而且美国名副其实地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和军事强国，其实力地位是包括苏联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可匹敌的。更重要的是，1944年7月1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讨论战后经济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在决定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同时，还决定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将美元与黄金挂钩，世界其他货币则通过与美元挂钩以确定其汇率，在此基础上实行固定汇率制。这将美元变成了国际通货，使它在国际支付和结算中的地位等同于黄金。美元转变为国际通货，是美国在全球的经济霸权最后确立的最明显标志。

战后至70年代初，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极盛时期，这一时期，美国凭借其在二战结束时取得的经济霸权地位，实现了以适度增长为基础的全面繁荣。1949—1969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以每年4%的速度递增。1949年时，美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是2570亿美元，1969年上升至9500亿美元，20年间翻了近两番，人均GNP则从1949年的不足2000美元上升至1970年的近5000美元，翻了一番多。美国的出口从1950年的不足150亿美元增至1970年的628.7亿美元，20年间增长了3倍多。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军事工业集团”借助全球冷战的形势进行疯狂的武器和军人制造是分

不开的，当然，充分利用技术进步的成果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元的强势地位及大型跨国公司的经济扩张等，也是促进增长的主要因素。

70年代至今是美国经济衰退加剧和在困境中进行艰难调整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滞胀经济”的出现。尼克松政府上台初期，面对60年代中期以来就持续加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和经济衰退的威胁，开始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试图以赤字预算来弥补日益萎缩的投资，以刺激经济复兴，结果，出现了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

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的汇价随国际商业和金融活动的变化情况进行浮动。这实际上就宣布了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固定汇率制的崩溃。美元作为国际通货地位的丧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尽管此后美国经济依然在缓慢增长，而且也不乏“好年景”，但总的说是开始走下坡路了。

对历史轨迹的追寻要求尽量客观，但如果历史只是停留在一些数据和事实之上，即使是对真实的确凿无误的复原，也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没有结论和启迪，历史对我们来说就只能是一堆故纸。然而，启迪在哪里呢？

美国经济的200年，是苦干与掠夺同步、繁荣与衰退交织、辉煌与重负并存的200年，对未来有意义的是发现其中促进增长和繁荣的动力，找出导致衰退和羁绊进步的痼疾。

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促进作用的是下面一些因素：

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一个处在两大洋之间的未被开发的广阔大陆，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为美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基础和充足的活动空间。单是历来的美国史学家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就足可辑成一本大部头的著作，这里我们只借用美国经济史家H·U·福克纳的一句名言：“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有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非常丰富的资源，这真是莫大的幸运。”

科技进步成果得到及时和充分的运用。美国并不是18世纪中叶和19世纪末期两次科技突破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但它却是工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这些受益的积累终于使它成为本世纪50、6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领头羊”，其在科学研究和工业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一直维持到今天。关于这一点，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林克和威廉·卡顿写到：“在20世纪促进美国工业发展的所有原因中，技术革命是最基本的，因而也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它提供的技术，大规模生产的时代永远不会到来。”

外来移民的巨大作用。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移民国家，直到今天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流向地。移民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推动作用在于，在早期，它为美国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现成的和廉价的劳动力，在近期，由于严格控制的移民制度的作用，它为美国输送了大量省却了培训费的知识型人才和熟练劳动力。被奴役的黑人和华工是早期的代表，而像艾伯特·爱因斯坦、恩里科·费米以及像华裔的李政道、杨振宁这些杰出的科学家，则是近期美国移民的代表，移民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战争的刺激。这一点我们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经济跃进中可以看到得很清楚。

平稳的安全和政治环境。美国自立国以来，政治斗争基本上从未超出两党之间议会斗争的范围，唯一因政治斗争的不可调和而导致的战争是1861—

1865 年的南北战争，这是就政治而言。就安全而言，它的东西两面为两大洋所保护，在北面与加拿大共有一条世界上最平静的开放边界，南面的墨西哥更无意与这个“大块头的邻居”为敌。美国虽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但都是在别人的土地上作战，美国本土自 1865 年以来的 100 多年间从未遭受任何战争破坏。

政府的政策。这是一个抽象的因素。因为，以美国政治和经济制度而言，政府与经济发展本无多大关系，但从对美国经济发展史的考察中，我们不能不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重新认识。简单地说，在早期，它的作用表现为一种自由放任的政策，而在近期，特别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以政府干预经济的形式而存在的宏观调控机制，简直可以说是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更不用说政府经常利用外交和军事手段为美国资本的对外扩张鸣锣开道了。另外，20 世纪的历届美国政府在科学研究和国民教育上的巨额投资，亦对美国的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勇于创新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奥地利出生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就是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来解释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在他看来，正是那些敢于迈向未知的领域，富于冒险、进取和征服精神的企业家，掀起了经济活动中一波又一波的新高潮，从而推动整个美国经济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充满活力的社会文化。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不受约束的自由流动、对个人奋斗的鼓励和崇拜以及整个社会追求卓越超群的特性，为国家和社会带来了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大农业的发展，或者说工业化的农业经营，始终是美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保障。本世纪的美国农业是一个神话般的奇迹，它生产着世界粮食总产量的五分之一。高度发达的农业不仅很早就解决了整个社会的温饱问题，而且腾出大量劳动力加入了工业发展的进程。今天，在美国从事农业的人不到总劳动力的 3%，但却不仅养活了 2 亿多美国人，而且在农产品出口市场大大拓展之后，农业生产仍呈现出持续过剩的局面，政府不得不以向农民支付巨额补贴的方式鼓励土地辍耕和抑制生产能力。据美国人口普查局 1994 年 11 月提供的材料，现在美国农场的数量为 190 万个，处于 1850 年以来的最低点，而 1935 最高峰时有 680 万个。1987 年到 1992 年是农场数量锐减的几年，但同期农作物销售量却上升了 28%。比照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被“吃饭”问题拖后腿的状况，就可以看出，农业问题的彻底解决，使美国工商业经济的增长如虎添翼。

对外贸易中的保护主义也起了某种作用。如果说不断增长的国际化程度是美国经济跃进的动力的话，那么，一个同样不可避免的事实是，美国政府在不同时期，以各种关税的和非关税的措施所实行的保护主义政策，也对美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一定时期稚嫩工业的生存和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在保护主义带来的不平等的国际竞争中，美国经济实现了最大限度地削弱对手和保护自己。

当然，在我们力图进行一种纯经济的探讨时，有意忽略了某些助长美国经济扩张的政治性因素，例如，一种长期存在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美国在其中享有的国际剥削者的优势等等。也许，一种为所欲为的自由是强大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长期困扰美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又是哪些呢？

周期性衰退。这一点不必多说，这是世人皆知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通病，美国并不因为强大而具有免疫力，相反，它患这种病的频率更高。战后至今，美国经济共经历过 9 次严重的危机或衰退，其中最严重的 1973—1975 年衰退中，国民生产总值的降幅高达 4.9%。每次危机或衰退都对经济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坏和浪费。

经常存在的失业与日益强大的劳工运动是美国经济难以摆脱的阴影。

政府包揽一切的雄心和国家财力的有限，使福利社会的巨大开支成为美国经济的沉重负担。

为维持一个全球帝国所需要的巨大军费开支以及依赖它生存的军事工业集团，造成了畸形的经济结构。近期，当人们在新的形势下作出各种努力试图缩短战线时，却发现这是一条不归之途。

公共教育质量的持续下降，使美国经济发展面临熟练劳动力和创新人才日益缺乏的局面，这实际上是一个增长后劲不足的问题。

长期积累的巨额预算赤字与外贸逆差，使美元成为一种日益疲软的货币，不断重复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的经济生活动荡不安。

整个社会的不加节制的享乐，造成了消费过度和储蓄不足的状况，损害了建立在充分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良性循环基础上的增长机制。

资源的巨大浪费几乎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

美国走到今天，美国人民最感自豪的是他们的经济繁荣和高品质的生活质量，但如果要问美国人民对什么最不满的话，答案同样是经济。那是因为，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日新月异之时，美国的经济却变得愈来愈令人担忧。

里根：增长的神话

执政岁月几乎覆盖整个 80 年代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在当代美国历史上应该成为一个值得一书的人物，特别是在经济方面。

1981 年 1 月 20 日，刺骨的寒流穿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每一条大街上，国会大厦的圆顶在寒风中透出别样的冷峻。

美国历史上最年迈的当选总统、年届 70 的罗纳德·里根精神抖擞地走上了国会大厦西侧的台阶，踌躇满志地去宣读他的施政纲领。在这位老人依然挺拔的背影后面，亿万美国人是在这样一些数字的包围中注视他的：13.5% 的通货膨胀率、800 万人的失业、累积达 5800 亿美元的联邦预算赤字和 322 亿美元的外贸逆差，在这些数字的后面，是一个正在狞笑着的符咒般的词汇：“滞胀”。

一向活跃的民意测验机构在这次就职仪式之前公布的一项测验结果说，美国人民普遍反映：“这是一个幻想破灭的时代”。

然而，里根的看法不同，他信心十足。站在 1 月凛冽的寒风中，里根总统告诉美国人民，他要“重振国威”：

“我们有能力解决面对的问题吗？答案是绝对肯定的。”

里根总统将开出什么样的药方来实现他的诺言呢？甚至在他本人还未拿出任何具体的措施之前，《纽约时报》的编辑就为他的药方挂上了一个在当时看来不无嘲讽的标签——1980 年 11 月 9 日，在里根当选总统仅一天之后，这家报纸在它发表的一篇题为《里根经济学：一种转变？》的文章中，创造了“ReRanomics”（里根经济学）这个词。

事实上，里根总统振兴美国经济的药方就是这个“里根经济学”。

根据里根年代的施政实践及一项权威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的基本政策是：大力压缩联邦政府开支，以削减预算赤字；实行大幅度减税措施，以减轻国民经济负担，刺激投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以抑制通货膨胀和维持美元地位；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各种限制性规章，以增加企业活力。

1981 年 2 月 18 日，里根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的 535 名议员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强烈要求通过一项经济计划，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在全国恢复财政稳定。他说他准备重新制定一个总额为 6595 亿美元的 1982 财年预算案，其中赤字 450 亿美元。这是一个削减开支和减税同时进行的方案，他要求从 83 项主要的开支项目中削减 440 亿美元，并从当年 7 月 1 日起的 3 年内，每年削减个人所得税 10%。

接下来，里根便大刀阔斧地进行各种削减。3 月 6 日，他宣布了一个关于联邦政府雇员人数的长期性最高限额，计划在 1982 年 9 月 30 日之前打破 3.7 万名联邦雇员的“铁饭碗”，以便在 2 年内节省 13 亿美元。为了这区区 13 亿美元，他不惜开罪这些长期吃政府饭的人。同样是为了节省开支，难以想象他究竟用了什么样的魔法，竟然说动了国会山那些发财心切的议员老爷们同意勒紧裤带，在 3 月 12 日投票否决了一项酝酿已久的提案，这项提案要求为 3.7 万名包括国会议员、法官和内阁部长在内的高级政府雇员增薪 16.8%。这一次，他节省的就不止区区 13 亿美元了，这可能是一个上百亿美元的数字。

节流必须开源。作为开源的第一个尝试，他首先想到的是刺激国防工业。

3月10日，国务院宣布了一个拨款近10亿美元的计划，向16个国家提供低息贷款，让他们向美国购买军事物资和装备。

但这时，在国会对新财年预算案进行的激烈辩论中，对“里根经济学”的攻击和抗议之声开始高涨起来，人们攻击他的经济政策是“劫贫济富”，是军国主义等等。3月23日，美国政府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向全国宣布，由于正在审议的预算案对福利开支的大幅削减，目前接受福利救济的家庭将可能有三分之一丧失资格。此言一出，全国各地出现一片抗议声，5月3日，愤怒的人们云集华盛顿，举行了越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抗议政府增加军费和削减福利开支。但里根不为所动。在他的敦促下，国会两院于5月21日终于通过了新政府的第一个引起激烈争议的预算案，在6950亿美元的预算指标中，社会福利开支被削减了360亿美元，同时为防务开支追加拨款250亿美元。

国会的合作使里根倍受鼓舞，愈加大胆地采取了更进一步刺激国防工业和减税的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在几个月中形成了一个“其他方面削减—军事方面增加—再削减—再增加”的有趣的循环：

7月4日，国防部宣布开始一项耗资1200亿美元的海军建设5年计划，包括增建2艘核动力航空母舰、14艘攻击潜艇和1900多架飞机及其他舰艇；这一计划宣布后紧接着的另一个削减是：7月31日，国会通过一项法案，从刚刚通过的1982财年预算中再削减352亿美元。

9月10日，里根命令其内阁在编制1983和1984财年预算时再削减750亿美元，9月29日，国会立法将联邦国债限额提高到1.079万亿美元，从而使国债限额有史以来第一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这些节省和借来的钱又一次被用于军事方面：10月2日，里根宣布了一项耗资1803亿美元的核力量扩充计划，包括MX导弹的重新部署、B-1B轰炸机的建造、三叉戟潜艇的导弹换代及改进战略通讯网等项目，10月7日，国会又通过了为所有军人增薪17%的法案。

在为军备计划注入大量资金的同时，大幅度减税的方案也出台了：8月3日国会通过了总统提交的减税法案，规定在今后3年内削减个人所得税25%，远远超过了他在3月份提出的10%的目标。

大幅减税使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庞大的军备重振计划又需要不断追加拨款，平衡预算的努力越来越难以实现。10月间，联邦预算局公布的1981财年预算执行情况显示，该年度的赤字为579.3亿美元。那时它预测1982财年的赤字将是431亿美元，可是到了12月，该局根据当年开支变化情况向全国公布的赤字预测数却来了个大翻番：1982财年1090亿美元，1983财年1530亿美元，1984财年1620亿美元。

古往今来的政府，为求预算平衡大都作出了增收节支的努力，里根政府的初衷肯定也是如此，但由于军备计划这个“轮子”高速运转，削减开支的进程却一再受阻而运转不起来，再伴以大幅度的减税，其必然的结果将是政府预算的更加失衡，最后结果是导致更加严重的“滞胀”经济。这是世界上绝大部分经济学家和中国的经济研究专家在1981—1982年得出的一致结论。事实上，在那时，美国仍未能走出1979年开始的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人们将无望的经济状况归咎于里根的经济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笔者在1988年偶然看到青年经济学家杨鲁军先生的一项不同凡响的研究成果（杨鲁军著，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论里根经济学》），对里根经济政

策提供了一种见解独到的分析，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唯一能解释美国经济为什么从 1982 年开始持续增长的理论。他认为，里根的经济实践在 1981—1982 年是处在一个“早期失效阶段”，由于上届政府遗留下来的问题过于严重而难以很快克服，表面上看陷入了更深的衰退泥潭，在面对各方责难中，里根顶住了压力，仍坚持高利率下的信贷紧缩政策，基本制服了通货膨胀，为下阶段的经济恢复和长期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1983—1989 年，美国出现了自 1982 年底开始的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稳定增长期。正是在里根消灭了“滞胀经济”，创造了低通胀状态下的低速稳定增长这一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意义上，杨鲁军认为，“里根经济学”在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都将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那么，里根总统在美国经济中究竟创造了一个怎样的“增长的神话”呢？

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美国的 GNP 这块蛋糕越做越大了。下表是里根执政年代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orld Tables 1994》和《当代世界经济实用大全新编》。

通货膨胀得到抑制，通胀率逐年降低。里根就职前，美国 1980 年的通货膨胀率是高达两位数的 13.5%，1981 年底这一数字降为 8.9%，1982 年降至 6.1%，1983 年降至 3.2%，1984 年升至 4.3%，1985 年再降至 3.8%。总的看，通货膨胀率稳定在 3—4%，应该说是一个正常的水平。

失业问题得到缓解。里根上台时，美国的失业率是 7.6%，那时有 800 万人的失业大军。这一状况在 1982 年和 1983 年继续恶化，失业率分别是 9.6% 和 9.4%，1984 年开始降至 7.5%，1985 年降至 7.25%。考虑到里根年代的经济调整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这样的失业率也属正常。

经过里根年代的努力，美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在世界的地位有了上升。1980 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产值的比重为 23%，到 1986 年，这一比重上升至 25.2%。

当然，这些并非里根经济政策的全部成就。在美国，当里根离开白宫后，人们之所以将他当政的时代称为“里根时代的繁荣”，在于他使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在里根完成了他的两个任期引退后，大部分人都感觉现在的日子比几年前好过了。提高生活水平，这也许是衡量世界上所有政府经济政策成功与否的最后的、也是最严酷的标准，而在这方面，里根应该说是过了关的。

“三高”上蹿，魔鬼缠身

里根时代的经济繁荣是共和党人赢得 1988 年总统大选的最重要资本，乔治·布什这位在里根手下当了 8 年副总统的共和党人，显然是有资格分享这份荣耀，从而被美国人民拥戴为他们的新一届总统。

然而，布什政府上台时，美国经济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前所未有的繁荣正在酝酿着又一次衰退的打击。

过度繁荣的后果首先表现为“三高”——高赤字、高债务、高贸易逆差。这在里根时代已经出现。在布什时代进一步恶化了。对美国这个经济巨人来说，“三高”像一条火蛇，越蹿越高，置身其中，犹如魔鬼缠身，难以摆脱。

1. 高赤字。里根上台时，继承下来的累积赤字为 5800 亿美元，这是他上台之初最为头疼的问题，他的经济复兴计划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彻底消灭赤字。然而，一个极大的讽刺是，在他执政 8 年之后，却为他的继任者留下了高达 1.3382 万亿美元的政府赤字。下面是 1980—1988 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orldTables1994》。

2. 高债务。美国在很早就是一个负债经营的国家。据美国萨洛蒙国际投资公司的一项统计，美国政府、公司和个人的负债，在 60 年代的 10 年中年均增长 7.5%，70 年代年均增长 11%，80 年代的增长率上升至 12%。1982 年，美国在海外的资产总额为 8249 亿美元，而外国在美的资产总额为 6887 亿美元，美国仍是拥有 1362 亿美元对外债权的世界最大债权国。但由于受里根政府居高不下的利率政策的诱惑，从 80 年代初开始，外国资本大量流入美国。1984 年，美在海外资产上升至 8960 亿美元，而当年外国在美资产已增至 8920 亿美元，美国的对外债权仅有 40 亿美元的余额。在这之后，外国资本继续大举进军美国市场。到了 1985 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当年外国在美资产 1.0613 万亿美元，美在外国资产 9494 亿美元，两相扣除，美国变成了负债 1119 亿美元的世界最大债务国。这之后，债务的蹿升更出现了某种加速度的趋势，至 1987 年底，美国帐面上的国际净负债额已达 4030 亿美元，相当于当时发展中国家最大债务国巴西负债额（1200 亿美元）的 3 倍多。如果再加上公司和个人负债，当年全美国负债总额达 8.4 万亿美元，2 倍于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3. 高贸易逆差。对外贸易的收支状况是标明一个国家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指标，而在这一领域，美国自 70 年代以来是每况愈下的。自 1897 年以来，美国的对外贸易一直是有盈余的，这是人们在论述美国的强国地位时必然要提及的因素。1971 年，美国第一次出现贸易逆差。80 年代，美国的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远不如日本和联邦德国，农产品的输出量也在下降，导致外贸逆差连年居高不下，1984 年突破 1000 亿美元大关，1986 年达到 1700 亿美元之巨。近几年，美国虽然通过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限制某些外国产品的输入，通过与外国政府的各种形式的市场准入谈判，大力开拓了海外市场，使外贸逆差在某些年份略有降低，但总的看改善不大，它仍是目前世界上外贸逆差最大的国家。下表是美国 1982 年至 1993 年的贸易逆差情况：（单位：亿美元）

面对美国经济中魔鬼缠身的“三高”痼疾，布什总统上台后，决心要对其进行彻底的医治，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经济政策却并未朝着这个方向

去努力。里根时代的大幅度减税措施造成的岁入锐减和巨额财政赤字，使人们担心布什政府可能会以增税政策来改变这种状况。老于世故的布什显然揣摩透了美国人的这种担忧，于是，赢得大选的迫切愿望使他在竞选中就许下了“不增税”的诺言，并在执政后基本信守了这一诺言。这样，美国政府的收入仍不能得到大幅度的增加。而与此同时，布什在公共教育和社会福利方面，一反里根政府大力削减福利开支的政策，声称为了美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要革新和改进美国的学校教育系统，要改善社会福利条件和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等等。于是，我们看到，正是在里根大力削减开支的方面，布什增加了开支。在里根年代直线上升的国防开支领域，布什政府创造了政策连续性的良好记录，他声称要花更多的钱增加美国的国防实力，要继续坚持“星球大战”计划等等，这样，巨额国防开支也没有降下来。另外，布什还有一面旗帜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也许他的初衷是要打开紧紧封闭的日本市场，但最后开放的是美国的市场。

布什政府经济政策的失措，终于使美国经济走向另一次衰退的边缘。1990年3月，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字，1989年第4季度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仅为1.1%，虽然比此前的预计高出0.6个百分点，但依然是3年来增幅最低的一个季度。到了1990年上半年，经济活动已形成零增长，美国正是从这一年7月步入经济衰退的。1991年美国发生经济大滑坡，出现1.2%的负增长，1992年，仅在1991年的基础上增长1.9%。从这些简单的数字中，可以看出，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完全失败的。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曾不无遗憾地发现了一条美国规律：军号声往往会葬送一个总统的宏伟抱负。60年代末的林登·约翰逊总统便是这条规律的最无情的牺牲品。他在1965年获得连任后，便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伟大社会”计划，发誓要让美国人享受世界上最好的福利。然而，伴随着愈吹愈响的战斗号角，一批又一批的美军，冲向越南战场，却最终葬送了他的“伟大社会”计划，当越南战争于1973年结束时，他在自己得克萨斯州的牧场里郁郁而逝。

布什总统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这条规律拖了后腿。他执政的第一年曾为东欧国家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而欢呼过，尽管美国的经济已是千疮百孔，他仍然准备慷慨解囊，以鼓励这些民主国家的小兄弟们，在他看来，这有助于在他的设计下建立“美国领导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他被这个“新秩序”的念头紧紧抓住，因此，在他执政的第二年，当伊拉克人以吞并其邻国科威特的行动向他建立“新秩序”的努力进行挑战时，他领导下的美国还是不由自主地吹响了另一次战斗的号角。尽管布什聪明地促使德国人、日本人、沙特人为他出钱打仗，尽管他最终打了一场空前的大胜仗，但是，如果说布什政府曾经有过一个经济复兴计划的话，那么，这个计划肯定已在海湾战争的军号声中化为泡影了。当布什政府以异乎寻常的热情致力于建立国际“新秩序”和对伊拉克进行惩罚时，美国经济，这个急待医治的病体，实际上成了一个无人照看的孤儿。在此情况下，还有什么指望能制服“三高”呢？

1991年4月，布什总统在华盛顿主持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从中东凯旋而归的美国英雄们，当他向全世界宣布“越南战争以来徘徊在美国的幽灵已被彻底埋葬于中东的大沙漠里”之时，人们大都认为他将戴着这顶胜利的桂冠赢得1992年的大选，连任总统。然而，一年之后，他却被美国人民抛弃了。在美国政治中，一个永远不变的铁的规律是，选民们总是以生活水准的提高

与否，作为投票时的判断标准，而当美国的老百姓在 1992 年回顾布什政府的 4 年时，竟很难说出政府在这 4 年里，在经济上究竟都做了些什么？他们希望看看另外一个人到底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于是，美国人选择了比尔·克林顿。

“三高”，这个困扰美国经济的痼疾，再加上居高不下的失业，被留给了白宫的新主人比尔·克林顿。

克林顿：对症下药

最讲求实际的美国人，在大选之年却偏偏爱听美丽的诺言，喜欢新的语言，愿意给那些以新的语言讲话的人一个机会，去尝试领导美国的滋味。

在 1992 年的总统大选中，比尔·克林顿向美国人民许下了最美丽的诺言：振兴美国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他还以新的语言讲话：当一般人将军事实力等同于国家安全时，他用经济语言来解释国家安全的概念。他因此而得到了美国人民的授权。

为角逐 1992 年的总统宝座，克林顿提出了一个“新誓约”。

1991 年 12 月 11 日，他在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发表演讲时，宣布了这个“新誓约”的部分内容：

“我们需要有一项冷战结束后保证美国安全的新誓约。”

“美国必须恢复经济实力，保持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军事力量固然继续是我们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条件，但相对经济而言，其作用正在降低，在火力上花钱过多而在智力上花钱过少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现在我们必须懂得，我们的国家安全主要是经济上的，而过去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参与世界经济的成功与否，并非看它是否使华盛顿的政治家们上了头条新闻，而是看它是否给辛勤工作的美国中产阶级带来了好处。”

美国新闻界据此创造了“克林顿经济学”这个新名词。

1993 年 2 月 17 日，克林顿向国会提交了他执政后的第一个“国情咨文”，在这里，他抛出了一个“综合经济复兴计划”。同年 4 月，克林顿向国会提交了 1994 财年预算案。从这两个文件及 1993 年美国的一系列经济举措来看，“克林顿经济学”的主要政策主张，是以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节和干预为主，增税节支、促进投资、扩大就业、加强科技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扩展对外贸易等等。

1. 增加税收。如果说“里根经济学”的减税措施有“劫贫济富”嫌疑的话，那么，克林顿的增税措施则实实在在是“向富人开刀”。这方面的主要措施有：对年收入超过 14 万美元的家庭和超过 11.5 万美元的个人，将所得税率从 31% 增至 36%；对年收入超过 25 万美元的个人，另征收 10% 的附加税；将大公司的最高所得税率由 34% 提高至 36%；对那些从政府社会保险项目中每年领取养老金超过 3.2 万美元的富有退休者，将其应纳税额由原来的 50% 扩大为 85%；全面扩大能源消费税。这些增税措施的目标是在此后 5 年内增加收入 3200 亿美元。

2. 削减开支，特别是从削减军费开支中谋取“和平红利”。首先是削减国防开支，计划在 1994—1997 财年的 4 年中，减少军费开支共约 880 亿美元。作为第一步，我们看到 1994 财年的国防开支已比 1993 年减少了 100 亿美元，而 1995 财年，针对俄罗斯大国主义政策抬头和军界对削减国防开支的批评，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仅比 1994 财年下降 28 亿美元。其次是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特别是浪费巨大的医疗保健体系，估计能从这里节省上千亿美元。大幅度裁减联邦政府雇员也是节支措施之一，计划此后 4 年内从政府雇员中裁掉 10 万人，将他们 1994 年的工资冻结一年，今后的提薪幅度也要降下来，试图以不提薪和低幅度的提薪刺激一些人离开政府，另谋高就，据一项保守的估计，从这里又可以节省至少 100 亿美元。克林顿的算盘是，到 1997 财年，

能将赤字降低到 1800 亿美元左右，而如果不加控制的话，估计到那时，政府赤字可能达到 5000 亿美元之巨，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可怕的数量。

3. 扩大就业。这是克林顿短期经济刺激计划的主要目标。为此，他决定政府在 1993 年增加 300 亿美元开支，用于发展公共工程，创造 50 万个就业机会，并计划在今后 4 年内，通过向基础设施领域投资 2000 多亿美元、给予一批中小企业税收和信贷优惠、开展广泛的就业培训计划等等，创造 800 万个就业机会，基本解决失业问题，或者至少将失业率控制在 1976 年规定的 4.9% 的标准之下。

4. 扩大对经济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政府计划在此后 4 年内投资 2200 亿美元，改善美国的通讯、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实施大规模的环境净化工程，向青年人提供贷款资助他们完成大学教育，向穷人提供广泛的教育资助和就业培训。与此同时，政府在此后 4 年还将向私人投资者提供 260 多亿美元的投资和税收优惠，鼓励他们投资开办中小企业和进行技术推广项目，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为美国培养更多的熟练劳动力。

5. 加大科技投入，特别是通过促进军事工业的军转民进程，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民用高技术。政府决定将从削减国防开支中得到的“和平红利”大量投入到民用技术的研制和开发方面，初步的计划是，每年从军事研究费用中拨出 300 亿美元，用于资助光纤通信、生物技术、计算机网络建设等领域的研制工作。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军转民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统一协调下，实施一项“技术再投资计划”，探索将美国军事科研部门许多处在前沿的高技术转化为民用的可能性。1993 年，政府为该计划拨款近 5 亿美元，在 1993 年 5 月到 7 月的两个月内，向全国的 1 万多家公司、大学、研究机构和地方政府征集了 2800 多个合作开发项目，经严格的审查和论证后，已选定了 200 多个资助项目，涉及几十个技术领域，需投入资金 6 亿多美元，为大力推进这个计划，据说克林顿总统已决定在 1994—1997 财年预算中，准备再拿出 30 多亿美元。

6. 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着重调整贸易政策，提出“公平贸易”的新概念。美国政府一向都是强调“自由贸易”的，他们相信，凭着美国的高技术和产品质量的优势，在一个开放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中，美国能轻而易举地打进任何国家的市场并独占鳌头。一个鼓吹自由贸易的政府，当然只能听命于自由竞争的自然法则，在企图占领别国市场的同时，也要允许其他国家自由地进入美国市场，因此，我们看到，即使是在美国拥有巨大贸易逆差的时候，布什总统依然高举着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但克林顿上台不久，却提出一个“公平贸易”的概念，他在 1993 年 2 月底于美利坚大学发表的演讲中说，如果美国在进入某国市场的时候遇到麻烦，遭到他国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的阻隔，美国也将采取相应的报复行动，以求得“对等”和“公平”。就连一些急于拓展外国市场的美国大公司也看出，所谓“公平贸易”实际上就是保护主义，就是要打“贸易战”。克林顿上台不久，就指示他的贸易谈判代表坎特加快同日本的贸易结构协商，要在打开日本市场上取得进展。1994 年 2 月，克林顿把日本首相细川护熙请到华盛顿去，亲自同他谈，向日本提出了开放市场的“数值化指标”。1993 年 9 月底，克林顿提出一个所谓“国家促进进出口战略”，采取各种措施鼓励美国企业增加出口，以减少美国的国际贸易巨额逆差，并为美国的工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据统计，1992 年，美国向亚大地区的 1300 亿美元出口额，为美国创造了 230 万个就业机会，因此，

美不仅在 1993 年 11 月主持召开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一次非正式会晤，为美国进一步打入高速增长的大东亚经济圈作铺垫，而且在处理与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时，也动辄挥舞“超级 301”这很大棒，声称要实行“公平贸易”。

以上是克林顿经济政策的几个主要方面，这些政策措施已经对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发挥了作用。美国经济自 1990 年步入衰退后，在 1991 年跌入谷底，出现了 1.9% 的负增长。此后就开始缓慢回升，但依然走势低迷，1992 年，在 1991 年负增长的基础上，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还不到 2%。进入 1993 年，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观，第 1 季度只有 1.8% 的增幅，第 2 季度增幅为 1.9%，第 3 季度攀升至 2.9%，到了第 4 季度，经济增长按年率计算竟达 6.9%，令整个世界感到震惊。这样，1993 年全年增长率达 2.8%。1994 年 7 月 27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它发表的 1994 年度报告中，对 1993 年美国经济的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美国经济的复苏刚开始时非常缓慢，1993 年则变得牢固地站稳了脚跟。到 1993 年年底，设备利用率达到 83%，平均每周的工作日超过了战后的最高水平，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开始连续地增长，失业人数进一步减少。”

经济回升的两个明显的事实是失业率的降低和大公司利润的增加。1992 年底高达 7.5% 的失业率到 1993 年 11 月降至 6.4%，回落至 1991 年以来的最低点，经济复苏创造就业机会 160 万个。老百姓收入增加，私人住宅销售额是 14 年最高的。而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降至 2.9% 的低水平。反映美国经济活动情况的 500 家大公司在 1992 年曾出现近 2 亿美元的亏损，这些公司作为一个整体的亏损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在 1993 年，同样是这 500 家公司，利润猛增 10.5%，达到 626 亿美元。进入 1994 年，强劲的增长势头依然不减，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一年之内六次提高利率，以制止某种程度的经济过热。最后，1994 年美国创造了自 1984 年以来最高的增长率，达 4%。克林顿总统在他 1995 年 1 月 24 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说，他上任以来已为美国人创造了 600 万个就业机会，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是 25 年来最低的，过去两年，削减开支达 2500 多亿美元，砍掉了 300 多个不必要的开支项目和 10 万个联邦政府职位。

从理论上说，“里根经济学”是对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盛行的以加强政府干预为主的凯恩斯主义的否定，他重消费轻投资，重自由放任而轻政府干预，而且大幅度减税，走的是以消费需求刺激经济发展的路子。“克林顿经济学”则正好反其道而行之，以增税措施抑制消费，而将公共和私人开支引向投资领域，并且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计划和指导，走的是以加大投资刺激经济复兴的路子。从罗斯福“新政”到“里根经济学”，再到现在的“克林顿经济学”，应该说是从理论上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里根经济学”最终制服了“凯恩斯主义”发展到极端所导致的“滞胀经济”，实现了美国经济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稳定增长，但却产生了结构性的“三高”顽症，那么，现在“克林顿经济学”反其道而行之，能否制服“里根经济学”发展到极端而产生的“三高”呢？理论上不是没有可能，但实际情况究竟会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信息高速公路：未来的“倍增器”

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任何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只要能占领那个时代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就一定能在经济上独领风骚。这既是一个被历史无数次证明了的客观规律，又是当今世界少有的，存在于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一种世界性共识。

正如笔者在本章开始时所讲的，充分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是美国经济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更深切地感受到科技进步给国家实力和人类生活带来的积极变化。只要提到下面的数字，就不难理解战后美国经济迅猛扩张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 50 年间，世界上 65% 以上的科技发明是首先在美国诞生的，75% 以上的科技发明成果是首先在美国投入应用的。本世纪 40 年代至 80 年代，美国政府共主持进行过 3 次大型的科学研究系统工程：40 年代以制造原子弹为目标的“曼哈顿计划”使美国成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领头羊；50、60 年代以实现载人宇宙飞行为目标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为美国的技术进步再造辉煌；1983 年里根政府提出的以在外层空间部署反导弹系统为目标的“战略防御计划”（即人们熟知的“星球大战”计划），是美国政府的第 3 个大型科技开发系统工程。尽管这些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军事性的，但在这些计划实施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群落，对美国经济腾飞的推动作用，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远的不说，在回望 80 年代美国经济持续 8 年的稳定增长时，人们会同意，“战略防御计划”的技术带动作用功不可没的，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高科技城“硅谷”就同这一计划有密切关联。

这一次，当克林顿谋求振兴美国经济时，再一次将目光的，计划在未来 20 年内建成。它的目的是将美国的每个家庭和每个办公室连接在一个共用网络，使每一个人都能从这个网络中快速得到他所需要的信息，将经济活动中的生产与消费、需求与投资、投资与产出等等，统一在一个网络中，缩短时间，提高效率，缩短距离，增大空间，使整个国家生活进入一个快捷和高效的年代。毫无疑问，这将是一个导致美国经济发生质变飞跃的计划。

自美国政府 1993 年提出该计划后，美国各大公司即掀起了一个针对信息高速公路的投资热。美国目前已经拥有一个由 24 颗近地轨道卫星组成的全球定位和导航（GPS）系统，但美国的“微软公司”和“麦科尔便携通信公司”仍决定联合投资 90 亿美元，建立一个由 840 颗近地轨道卫星组成的全球卫星通信网，作为将来“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主干道”而发挥作用。美国无线通信业的霸主“摩托罗拉公司”也打算耗资 33 亿美元，建立一个由 66 颗卫星组成的全球移动电话系统。目前，高速公路的投资热方兴未艾。据说美国政府的设想是在未来 20 年中，官民并举，投资约 4000 亿美元来建设这一工程，其中，政府出资约 300 亿美元，其他的 3700 多亿美元将主要由民间的各有关大公司筹措，但政府将在金融政策上予以支持。为此，克林顿政府在计划提出不久，就任命成立一个由商务部长罗纳德·布朗为首的特别工作小组，协调对信息高速公路的投资计划，后来，副总统戈尔又被任命为这一计划的官方协调人。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耗费巨资来建立这条“信息高速公路”？有没有可能建成？建成后又会有什么样的效益呢？

最根本的一点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引起一场革命，它不仅将极

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而且展现了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跳跃式升级的广阔前景。对此，美国《商业周刊》1994年5月22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势不可挡的数字化》的文章写到：

“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组产业带动经济其他方面的发展。一个世纪以前，铁路是美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在战后的数十年，制造业是美国经济繁荣的关键。在80年代，经济发展的动力是诸如保健、法律服务和零售业之类的服务行业的兴旺。”

“正如今天的美国经济如果没有电就不可想象一样，明天的美国经济将靠信息的自由流动来推动。”“信息经济正推动90年代经济的增长，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信息经济会变成就业机会和经济繁荣。”

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教授认为：“信息的作用正在改变整个经济生活的性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美国人看到，历经一个世纪建立起来的、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网也许已经难以满足国家经济迅猛扩张的需要了，美国国会遂在1944年批准在全国建立长达4万英里的州际高速公路，将美国各州、各大城市联成一体。1956年，国会又为此拨款250亿美元。到1974年，美国已拥有4万多英里的州际高速公路。对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的考察表明，在建立州际高速公路网的20年间，美国的国民收入翻了1番还多：1958年，美国的国民收入是4062亿美元，1978年增长至9414亿美元。这个奇迹是在一个“硬件”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作用的年代实现的。现在，时代不同了，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软件”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年代。在这个时代，美国人率先提出了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

美国拥有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先进的信息技术资源，它的信息产业全球第一，美国这一行业中的许多大型的跨国公司亦积累了庞大的资金，因此，无论从技术到资金，在美国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前景都是光明的。当然，据说目前在用户服务装置、数字信号解码器、电视机顶端箱等领域仍存在许多的技术困难，因此，也有预言说该计划在技术上将是行不通的。但应该看到，“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本身，既是一个充分利用现有科技成果的过程，又是一个在不断解决难题中取得新突破、开发新技术的过程，以现代科技进步的速度，完全有理由对未来20年的科技革命持乐观态度。

关于“信息高速公路”的经济效益，美国的时代一沃纳公司作过一项预测。目前，美国电信服务业每年的营业额大约是1725亿美元，有线电视的服务收益约140亿美元，两者加起来总共是1865亿美元。据预测，“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后，参与其中的四大服务业的年度收益情况将是：购物和金融服务1600亿美元，电子通信1500亿美元，信息服务350亿美元，娱乐服务280亿美元，总计在3800亿美元左右，将增长1倍多。据预测，单是用于“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4000亿美元投资就能创造约1万亿美元的商业价值，随着这一工程的进展，到2007年，将使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3万多亿美元，劳动生产率提高20—40%。这一工程建成后的连带社会效益及对美国国际地位的影响更是难以估量。

不仅如此，美国还有一个建立世界级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美国副总统戈尔在1994年9月初提出了一项建立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方案（英文缩写：GII），呼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合作，将它们各自的信息基础设

施网络连接起来，建立一个全球信息基础网络。据说，戈尔已经根据克林顿总统的指示，将他的方案提交给了 1994 年 9 月 19 日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由国际电信联盟会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起的全球电信基础设施竞争情况研讨会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部长级会议、美洲国家首脑会议、西方七国集团关于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部长级会议等国际论坛，以便展开广泛的讨论。在他为“GII 计划”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戈尔说：

“信息高速公路——更确切他说是分布式的智慧网络，将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全球社会分享信息，相互联系和沟通。通过这种联系，我们将能实现强劲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建立强大的民主社会，改进解决全球和各国环境问题的办法，提高医疗保健水平，最终增强共同管好我们这个小星球的责任感。”

“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还将成为世界各国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以美国为例，信，包基础设施在 90 年代美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不亚于本世纪中叶交通基础设施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把计算机信息网络融入经济，提高了美国制造行业的生产力、竞争力和对变化中的情况的适应能力，它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也将起到同样的作用。”

“一个国家或一个公司如果不加入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如果不能获得最新的信息，如果不能同世界各地的用户进行瞬息沟通，那它就无法参与全球经济竞争。”

不难看出，“信息高速公路”就是美国政府选定的又一个高科技开发的系统工程，也是本世纪美国政府主持的第 4 个、也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科技腾飞工程。

毫无疑问，“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将是一个技术密集和交互影响的系统，由于目前该计划仍然处在可行性论证和技术选择的初步阶段，因此，关于“信息高速公路”的详情我们仍然不得而知。从它的规划看，至少必须在光导传输、数字通信、新型载波材料、高灵敏度传感器、用户终端机、数字信号解读者等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才有可能建立起来。另外，据国际科学界权威的看法，90 年代将可能有 9 大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它们是：微电机领域、并行计算机技术、基因改造技术、能源技术、新材料、软件编制技术、光纤化学、超高能性能芯片、数字成像。从目前关于信息高速公路的设想看，在可能取得突破的 9 大关键技术领域，除能源和基因改造外，有 7 大技术同它有关。可以想见，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实施必将像“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和“战略防御计划”一样，产生出又一个高新技术群落，带动美国经济的复兴，所不同的是，由于站在一个比以前更高的基础上，这一次的技术创新将来得更快、更猛、更加多样化。

因此，笔者的结论是，围绕“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而展开的大规模科技开发活动，将如当年的“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一样，使美国再执世界科学技术之牛耳，使美国的经济在未来 10 年内再上一个新台阶。毕竟，过去 300 年来的世界历史演进，使我们学会相信科学技术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如果在一个新的世纪到来之际，科技进步的辉煌成果不能带来新的经济复兴，那过去 300 年的世界历史将变得荒谬绝伦而难以理解。

低速稳定增长的新时代

1994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参与世界经济活动的权威组织，在一个月之内都先后提出了它们对未来几年经济增长前景的分析。据这些组织的预测，主要由于美国经济复苏的带动，从1994年开始，世界经济将出现一个新的增长时期，当年的增长率将达3%以上，从1995年开始，将可能稳定在2.5%—3%之间。这实际上是乐观地预见了一个低速稳定增长时代的到来。

1994年5月23日，“全美企业界经济学家联合会”发表的一份报告预测说：在企业投资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推动下，1994年美国将出现自1988年（增长率为3.9%）以来最高的经济增长率，达3.6%，（最后实现了4%的增长，超过了1988年），1995年的增长可能趋于平缓，估计为2.8%。

如果更进一步去观察，看看美国经济在1993年和1994年出现的一些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积极迹象，就不难看出为什么世界各地会有如此乐观的看法。

从美国工业的情况看，在高新技术产业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同时，一大批在过去10年被挤垮的传统工业重新恢复了生机：

——美国汽车工业重新崛起并展现了可喜的发展前景。美国是一个“装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汽车工业虽然是一个传统工业，但却历来是反映美国工业竞争力的重要指标。80年代初，日本汽车产量第一次超过美国，名列世界第一，自那时以来，美国的汽车工业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但以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3大公司为代表的美国汽车业，自90年代初以来下大力气实现了技术的现代化，调整了产品结构，学习日本的管理经验，在生产和管理方面真正实现了一场“汽车革命”，终于东山再起。1993年，3大公司的销售额和利润均创造了10年来的最高纪录，不仅如此，最新资料显示：通用公司1994年第2季度的纯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倍多，达到19.2亿美元，福特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也分别达到创纪录的17.1亿美元和9.6亿美元，3大公司合起来，1994年上半年的销售额比1993年同期增长了10.3%，纯利润增长了近1倍。更令美国人振奋的是，福特公司在被日本人打败近20年后，再次杀回日本：该公司生产的一种名为“马斯汤”的轿车，在打进日本市场后，竟比日本同类汽车的售价低7000美元，大受日本消费者的欢迎。未来几年，在与日本同行的竞争中，美国汽车业将以一个新的面貌出现，夺回昔日的辉煌。

——钢铁业。美国的钢铁业可能是过去20年衰落最严重的一个工业部门。但由于汽车、建材和重型机械制造业的复兴，1994年的钢铁消费量估计将有10%的增加，为满足这一需求，目前的钢铁行业正以创纪录的95%的开工率进行运转。这种情况使得美国梅林公司一位几十年来从事钢铁业分析的专家惊呼到：“几十年来第一次，钢铁业发现自己面临着生产能力不足的约束。”

——化学工业。一项在1994年7月初发表的调查报告称：美国的化学工业在经历了10年的技术改造后，丢弃了旧的东西并对企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在各类商品中更加重视能赚钱的特殊化工产品，而且正在取得成果。报告预计，美国化工业将随着整个经济的复兴而走出困境。

——近20年来受到亚洲纺织品进口冲击而濒临倒闭的美国纺织业竟起

死回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1993年，代表美国纺织业的28家大公司的销售额增加了10%，达160亿美元，利润增长了28%，达到近6亿美元。整个行业的库存货物减少到占总资产的23%。两年前该行业的长期债务占到债务总额的48%，而1993年，这一比例减少到32%。目前估计1995年的出口和利润仍将增长5%以上。这种出人预料的增长，使得20年来一直萎缩的纺织品原料市场措手不及，原料开始出现短缺，价格也在上涨，这一情况造成的连锁反应是：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者几十年来第一次得到了扩大种植面积的机会。

——投资规模激增，扭转了近几年来工业投资萎缩的趋势。1993年，企业用于增加新设备和开建新工厂的投资猛增了16.3%，1994年，这一投资又比上一年增长了11%，高于对其他任何部门的投资。几年前，由于受资金的限制，许多美国企业热衷于租用先进的新技术，用于在订货激增时暂时抵挡一阵子，而不愿意承担购买新设备后可能闲置的风险，但这一次，对增长的信心改变了他们的投资方向。这些投资将以更现代化的设备取代过时的设备，从而提高一个国家的长期生产率，还将改善经营管理能力。

——美国经济中的许多“软件”正在蓬勃发展。例如，美国的广告业，在1993年12个主要工业化国家共计2425亿美元的广告费收益中，美国广告业占到1340亿美元，在1994年预计4000亿美元的广告收益中，美国可能将占到2000多亿美元。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据说世界各大公司最有价值的资产是它们的产品名牌，而在1994年中进行的一次商品名牌估价中，美国的“可口可乐”名列榜首，价值360亿美元，处于前列的还有美国的“万宝路”（330亿美元）、“雀巢”（115亿美元）、“柯达”（100亿美元）、“微软”（98亿美元）、“摩托罗拉”（92亿美元）、“吉列”（82亿美元）、“惠普”（70亿美元）、“通用电气”（57亿美元）和“百事可乐”（49亿美元）等名牌，这些名牌所代表的实力是其他国家不可企及的，对现代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咨询业——“出点子”的行当在美国更是盛极一时：1993年，美国咨询业的从业人数达到8万多人，行业收入为170亿美元，这种以给经济、特别是大公司经营“诊断和治病”为己任的行业的兴旺，是美国新的智能型经济的标志之一。

——美国的资本证券业恢复了活力。美国的金融公司和证券市场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遭到经济衰退的沉重打击，大规模的裁员和资本总额的锐减是当时的主要景象。而1993年，证券业却宣布取得巨额利润，再次扩充人员，并声称“美国已经恢复了世界金融交易之都的最高地位”。据统计，1993年年底，美国证券市场约占世界股票资本总额的37%，价值5.2万亿美元，同期，日本所占比重为21%，价值3万亿美元，英国8%，价值1.2万亿美元，这种情况同1988年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当时，日本证券市场占世界股票资本总额的40%，价值3.9万亿美元，美国只占29%，相当于2.8万亿美元，英国占8%，价值为7710亿美元。美国的金融专家们称：“美国已经恢复了它在世界占统治地位的股票市场的最高地位。”

——80年代受打击最大的美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已经再度崛起，令人耳目一新。包括底特律、芝加哥等工业中心在内的一大片地区，60、70年代一直是美国最繁荣的经济心脏地带，而在80年代遭受沉重打击，尤其是在底特律的汽车业和芝加哥的银行业被日本打败之后，其衰落之惨状世所共知。然而，调查显示，主要由于计算机芯片、医疗保健、金融服务和汽车业的再度兴旺，

1993年，中西部经济的增长率达到4.9%，高出全国增长率（3%）近2个百分点，1994年，它的增长率将达到4.3%，仍可能高出全国增长率，而且，该地区近几年的出口增长率一直是其他地区的2倍。制造业的就业情况也比其他地区强得多：1989年，该地区由于失业而流失的人口为13.4万人，而1993年至今，单是该地区制造业的勃兴，就带来近11万的人口增长。在美国失业问题严重的今天，中西部已经成了实现充分就业的样板，一项调查表明：像芝加哥、印第安纳波利斯和哥伦布城等中西部大城市，现在已是全国的大学毕业生向往的高薪水、低房价的理想工作地点。

——据1994年秋天举行的一次国际劳工会议提供的情况，自从里根政府以来，美国的劳工运动一直处在低潮，工会会员的密度下降到劳动大军的15%左右，可能是主要工业国中最低的。美国拥有1300万会员的“劳联—产联组织”已很难声称它代表美国劳动人民讲话了，这种状况同70年代工会势力在美国经济中的巨大作用形成鲜明的对照。由于相对稳定的劳资关系，以及由于广泛的失业，工会再难以组织大规模的抗议来要求增加工资，美国垄断资本将可能第一次面对相对低廉的美国劳动力，把产品成本控制在最低限度以赢得价格优势，从而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正是基于美国经济活动中出现的这一系列积极变化，我们对美国经济在今后几年乃至下个世纪初的发展前景表示乐观，总的估计是，经过此次复苏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可能将再次走上一条低速稳定增长的道路。在1994年年中，这也可能是整个世界带普遍性的看法。

1994年4月18日，美国颇有影响的《幸福》杂志刊登一份题为《竞争力——目前美国公司总的情况如何》的调查报告，报告在逐个分析了美国经济中8大行业（食品、机动车辆、机械制造、仪器仪表、半导体、计算机、计算机软件、金融服务）的竞争力现状后得出结论说：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依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总体形势是乐观的。

1994年9月21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一份题为《争取在全球经济中获胜》的关于美国国际竞争力状况的官方报告，在这份由商务部起草提交国会讨论的、着意为克林顿总统的经济政策歌功颂德的报告中，商务部在将美国经济活动的数据同其他几个西方工业国进行对比后，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已经增强，并将因此而赢得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商务部长布朗在国会作证介绍这一报告时说：“经济重新回到了轨道上，全球市场的前景非常光明，在克林顿政府执政的头18个月中，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十分活跃。”“经济增长率、就业率、生产率以及厂房与设备开支都在增长，而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正在下降。实际上，应该上升的统计数字大部分都上升了，必须下降的统计数字也都下降了。”该报告提供了下面这样一组统计数字来支持它的结论（美国与7国集团平均水平的比较）：

——1992年的人均GDP：美国是2.32万美元，而7国集团平均水平为1.85万美元。其中德国为2.04万美元，日本为1.97万美元。

——1987至1993年的就业增长率，美国是8.4%，7国集团平均为3.9%。

——1994年第2季度失业率：美国6.1%，7国集团平均8.8%。

——1985至1993年单位劳动成本同比增长率，美国1.1%，七国集团平均6.6%。

——政府预算占 GDP 的百分比：美国 3.5%，7 国集团平均 5.1%。

——1985 至 1993 年工业生产率年增长率：美国 2.9%，7 国集团平均 2.8%。

——1993 年净投资占 GDP 的百分比，美国 3.4%，德国 5.7%，日本 15.4%。

——1993 年经常项目赤字占 GDP 的百分比：美国 1.6%，七国集团平均 0.4%。

这份报告尽管带有自吹自擂的性质，但其结论和数据是可信的，因为它并不讳言美国经济中仍然存在的严重隐患，而且，无独有偶，该报告的结论，与在世界另外一个地方几乎同时发表的另外两份报告的结论是一致的。

1994 年 9 月初，设在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和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了 1994 年度的世界竞争力报告，该报告以各国的经济数据和全世界 1.65 万名大企业负责人的答卷为依据，对 41 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进行了综合评估，评估的标准有 8 个：国内经济实力、国际经济活动、政府政策、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管理状况、科技资源和人的素质。该报告的结论是：美国经济回升的强劲势头、美国企业家的能力及近 10 年来的经济调整，使美国的国际竞争力自 1985 年以来首次超过日本，上升为世界第一。几乎与此同时，瑞士银行协会发表了一份题为《世界经济地图》的研究报告，对当前世界经济的现状进行评估，并据此预测了未来 20 年的发展趋势，该报告的结论是：美国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

勿庸讳言，美国经济中仍然存在严重问题，最典型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三高”或曰“四高”——高赤字、高债务、高贸易逆差和高失业。这些都属于经济转型时期的结构性弊病，是长期积累而成的，解决起来亦非一日之事。但应该看到，当前世界经济中存在着许多有利增长的因素。这些有利因素为美国克服其经济中的结构性困难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它们是：

——低通货膨胀率。目前，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低于 3%。7 国集团的其他国家通膨率也控制在 3%—4%，这比 80 年代西方经济持续增长时代的通膨率还要低。美国在 1974 年衰退中通膨率升至 12.4%，1980 年的通膨率为 13.5%，而进入 90 年代，即使在出现衰退的 1990—1991 年，通膨率也未突破两位数。低通膨率的长期趋势无疑有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稳定而廉价的能源供应。以石油价格为例，在 1990 年秋冬的海湾危机期间，油价曾短时间突破 30 美元 1 桶，但随后即开始回落，海湾战争结束这几年来，石油价格连年下降，一直徘徊在每桶 16—17 美元的价位上。从目前的趋势看，并考虑到不久的将来伊拉克这个产油大国重返国际石油市场的可能性，油价还可能继续下跌。尽管自 1973 年石油危机以来西方工业国特别是美国，在新能源的开发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石油依然占据世界能源消费的首位。以美国为例，它的石油进口量已从 1985 年的每天 452 万桶，上升至 1992 年的每天 788 万桶，进口石油占国内需求的份额，已从 1985 年的 31.5% 上升至 1992 年的 46.5%，在此情况下，一种低价而又稳定的石油供应，肯定是美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障。另外，由于近年来一大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资金匮乏和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困难，世界各种工业原料的价格一直处在一个低水平上。

——尽管银行利率总是在变化，时高时低，但总的看，近年来西方工业国家普遍奉行低利率政策，这对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起着很大作用。

——低关税或曰更加开放的世界市场。1993 年底结束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了最后协议，已在世界 100 多个国家间签署。根据协议于 1995 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使世界贸易关税得到了大幅度的降低，开辟了国际贸易增长的广阔前景。据关贸总协定估计，自 1995 年新一轮关税减让协议的实施，最初 10 年间，将会使世界每年增加 2350 亿美元的贸易值，到 2005 年及其后，可望每年增加 7550 亿美元的商品贸易值。另据世界上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估算，载入乌拉圭回合最后议定书中的所有这些贸易自由化措施，将可能使今后 10 年的全球产值增加 6 万亿美元，其中的 1 万亿美元在美国。就美国而论，它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及正在积极促进的亚大经济合作组织、美洲自由贸易区，都将极大地改善它的经济发展环境。据一项相对保守的估计，随着亚大经济合作组织的活动走上正轨，美国每年向亚大国家的出口将在它国内创造 250 万个就业机会。美国的一项研究也说，美向国外出口每增加 10 亿美元，就可新创造 2 万个就业机会，而新创造的每 10 个就业机会还可带来 19 个间接就业机会，如果这项研究的结果可信的话，那么，未来 10—20 年，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建立对美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就不言自明了。

——科学技术进步及美国在这方面的巨大优势，等等。

本章的最后结论是：在美国经济史上，曾推动美国经济成长的那些因素将继续发挥作用，困扰和羁绊美国经济增长的那些因素有些已经消失，有些仍然存在，新的羁绊还将可能出现。然而，正如历史已经证明的那样，困难与发展共生，但并不能阻碍发展，在这个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时代，占据世界科技革命制高点的美国，其经济仍将持续增长，并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雄居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今天和明天的白宫主人

每一个长期关注国际事务的人都会发现，“白宫”可能是当今国际政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这个词并不简单地代表一座“白色的房子”，它代表美国总统、美国政府、美国政治、美国政策，总之，在这个世界上，白宫代表美国。

如果要把美国政治浓缩成一句话，那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为争夺对白宫的控制权，从而也是争夺对美国的控制权而斗争。这种争夺，被政治史家们戏称为“驴象之争”。四年一度的“驴象之争”是美国政治的悲喜剧，也是一出没有尽头的连续剧，观看这出悲喜剧历来是了解美国政治的最好途径。

1992年11月4日，美国又一次总统大选的结果就要揭晓了。经过一年多紧锣密鼓的竞选战争，此刻，在美国，有两个人最关心这轮争夺的结果。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是在任总统乔治·布什，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坐等大选的结果，对这位68岁的老人来说已经是第三次了，他紧盯着电视屏幕，一字不漏地听着CNN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宣布从各选区不断报来的选票统计结果，忐忑不安地“等着另一支鞋子掉下来”，在他旁边的办公桌上，摆着他的竞选班子的最后一件工作成果：两份讲稿，一份是感谢美国人民再度授权他来领导这个国家，一份是表示接受人民的选择并祝贺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心跳愈来愈快的总统当然希望不久就能宣读前一个讲稿。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州长官邸，坐着46岁的比尔·克林顿州长，这位年轻气盛的州长尽管是第一次作为总统候选人等待这个时刻，但在向美国人民宣讲了一年多关于如何“振兴美国”的宏伟设想后，他似乎显得信心十足。

这一天晚些时候，全世界都获悉了比尔·克林顿当选为美国第42任总统的消息。布什总统，这位头顶着海湾战争胜利光环的英雄，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场选择中被美国人民抛弃，会败在一个来自南方小州阿肯色的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手下。但这是人民的选择。他只好强打起精神，拿起那份他最不愿意宣读的讲稿，步履沉重地走向白宫新闻发布室，发出他对当选总统比尔·克林顿的祝贺……

1992年的总统大选是美国政治的一道分水岭，它的划时代意义在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兵彻底退出政治舞台，美国政治的战后时代宣告结束。克林顿的当选是新一代美国人的选择，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从此开始执掌美国政坛。这一代人在战后美国的顶峰时代出生，在越南战争时期的校园骚乱和街头政治中迷失，在里根时代的繁荣中回归正统，今天，在美国力量趋于衰落之际，他们举起了变革求新的旗帜。这一代人的独特经历决定了他们对世界和美国有着与前辈完全不同的看法，在肩负将美国带进下一个世纪的重任时，他们的口号是：塑造一个新美国。

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美国”呢？

克林顿其人

最近 20 年来，在美国，一个人如果为自己立下了竞选总统的雄心大志，他总是要先做一件事，那就是为自己树碑立传，告诉那些即将投票的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怎样当总统？1976 年，来自佐治亚州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写了一本《为什么不尽力？》（《WhyNotTheBest？》）的小册子推销自己，他在那本书中说，由于他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算得上是一个天资超人的学生，院长和教授都曾寄希望于他能成为 1946 年毕业的那一届学生中成绩最优秀的，但由于他并未尽力，毕业时的成绩排在第 43 名，海军学院的院长在毕业时只问了他一句话：为什么不尽力？卡特表示，假如美国人民选举他当总统，这一次他一定尽力去做。他最后赢得 1976 年的总统大选，入主白宫。1988 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布什出版了名为《放眼未来》（《LookingForward》）的自传，讲述了他在几十年坎坷的政治生涯中，是怎样以一种“放眼未来”的精神渡过了各种困难时期，由得克萨斯的一个石油商人成长为美国副总统的故事，从而告诉美国人民，他将以同样的“放眼未来”的精神，给美国的总统职位带来政治远见。布什赢得了 1988 年的总统大选，如愿以偿地入主白宫。克林顿接过了这一传统。1992 年初秋，在美国总统大选紧锣密鼓之际，克林顿的两位崇拜者——阿肯色州府小石城的教育局长查尔斯·艾伦和《阿肯色日报》的编辑乔纳森·波蒂斯——推出了克林顿的传记作品《东山再起的年轻人：比尔·克林顿的生平和事业》（《TheComebackkid：TheLifeandCareerofBillClinton》），使克林顿的竞选活动陡然增色。这本书告诉人们，如今面临衰落的美国，特别需要像克林顿这样一位曾经创造过“东山再起”的奇迹的年轻人，来创造一个使美国东山再起的奇迹。

尽管两位作者在书中称克林顿是一个“从幼年时代起就梦想当美国总统的人”，但事实上，这个一直想当总统的比尔·克林顿直到 1988 年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丢丑之时，在阿肯色州之外的美国其他地方，还不是一个知名人士。

40 年代初，在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的什里夫波特市，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威廉·布莱斯和弗吉尼亚·卡西迪，丈夫威廉是当地的一个汽车推销员，妻子弗吉尼亚是医院里的护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威廉应征入伍，战争结束后他回到了妻子的身边，但却失去了工作。为了谋生，他去了离家几千英里的芝加哥，找到了一份推销重型建筑设备的工作。1946 年 5 月，在他的妻子怀孕 6 个月的时候，威廉在芝加哥买了房子，打算将妻子接到芝加哥安家立业，养育他们即将出世的孩子。然而，命运偏偏同这位苦苦挣扎的年轻人过不去，在他从芝加哥开车回什里夫波特的路上，却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这之后，他即将临产的妻子弗吉尼亚只好投靠她在阿肯色州希望城的父母家。1946 年 8 月 19 日，弗吉尼亚在希望城生下一个男孩，起名比尔，比尔是威廉·布莱斯的遗腹子，他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

希望城实际上只是一座农业小镇，它位于阿肯色州西南部，是阿州与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三州交界的农业区，一个带着孩子的单身女人在这里当农民看来是无法养活孩子的。因此，在比尔出生后不久，他的母亲便离家外出，只身前往邻近的新奥尔良市寻求发展。4 年以后，训练有素的麻醉护士弗吉尼亚回到阿肯色，同温泉城的一位汽车推销商罗杰·克林顿结了婚，她

的儿子也因此而改名叫比尔·克林顿，这就是现今的比尔·克林顿总统。1963年，17岁的小学生克林顿作为阿肯色州中学生夏令营的代表，同来自全国的一批中学生一起，参观了华盛顿。在参议院，他同闻名全国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福布赖特议员共进了午餐，在白宫，他与约翰·肯尼迪总统握手并合了影。像那个时候的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克林顿立刻就被肯尼迪迷住了，在他从华盛顿回到阿肯色之后，他便对母亲说：我要从政。据说，1963年的这个夏天，便是克林顿政治生涯的起点。1964年9月，克林顿进入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攻读国际政治专业。乔治城大学是美国研究国际问题的最好的大学之一，她的外交学院堪称美国外交官的摇篮。由于他的家庭付不起这所大学的昂贵学费，克林顿从二年级起就靠自己打工挣学费了，1968年，他从这所大学毕业，被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成绩非凡的克林顿成为1968年度的“罗兹奖学金”获得者，于1968—1970年，在英国牛津大学进修了两年。关于他在牛津的生活，他的朋友斯特罗布·塔尔博特（现在是美国副国务卿）是这样总结的：他充分利用这所大学提供给他的学习机会，投身到奇妙的知识海洋里去了。克林顿自己说，他在牛津呆的两年里，每年都读大约300本书，但他也承认，由于好奇，他在那里也曾尝试过吸大麻的滋味，所幸并未成瘾。1971年，克林顿25岁时“披着一头长发”从英国回来，随即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对于一个从牛津回来的年轻人，耶鲁法学院的学习生活算不了什么，学业对他来说既不紧张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名叫希拉里·罗德姆的24岁的女孩，并立刻坠入了情网，这个令克林顿神魂颠倒的女孩便是今天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

1973年，克林顿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便回到他的出生地阿肯色州去施展他的抱负，他很快便在费耶特维尔的阿肯色大学法学院谋到一份年薪2.5万美元的教师职位。1974年，在进入法学院教书刚刚只有3个月时，克林顿就迫不及待地出马竞选众议员了。他在民主党众议员候选人提名中大获全胜，但最后在同老资格的共和党众议员哈默施密特的对抗中败北。然而，此次竞选活动却使这位28岁的大学教师在全州出尽风头，并获得了阿肯色州“政界神童”的美名。1975年11月，政治上崭露头角的克林顿同希拉里·罗德姆结婚。

1976年克林顿第二次出马竞选公职，目标是州检察长。这一次，他终于获得了胜利，于1977年1月就任阿肯色州检察长，时年30岁，据认为，克林顿可能是该州有史以来担任这一职务时最年轻的人。1978年，只当了两年检察长的克林顿出马竞选州长，并轻而易举地获胜，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州长。1979年1月10日，克林顿在宣誓就任州长时，许诺要领导阿肯色州走向“成就卓越的新时代”，使阿肯色人民“过上全国人民都羡慕的好日子”。这时，他简直可以说是美国正在上升的一颗政治明星。据说卡特总统在1980年竞选连任时曾有意挑选他作竞选伙伴，但他明智地拒绝了。——在这次总统大选中，卡特惨败于共和党的里根，克林顿由于没有踩上一条下沉的船而保住了自己的声望。

随着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在1980年丢掉了总统职位，他的这位民主党宠儿克林顿也在这一年丢掉了阿肯色州的州长职位。但克林顿是一个不服输的人，落选之后，他到处发表演说攻击新任州长和他的州政府。1982年10月，克林顿在州长竞选中击败弗兰克·怀特而大获全胜，从而成为该州有史以来

第一个曾被击败但又卷土重来而再次当上州长的人。从那时起，舆论界就经常称他为“东山再起的年轻人”。在州长的第二任期内，他通过大幅度提高教师工资和改革公立学校制度，发动了一场所谓“教育革命”，获得了“教育州长”的美称。他在1984、1987和1991年又三次竞选获胜，担任阿肯色州长直到他当总统时为止。其间，1988年7月20日在亚特兰大召开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大丢其丑，他在发表支持迈克尔·杜卡基斯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演讲时被愤怒的听众嘘下了台。《华盛顿邮报》曾用“麻木不仁和焦躁不安”来形容这位最有吸引力的州长。一向对自己的演说能力颇感得意的克林顿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丑，他在事后痛心地说“我倒在了自己的剑上”。

1991年10月3日，比尔·克林顿在阿肯色州议会大厦的台阶上，对着前来助阵的4500名支持者宣布：他将竞选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他的这一决定通过CNN传遍全美国和全世界。经过将近10个月的预选，克林顿渡过了他的对手和新闻界围绕他的性丑闻、逃避兵役、经济问题等制造的危机，在1992年7月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战胜了其他竞争者，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与共和党的在职总统乔治·布什展开争夺，并终于在1992年11月4日当选为美国第42任总统。

从克林顿步入政坛之后的10年间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在美国政界属于持开明观点的民主党自由派那一类，其典型的政治主张是发展教育、减轻穷人负担、为中产阶级代言、主张增加妇女权利和使堕胎合法化、笃信宗教等等。

新人“新政”

1992年的总统大选被形容为是一次“呼唤新面孔”的选举，克林顿的当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在全国政治中基本上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新面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近50年间，先后担任过美国总统的9个人中，杜鲁门(1945—1953年)是战争时期的副总统；艾森豪威尔(1953—1961年)是战争时期功勋卓著、威名远播的五星上将；肯尼迪(1961—1963年)战争时期是一名海军上尉，曾担任过一艘鱼雷艇的艇长；约翰逊(1963—1969年)是二战时期的国会众议员；尼克松(1969—1974年)二战时是一名海军少校；福特(1974—1977年)二战时是一艘航空母舰上的海军少校；卡特(1977—1981年)二战时进入海军，曾在海军中服役7年；里根(1981—1989年)在二战时是一名空军军官；布什(1989—1993年)在战争期间是海军航空母舰上的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总之，直到1992年，统治美国政坛和领导着美国的依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兵”。而与此同时，美国商业界的“亿万富翁”们，军界的四星将军们，如导演过海湾战争的鲍威尔和施瓦茨科普夫，传媒界的报业大王和电视大王们，以及在政界日益上升的政治明星们，也大都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娃娃们”。美国政治的这种极不协调的现象预示着一个变革时代的到来。美国社会的新一代人再也不能容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兵们”继续主宰他们的生活了，他们想要一位同他们一起长大的人在华盛顿当总统，为他们这一代人作出决定。

这时，从阿肯色州走来了比尔·克林顿。尽管阿肯色是一个南方小州，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中从未出过总统，但在1992年这一年，可以说，克林顿一站出来，就几乎注定了他要赢得大选，成为美国的新总统。

1992年秋天，正当美国的总统竞选空前激烈的时候，笔者正在茫茫的西撒哈拉沙漠上执行一项联合国维持和平使命，笔者的两位30多岁的美国同行也通过专门的选票信件投出了他们的一票。出于好奇，笔者问他们：你投谁的票？笔者得到的毫不犹豫的回答是：克林顿。为什么呢？回答是：“他是我们的人。”

很显然，克林顿1992年当选为美国总统是某种历史的必然，无论从他的人生经历还是从“冷战”结束这一客观的历史进程来看，他的当选都标志着美国政治的战后时代的结束，反映了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新一代美国人渴望变革求新的强烈意愿。与克林顿同时当选的、组成美国第103届国会的那些议员，也同样是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批新人：众议院有110名、参议院有13名议员是新当选的，他们大都出生在战后生育高峰期，从而使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平均年龄降为44岁，这是几十年来少见的一届年轻的国会。很自然，投了克林顿及那些首次当选议员的年轻人一票的选民们，都希望在他上台后出现一个“新人新政”的局面。克林顿本人在当选之后也声称：他的当选是“美国的新开端”，他将“给总统职务带来一代人的变化”。这些变化究竟是什么？

据克林顿的传记作家介绍，他在竞选总统期间所发表的演说中，出现最多的是“改变”、“愤怒”和“全球经济”这几个词。“改变”就是要改变美国目前不能令人满意的面貌，“愤怒”据说是针对美国领导层的，表达了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人对权力结构的愤懑和改造美国官僚机构的决心，而“全

球经济”据说是表明了一种优先次序，是要通过振兴经济来改变美国的面貌及不能令人满意的一切丑恶现象。1993年1月20日，克林顿手按《圣经》，宣誓就职美国第42任总统。在他的就职宣言中，他继续重复了变革、更新、责任、领导这些词汇：

“美国要世世代代存在下去，就必须变革。”

“我们保证结束这个僵持停顿和放任自流的时代，一个振兴美国的新时代已经开始。”

“我们必须做美国做得最好的事情：向所有人提供更多的机会，要求所有人承担更多的责任。”

“当我们即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满腔的希望，坚定的信心和严谨的作风，开始我们的工作。”

通过克林顿及他的政府近两年的施政实践，我们看到，克林顿“新政”是一个在经济优先的旗帜下、通过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外军事干涉等手段，继续谋求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地位、继续在全世界发挥所谓“领导作用”以扩张一整套美国式的价值观念的战略，他实施其“新政”的原则是内外兼备，先“治内”，后“治外”，希望以“内治”达到“强外”的目的。

1.新政府。为了彻底改革华盛顿的官僚机器，以回答选民们对一个清新而高效的政府的期待，克林顿在当选总统不久的组阁期间，即给了美国公众一个新的形象。他任命的内阁官员和白宫工作班子，首先是年轻，并代表着不同的人群和背景。例如，为了避免同国会的冲突，他网罗了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本特森为财政部长、长期担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莱斯·阿斯平为国防部长、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为联邦行政与预算管理局局长等，这些人虽然都是在国会有影响的人物，但有的人却是与克林顿有重大政见分歧的人，克林顿将他们纳入内阁，显示了其不以党派成见而取舍的政治家风度。克林顿的内阁还在“种族和性别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普遍性”（克林顿语），14人的内阁成员中，就有4名黑人：商务部长罗纳德·布朗、农业部长迈克尔·埃斯皮、退伍军人事务部长杰西·布朗、能源部女部长黑兹·奥利利等。此外，还有许多妇女入阁：如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莱特、贸易谈判副代表德沃金斯、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唐纳·沙娜娜、环境保护局局长卡罗尔·布伦纳等。克林顿以其内阁的新面貌在美国公众面前进行了“新政”的首次亮相。

在组成了一个颇具新气象的内阁后，上台不久的克林顿即开始向华盛顿的权势集团开刀，打起了“精减政府”的旗帜，意图建立一个“小而精干的政府”。他任命副总统戈尔为负责人，领导一个200多人的庞大工作组，对美国政府部门的现状进行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广泛的调查，终于在1993年9月7日公布了此次调查的结果，提出了一个以裁减冗员、节省行政开支和提高办事效率为目标的精减政府计划。该计划的总目标是在今后5年内将联邦政府现有的210万名雇员裁减12%，即解雇25.2万人，因此而节省开支1080亿美元。其主要内容是：新成立一个“总统管理委员会”，协助政府各部门改革管理制度，并保证使精减机构的协议得到实施，该委员会应在18个月内就政府机构改革设想，向国会提交报告；改革行政程序，扩大行政部门的自主权，将现行的一年一次的预算制改为两年一次，以节约经费；改革人事制度，允许各政府机构在雇佣和解聘职员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关闭农业部设在全国各地的1200多个办公机构，将政府每年对每个农场的价格补贴限制在5万美元以下，并随带停止其他一些传统农业补贴项目；撤消“总统

情报工作委员会”，由“总统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接管其大部分工作，将联邦缉毒局和联邦烟酒火器局等两个独立机构并入联邦调查局；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设在世界 55 个国家的办事处，驻其他国家的那些仍然保留的办事处要尽量缩编；将联邦政府现有的各种名目的顾问委员会裁减三分之一，每年节省出 5000 万美元的经费；冻结联邦政府办公用地，减少办公用品采购数量；在一定时期内冻结联邦雇员的工资水平，暂不增薪。克林顿精减和改革政府的举措受到美国舆论和公众的好评，一年多来进展顺利。

2. 新科技。克林顿上台之初，就提出过美国要在“基础科学、数学和工程学领域保持世界主导地位的战略目标”，强调通过增加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和大力推进美国的科技事业，带来建立新产业、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生产率、改善环境质量、解决能源供应、解决人类面临的健康问题等综合效应。克林顿深信，美国的繁荣需要进行技术革新，需要培养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需要扶持基础科学，并且，他同样深信，美国人民与他抱有同样的看法。因此，克林顿上台后不久，即指示总统科技政策咨询委员会牵头，重新审议美国的科学研究项目及其组织工作，就这一领域的改革向总统提出建议。1993 年 3 月，克林顿抛出一项新的科技政策，主要内容是：成立联邦科学、技术和工程协调委员会，统筹政府各部门的科学研究和开发计划；将美国国防部的“国防高级研究项目署”改为“高级项目研究署”，研究的重点转向民用高技术；3 年内将美国政府对民用高科技研究的投资增加 50% 以上，达到 366 亿美元；鼓励美国企业的技术投资计划，对中小企业用于先进技术的长线投资，减征 50% 的资本收益税；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同时鼓励发展高速铁路和新一代节能型和代用燃料型汽车。为贯彻这一新的科技政策，1994 财年的联邦科研预算拨款达到 714.42 亿美元，比此前有了大幅度的增长。1994 年 2 月，政府在向国会提交 1995 财年预算案时，克林顿“新政”的科技政策又有发展，在这个预算案中，克林顿制定了指导美国科研事业的 5 大目标：确保美国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前沿学科领域的领先地位；加强基础科研和国家目标的联系；建立联邦科学界各部门之间的有效协作，促进对基础科学、工程学和国家的投资，充分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攻关；面向 21 世纪的国际竞争，培养优秀的科学技术人员；提高全体美国公民对科学技术的理解能力。考虑到日本和德国的科研经费分别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3% 和 2.5%，美国决定将其目前科研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仅 1.9% 的比率提高至约 3%，这样，在相同的比例上，由于美国的 GDP 绝对值远远大于日、德两国，其科技投入的绝对值也将远远超过这两国。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在 1995 财年预算中，克林顿提出的联邦科研预算要求高达 742.3 亿美元，比上个财年的拨款增长近 4%，这个数字在总额为 1.52 万亿美元的 1995 财年预算要求中，是仅次于社会福利开支（6370 亿美元）和国防开支（2367 亿美元）的第三大政府开支项目。美国国会经过半年多的审议，在第 103 届国会于 1994 年 10 月休会前，批准了总额为 734.3 亿美元的 1995 财年科研拨款，仍比上年增加 20 亿美元。这消除了选民们对美国科技投入不足、科技优势正在被日本人夺走的担忧。

3. 新环境。针对选民对环境质量下降的关注，克林顿于 1993 年 5 月宣布执行一项新的环境保护政策，其主要内容是：责成美国政府商务部制定一个“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统计方法，在计算国民收入时考虑环境变化的因素，如果某项收益是以污染和破坏环境为代价而取得的，那就不能算是“收益”；

在森林保护与经济发展问题上，设法探讨一种既有利于保护森林资源，又可维持林业工人就业机会的长期政策；在美国农业部成立“国家环境政策办公室”和“国家生物资源调查局”，加强对环境保护工作的规划和指导；增设能源税，从1994年7月起，汽油、天然气和其他家庭取暖用油都将逐步提价，以抑制油、气消费，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增加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在制定新的政府预算时将体现对环保的重视；在庞大的政府采购计划中贯彻环境保护的精神，主要是增加政府对使用代用燃料的机动车辆和其他循环再生品的购买量，减少购买那些含有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的商品；签署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濒危物种；命令商务部加强与能源部环境保护局的合作，制定一项促进美国环保技术出口的战略，将美国重视环境保护的精神贯彻到对外经济关系中，对那些乐于购买美国环保技术的国家提供各种优惠待遇。这个新的环境保护政策在1994和1995两个财年的政府预算中，都通过加大投资得到了体现：在1994财年预算中，政府对太阳能利用和其他再生能源的投资增长30%，对节能措施的投资增长35%，1995财年，政府对环保的投资又有了进一步的增加，总开支达67亿美元。

4. 新教育。教育问题是美国人普遍关注的又一社会热点。人们对美国浪费巨大、教育质量低下、学费日益高涨的公立学校制度越来越不满意，要求改革教育制度的呼声一年高过一年。克林顿在任阿肯色州州长时，曾对该州的教育进行过大刀阔斧的改革，留下了“教育州长”的美名，在他当选总统之际，美国人希望看到一个“教育总统”。克林顿回答人们的这一期待的，便是1993年9月21日签署公布的《国民服务法》。该法首次允许大学生以提供劳务的形式偿还贷款——学生在入学前或毕业后通过参加社区服务来抵偿其借贷的学费：一个学生在社区从事1年的警察、护士、教师、环保人员、图书管理员等工作，如果是在入学前，可减免4700多美元的学费，如果是在毕业后，可抵偿同等数额的贷款，工作期间每年还可领取7400多美元的生活津贴，享有医疗保健和托儿等福利，但如果大学毕业后找到了高薪工作或不愿意参加社区服务，也可像从前那样分期偿还贷款。克林顿称他的计划为穷人家庭的孩子提供了接受大学教育的一个“革命性的机会”。克林顿在教育改革方面的另外两个举措是制定职业技术标准和允许私营公司承包美国的公立中小学校。据美国成人教育服务中心的预测，由于高新技术成果的广泛运用，到2000年，美国75%以上的工作只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才能胜任。为了适应这一形势，在克林顿总统的指示下，美国教育部和劳工部目前正会同各高等院校、工商企业、工会组织等相关部门，制定一个全国性的职业技术标准，明确开列出今后和未来一段时间，美国每一个行业的工作所需要的最低知识和技能指标，将这些交给高等学校和职业教育机构，要求他们根据这一标准来调整或设置新的课程，制定评价学生能力的新方法。美国的公立中小学，由政府管理，浪费巨大，经费直线上涨，一年比一年高，但教育质量却不断下降，引起美国纳税人的强烈不满。此次教育改革中，克林顿决定支持某些地方已经试行的由私营公司承包经营公立学校的作法，但只限于提倡，而不是强制，总统似乎寄希望于人们受到榜样的鼓励。早在1992年，在像巴尔的摩、安纳波利斯和华盛顿这样一些大城市，教育界已经这么作了，而且效果很好。例如，在1992年9月率先承包经营9所公立学校的巴尔的摩“教育选择公司”，在1993年5月时，已发现他们赢利110万美元了。估计在榜样的带动下，美国公立学校的私有化进程会加快。

5. 新移民政策。非法移民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近年来在美国日益引起公众关注，也给美国的经济造成很大的负担，1990年，据说单是美国政府向非法移民提供的福利救济就高达54亿美元，1992年进一步增长至80亿美元。美国人还抱怨移民们不问工资高低到处乱打工，影响了美国人工资的增长，移民吸毒、犯罪严重等等。因此，要求制止非法移民、改善美国的社会环境，也是1992年选举中选民的一致呼声。克林顿的“新政”也涉及这些方面，他于1993年7月27日宣布了一项新的控制非法移民的计划，并向国会提交了一项惩罚偷渡外国人的法案。其主要内容是：允许在机场就地审讯和遣返没有可信的政治避难理由和可信的身份证件的外国人，严惩将非法移民偷渡到美国的国际犯罪集团，在1994财年已经为移民事务拨款16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拨1.725亿美元，以增加600名边境巡逻人员，加强边境监控；命令国务院加强他们的护照和签证审查制度，严格把关，防止有人钻空子。

6. 严惩犯罪。犯罪率高居不下，社会不安全感的日益增加是美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克林顿上台之后，任命了一个庞大的工作班子，酝酿提出一项强有力的反犯罪法案。1993年秋天，克林顿政府拟定的一个反犯罪法案提交国会讨论。经过近1年的讨价还价，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1994年8月21日和25日通过了该法。主要内容是：政府将在今后6年内将拨款302亿美元，用于4大项目的开支：99亿美元用于增建监狱及其配套设施，55亿美元用于预防犯罪项目，135亿美元用于增加10万名警察，其余用于禁毒工作；禁止生产和销售19种进攻性武器及类似的枪械；对3次犯有暴力和毒品罪的重犯判处无期徒刑，同时增加50多项死刑罪；13岁以上的青少年犯强奸、抢劫、杀人等暴力罪的，在审判时视同成年人定罪；犯有流氓和强奸等罪的犯人在刑满获释后，必须每3个月向执法机关报告一次自己的住址，以便执法机关对其进行监督。克林顿总统在法案通过的当天发表讲话称，这个法案将带来“美国历史上政府针对犯罪的最强硬、声势最大、最严厉的打击行动”。

7. 改革弊端百出的福利制度。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既是美国人不断吹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优越性”，实际上也是美国政府最大的包袱，它关系到每一个美国人切身利益，因而受到美国公民最普遍的关注，它造成巨大的浪费且弊病甚多，也招致美国朝野上下最严厉的批评。在美国的福利制度中，最不能令人满意的据说就是医疗保健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向65岁以上的老人、残废金领取者提供住院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为单身孕妇、盲人、养育未成年子女的贫困家庭提供基本医疗保险，资助医学研究及进行医疗设施建设等等。

1992年，美国医保行业的从业人数达1060万人，占美国总劳动力的近1/10，当年医疗保健开支9120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14%。

医疗保健制度在它实行以来的60多年间，积累了太多的弊病。首先是费用直线上升。1930年开始实行这一制度时，政府支出的费用仅占GDP的4%，实行30年后的60年代初，这一比例只上升到5%，而到了198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医疗保健开支达到422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约9%。进入90年代，情况更加糟糕，1992年，政府医疗保健开支912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14%。统计表明，联邦政府用于该项目的开支在过去10年中以每年13.5%的惊人速度攀升（另一种说法是，在过去5年中，全美国的医疗费用以每年1000亿美元的幅度增长）。1993年，全美医疗保健开支仍高达9000亿美元，1994年估计将超过1万亿美元。据美国政府的预测说，如果医保开支照

此速度增长的话，到 2030 年，美国的医疗保健费用将达到 16 万亿美元，占那个时候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1/3（1993 年的比例约为 1/7）。其次，尽管政府花费了巨额钱财，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但美国人民似乎并未从中受到多大益处。目前，由于医疗费用的暴涨，美国社会仍有 3700 万人因花不起钱而没有购买医疗保险，2000 万人保险种类不足。第三，医疗费用的负担不合理。目前，大公司及一些中等企业负担的医疗保险的人数远远低于政府负担的人数。美国政府除了负担军队和政府雇员的公费医疗外，还负担着约 6000 万人的医疗开支，其中 3000 万 65 岁以上的退休老人，300 万残疾人，2500 万左右的生活贫困者。以政府和民间相比，政府的负担过于沉重。第四，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有人估计，美国享受医疗照顾的“残疾人”数字，可能是它真正拥有的残疾人数的 2 倍，显然，许多四肢健全的人伪造了残疾人的身份，领取了不该领的钱。由于深知医疗保健是“山姆大叔”掏钱，政府的腰包不掏白不掏，美国的医药费便疯狂上涨，成为西方国家中医疗费用最高昂的国家，当开业医生在美国成了最赚钱的行当，导致美国小诊所遍地开花，医生大量过剩的“奇观”。

克林顿上台后不久，即任命他的妻子希拉里·克林顿为主席，领导一个由 500 多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在 7 名内阁部长的参与和配合下，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探讨医疗保健制度的改革方案。1993 年 9 月，克林顿在国会发表演说，正式宣布了他的改革设想：在联邦政府的监督管理下，在各州成立医疗保险联合会，公民参加这样的联合会，统一购买医疗保险；保险公司必须建立竞争性的医疗保险制度；改变医疗保险费用主要由联邦政府承担的传统，将开支的大头转向企业和个人，保险费 80% 由从业者的雇主承担，20% 由从业者本人支付；大公司必须为其所有的雇员——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购买医疗保险，500 人以下的小公司的雇员及贫困者的保险费由政府支付。该计划一出，美国人即赞为一场“真正的革命”。这之后，经过又一年的筹划，1994 年 9 月，克林顿正式向国会提交了他的“医疗保健改革法案”。该法案要求最迟在 1997 年使所有美国人——无论贫富，都能享受到医疗保健，费用方面，企业和个人承担 80%，政府仅负责 20%。法案要求对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 6600 多所医院、62 万名医生和近 1100 万各类从业人员这一庞大的规模进行大幅度裁减，以提高效率，改善服务质量。

据说克林顿总统将这一法案看得很重，将它在国会能否顺利通过视同关乎美国前途、关乎他个人政治命运的“险关”。他原本指望这一法案能在 1994 年 11 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前，即在民主党人占优势的 103 届国会解散前通过，从而使这一成功同“反犯罪法案”、经济的增长、外交上的重大进展等成就一起，构成一种强大的说服力，为民主党人在中期选举中赢得选票，少失一些议席，再造一个对民主党人较为有利的 104 届国会，为他本人在 1996 年的竞选连任创造条件。然而，医疗保健法案触动了富人的利益，有 10% 以上的美国大公司和 30% 的中小企业主将掏腰包为他们的雇员购买医疗保险，另外 90% 的大公司中，以前没有向它的资浅雇员或非正式雇员购买保险的，根据这个法案也要补上这笔钱。这样，在法案提交国会的两个多月中，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便开始冲入国会走廊施加压力。为了挫败克林顿的如意算盘，国会内的共和党人更是精心算计，提出许多替代方案来延迟法案的审议。这样，在 1994 年 10 月 19 日第 103 届国会休会前夕，民主党的几位国会议员终于沮丧地承认，他们已无力使法案在本届国会得以通过了。医疗保健

改革法案终于成了 103 届国会的一项废案。

这些只是克林顿“新政”的几个方面，但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长期战略，许多改革要见效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此，“新政”能否成功，取决于克林顿在总统职位上能呆多长时间？他的继任者能否照此道路走下去？这是我们要继续考察的问题。

“ 拍卖总统 ”

美国政治是“金元政治”与“选票政治”。

任何一个参加竞选公职的人，都在接受大财团、大公司的赞助，但却为争取选票而说着选民想说的话，在抨击在任者的慷慨激昂的演说中，许下天花乱坠的诺言，一朝当政，投票的人就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以权力回赠“金元”的赞助。对这种金元政治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菲迪南得·伦德伯格 1968 年出版过一本名为《富豪和超级富豪：现代金钱权势研究》的书。在这本书中，他精辟地指出：“在美国，没有财产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有效的作用，也就是说，他们充其量只不过有点微薄的个人作用而已。”在美国政治中表面上看起来有两个党，“但实际上，可以说，美国只有一个单独的政党，那就是财主党。反对财主的政党是没有的”。

以克林顿“新政”的气势而论，看来他是要革除美国政治的这个痼疾的，据美国某记者的追忆，在布什总统执政期间，阿肯色州的克林顿州长曾在一次讲话中指责说：“10 万美元的捐助者集团买到了进出政府机构的通道……美国政界领导人被拥有大量资金的利益集团扣为人质。”等等。然而，近两年的事实证明，看来谁也无法割断政治与金元的千丝万缕的纠缠，即便是克林顿这样出身贫穷、靠个人奋斗而登上总统宝座的人也难以免俗。

美国《商业周刊》1994 年 9 月 12 日一期刊登的一篇题为《克林顿讨好企业界：公司馈赠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礼物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的文章，勾画了致力于“新政”的美国现政府与“金元集团”的关系。该文说，克林顿是作为南方平民主义者参加总统竞选的，那时，他曾谴责美国大公司的贪婪和华盛顿为富人谋利的作法，但自从他住进宾夕法尼亚大道 1600 号以来，应邀到白宫同总统共进午餐的，却仍是那些获得巨额利润的大公司总裁们，他们在与共和党总统亲切交往几年后，现在发现他们同民主党总统照样能作成兴旺的交易。自从克林顿入主白宫以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已募集到创记录的 6000 万美元政治资金，该委员会设立了一个所谓“民主党企业界领导人论坛”，其入会费为每人 1 万美元，1993 年时，有 135 人入会，到 1994 年秋天，已猛增至 850 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财政主管特伦斯·麦考利夫说：“人们争着给我们支票。”据说，公司总裁们之所以这样，要么是花钱买官当，如当个大使什么的，要么是花钱买平安。里根政府时是放松政府干预经济的各种条条框框，而克林顿的政策是加强政府干预，因此，他们想以捐钱来使自己“免受规章条例的侵犯”。美国一位人士说，总统与大企业的这种联系实际上是“将总统交付拍卖”。据说克林顿每个月至少要同大公司的总裁们共进一次午餐，他还经常亲自打电话给大公司总裁，向他们透露他掌握的经济情报。

请看：

——美国有一家名为“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的化学公司，据说在 1988 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其董事长罗纳德·佩雷尔曼曾分别向共和党和民主党各捐了 10 万美元，他从共和党那里得到了大量好处。1992 年竞选中他如法炮制，其结果是，在 1994 年 6 月 22 日召开的一次有总统参加的庆祝会上，他作为主持人同总统站在一起，两个星期后，在联邦政府环境保护局发布的一项规定中，要求在汽油中使用以玉米作原料的乙醇，而这正是该公司大力推销的新产品。

——美国著名的波音飞机制造公司，1991年至1993年，共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捐赠了1.6万美元，1994年又捐了6.5万美元。它得到的回报是惊人的。近两年来，该公司一直在同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激烈竞争石油王国沙特阿拉伯的一笔飞机采购合同。1993年2月间，先是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利雅得直接向法赫德国王提出了这一问题，4月间，商务部长布朗又携带克林顿总统给沙特国王的亲笔信前往沙特，克林顿在信中要求给予美国公司“公平”的竞争机会。1994年2月中旬的一天，克林顿总统又在华盛顿亲自约见沙特阿拉伯驻美大使班达尔亲王，大谈了一通生意经，就在这次会晤结束后不久，克林顿就兴致勃勃地向新闻界宣布，美国的波音和麦道公司赢得了沙特政府价值60亿美元的飞机采购合同。

——1993年1月，克林顿的接收班子要求企业界为总统的就职典礼提供资助时，美国电后电报公司(AT&T)立即提供了10万美元的捐款和一整套传真机和电话设备。这一举动见效非常之快，两周内，商务部长布朗就向沙特政府游说，希望它能让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承包其电讯系统的现代化工程。1994年初，沙特政府在许多外国公司激烈竞争这一项目时挑选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同它签订了价值40亿美元的合同，不久，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帐户上又出现了来自该公司的2万美元捐款。

——1994年8月，美国商务部长布朗率团访问中国，据说，许多大公司总裁为了能加入布朗使团，没少花钱。现为白宫顾问人员的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财政主管梅利莎·莫斯就专门负责为商务部的出国使团挑选公司总裁，这是因为她熟知各公司对民主党的捐赠数目。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和美国进出口银行行长肯尼思·布罗迪都曾是企业界的“大款”。

克林顿的白宫工作人员不断为自己开脱说，他们同大公司保持密切联系只是为了帮助美国企业为美国人创造就业机会，他们还为此而制定了一个冠冕堂皇的“促进美国出口战略”。但一位白宫顾问却直言不讳地道出了真相：“没有出钱的人（在白宫）不会有同样的机会陈述自己的意见。”一位民主党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也说：“如果一位政府官员在筹集资金的会上遇见了你，你就会被看作是有影响的人物，当轮到你陈述意见时，他会尊重你或对你产生畏惧感。”

金元政治腐蚀克林顿的政府，也腐蚀了他的“新政”。克林顿上台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政府内部就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人事大变动。截止1994年10月，辞职的或被撤职的已有30人，这个数字为历届政府所罕见。

自从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而丢官以来，“门”成了美国政治中一切丑闻的代名词。

从克林顿政府一开始，就有了“白水门”。据美国新闻媒介在1992年总统大选期间及此后披露的有关情况，所谓“白水门事件”大致是这样一件事。

比尔·克林顿年轻时有一个朋友叫詹姆斯·麦克杜格尔，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1978年，克林顿在阿肯色州当检察长时，他们夫妇曾同麦克杜格尔夫妇合伙从银行贷款20.3万美元，在阿肯色河流域的一个名叫怀特沃特(Whitewater，意为“白水”)的风景区购买了92公顷土地，成立了“白水开发公司”，准备在这里建造度假村。当时，麦克杜格尔拥有阿肯色一家名为“麦迪逊储蓄贷款担保公司”的半数股权，而这个储贷担保公司是由州政府管理的一家官办金融机构，负责该公司法律事务的是“罗斯律师事务所”，

而克林顿及其夫人希拉里·克林顿都是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克林顿夫妇与麦克杜格尔就维系在这样一个权钱关系网中。1984年，联邦当局接到公众举报，说麦克杜格尔的公司从事与其业务不相称的投机活动，并且资金往来上有严重的问题，便决定调查。经调查发现，该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和管理混乱，欠下一大笔债，已面临破产，并发现克林顿夫妇在其1984到1985年的所得税报表上漏报了该公司给他们的5000多美元利息。该公司的破产使美国纳税人损失了5000多万美元。司法部调查后认为，假如州政府在几年前接受关闭该公司的建议的话，美国纳税人就会少损失一些钱。因此，人们怀疑克林顿州长利用职权干预了这件与自己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公司破产案。克林顿夫妇宣称，他们与公司的经营和来往帐目无关，并且，还因为该公司的破产而损失了6.9万美元。

“白水门事件”最初披露出来是在1992年3月份，当时《纽约时报》记者杰夫·格思通过在阿肯色州的一番调查，发表了一些有关该事件的报道，引起了美国公众的关注，但据说当时布什政府的司法部因害怕被民主党人攻击为政治计谋，而拒绝对克林顿夫妇进行调查。克林顿入主白宫后，新闻界旧话重提，但也未掀起多大的风波。在这里，“福斯特自杀案件”是一个转折点。1993年7月20日，克林顿夫妇的好友、白宫法律顾问文森特·福斯特因涉嫌“白水门事件”而自杀身亡，震动了美国朝野，因为，白宫官员自杀，在历史上前所未闻。而且，当时有报道说，在得知福斯特在他的汽车里自杀的消息后，白宫内的某个总统助手曾从他的办公室取走了一份有关“白水门事件”的文件。国会内的共和党人据此认为，克林顿密友的自杀肯定有难以诉说的隐情，白宫在事后的作法也很可疑，此事可以大作文章。于是，新闻界便开始打出了“白水门事件”的大字标题，作好了讨伐的架势。1993年12月，在舆论和国会的攻击下，克林顿夫妇同意向司法部提交有关文件。此后不久，克林顿又迫于压力，要求司法部部长任命一名独立检察官调查此事。几天后，罗伯特·菲斯克被任命担任此职，克林顿表示将支持他的调查。但据说白宫法律顾问努斯鲍姆却一直多方刺探情况。3月4日，独立检察官传唤了6名白宫顾问，就在这次传唤的第二天，接替福斯特刚刚半年的白宫法律顾问伯纳德·努斯鲍姆即宣布辞职。1994年3月14日，司法部副部长韦伯斯特·哈贝尔又因“白水门事件”的牵连而辞职，据说，不仅他本人同破产的“麦迪逊储贷担保银行”有染，他的岳父也曾从该银行借款几十万美元，其中约50万美元没有归还。1994年8月17日，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罗杰·奥尔特曼因涉嫌向白宫有关人士透露“白水门事件”调查的进展情况而辞职，据说同他一起辞职的还有该部部长本特森的助手和律师。1994年底，财政部部长本特森辞职，估计也同“白水门”不无关系。

尽管问题并未严重到像尼克松政府那样，使人们在国会提出弹劾总统的议案，但闹得满城风雨的“白水门事件”却严重地影响了克林顿总统的声望。1993年克林顿刚刚入主白宫时，民意测验表明他在全国民众中的支持率是58%。1993年一系列“新政”法规和政策的出台，使他赢得了美国公众及国会更大的支持，1994年新年过后不久发布的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说，克林顿总统自1993年9月以来，一直在国会参众两院保持着88%的支持率，这是1953年以来历届总统在国会得到的最高支持率。但自1994年夏天起，克林顿的民众支持率直线下降，保持在40%或低于这个比例，秋天之后，尽管他的政府在解决朝鲜核问题和海地危机等外交方面表现良好，但中期选举前，其支持

率也只有 47%，这不能不说与他的政治丑闻有关系。涉及到经济方面的情况更加糟糕，尽管克林顿下大力气结交了一批大公司总裁，但《商业周刊》和哈里斯民意测验所在 1994 年 9 月份对 400 名高级经理人员的调查表明，85% 的人不赞成克林顿处理经济问题的方式。

就是带着这样的支持率，克林顿总统和他的民主党走进了 1994 年 11 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一次关系到未来两年美国政局发展和 1996 年总统大选的关键性选举，新一轮“驴象之争”的前奏曲。

“这是一场灾难”

在美国的两党政治中，主要的游戏规则是：总统大选每4年举行一次，当选的总统任期为4年；在选举产生总统的同时，也产生出新的一届国会，国会众议员任期2年，参议员任期6年；这样，在总统4年任期的中间，就举行一次国会中期选举，改选国会众议院中的全部435名议员和参议院中1/3的参议员。中期选举是美国政治游戏中仅次于争夺总统宝座的两大党政治斗争，由于是处在两次总统大选的中间，因此，对于在野的一党来说，它被当作是洗雪失败的耻辱、争取在下次大选中夺回总统宝座的极好机会，而对于执政的一党来说，它被看成是守住现有阵地、争取下次大选中竞选连任的重要一战。因而，对于中期选举，美国两党都是志在必夺的。

两年来一直在运转的本届国会，是美国第103届国会。它是在1992年大选中随克林顿的当选而产生的。它的组成情况是：在参议院的100名参议员中，克林顿的民主党人占有56席，共和党占有44席；在众议院的435名议员中，克林顿的民主党人占有256席，共和党人占有178席，另有一名无党派人士、佛蒙特州的伯纳德·桑德斯众议员。很明显，当前执政的民主党人以在参议院的12席和众议院的78席的绝对优势，牢牢地控制着本届国会。这是近两年来克林顿政府的各种“新政”立法在国会得以顺利通过的主要原因。

根据政治游戏的既定规则，在1994年11月8日进行的中期选举中，可供竞选的位置是：众议院的全部435个席位；参议院的35个席位。在这35个参议院席位中，现共和党人占有13席，民主党人有22席；全国50个州中的36个州长位置，要改选的这36个州长中，民主党人21个，共和党人14个，无党派人士1个。显然，执政的民主党人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他们目前占据的大部分职位是要交出去供争夺的。

为了在这次中期选举中获胜，民主、共和两党都制定了周密的竞选战略。然而，美国政治史表明，任何一次国会中期选举对执政党都是不利的。一个在台上的政党，就可能干蠢事或已经干下了足够的、让在野党和民众抓注进行大肆攻击的蠢事。在野党就不同，它没有可供人们谴责的不良记录——至少在作为此次选举参照系的最近两年，只需要找准执政党的弱点，大肆渲染在位者的愚蠢和无能，并许下进行变革的漂亮诺言就行了。

1994年7月21日，美国西海岸大都市洛杉矶迷人的海滨度假胜地，来自全美各州的共和党地方骨干聚集在一起，召开为期三天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夏季会议，研究制定该党在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的竞选战略。此时，距11月的中期选举还有4个月的时间，在1992年丢掉了总统宝座的共和党人这一次真是未雨绸缪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黑利·巴伯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罗伯特·多尔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为他们的党定下了重新夺取对国会两院——至少是其中一院——的控制权的竞选目标。据说，在会议期间的秘密党魁会议上，共和党首领们对他们面对的形势感到很乐观：民主党目前占据的多数席位将交出来供竞选角逐，参议院的6名老资格民主党议员将不参加竞选连任，克林顿总统的支持率日益下降，公众对民主党现政府的怨气日益上升，在克林顿本人出身的南方更是如此。老资格的共和党人罗伯特·多尔最后总结说：“自由派中的许多人夜不能寐，他们害怕选举。”“这将是长期以来我们所经历过的最重要的一次选举，只有我们懂得美国人民的需要

和忧虑。”关于这次秘密的党魁会议究竟确定了什么样的竞选战略，人们一直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将最大限度地揭露和攻击克林顿政府执政两年来的失误，并向选民们许诺，只有共和党人控制了国会，才能阻止华盛顿那群年轻的民主党人继续犯错误。两个多月后，共和党内的极端保守派头面人物纽特·金里奇联合 300 多位共和党人，起草并发表了一份所谓“美利坚契约”，在其中开列了共和党人一旦控制国会将可能提出的 10 项建议，提出了包括增加税收、平衡预算、限制国会议员的任期、改革国会的官僚作风、增加国防开支、改善军人待遇等诱人的主张。

民主党人面对的形势简直太糟了，自 1994 年夏天以来。民主党的竞选专家们一直向总统出主意说，他应该继续抨击共和党人，把他们同华盛顿的特殊利益集团联系起来，指责他们在国会蓄意阻挠将使美国人变得更加安全的“反犯罪法案”，故意找借口拖延对总统“医疗保健法案”的审议，而该法案的实施将使更多的美国人得到健康保障等等。但新闻界在得悉了民主党内的这些动向后，不无刻薄地指出，该党的竞选战略“根本就没有涉及选民最关心的问题”。那么，面对政客们的又一次蛊惑，普通的美国老百姓到底在为什么而担忧呢？

据一些报纸援引一位共和党民意调查人的话说，选民们主要有三点担心：担心他们在今天和未来的糊口问题；担心社会道德的沦丧；担心美国梦对普通人来说变得越来越不可企及。民主党人似乎并未提到这些问题。虽然美国的经济已经是连续第三个年头的增长了，但正如一些经济观察家所注意到的，当前美国经济中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即经济增长的总趋势正在同美国家庭的福利状况脱钩。在以往衰退过后的经济复苏期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总是伴随着美国人家庭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这一次，情况却相反，国家总的经济在增长，但就业者的工资在下降，而同时，工作时间却比过去长多了。政府大吹大擂的新创造的就业机会都是一些低收入职业，一项调查表明，从 1973 年到 1993 年的 20 年间，美国工人实际工资下降的综合年率为 7%，而在 1994 年 3 月到 6 月的第 2 季度内，美国工人的实际购买力就下降了 7%。这种经济增长时期家庭收入下降的独特现象，使绝大多数的美国老百姓对现政府产生了极大的怨恨情绪。克林顿原本以为他创造的增长奇迹能转化成民主党人的大把选票，但事实是。“美国人根据他们的钱包来投票”，而不是根据政府公布的经济增长率。

为了挽救民主党人每况愈下的形势，克林顿总统开始了一连串外交出击，试图改善形象，赢得高分。1994 年 9 月，总统请出民主党老将、前总统卡特前往海地，说服海地军方领导人和平交权，从而避免了二场战争，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海地。这本是一件辉煌的外交成果，但共和党人却告诉美国人民，总统在将美国军队派往海地前并没有征得国会的同意，是先斩后奏，2 名驻海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神秘自杀，更使共和党人抓到了把柄，大肆攻击出兵海地的行动。10 月初，当伊拉克向伊科边界调动军队，摆出要再次进攻科威特的架势时，克林顿作出了非常强硬的反应，立即派美军部队前往海湾，随时准备反击伊拉克的入侵。这一举动改善了他留在人们心目中的软弱的外交形象，共和党人无话可说。10 月 21 日，美朝核问题会谈取得突破性进展，签署了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但共和党人告诉美国人民，美国在协定中作出了置国家利益于下顾的大多让步，是着眼于中期选举的“政治外交”，他们将在国会否决这个协议，从而使克林顿总统的这项成功也大

夫其色。克林顿总统还亲自出马，于1994年10月底前往中东，主持了《约旦—以色列和平条约》的签字仪式，以显示他的政府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他开始这次访问之后。民意测验显示，他的民众支持率上升至47%，达到1994年1月以来的最高点。但这次访问离选举日期实在太近了，不用共和党人鼓噪，任何人都可看出这是一次“政治外交”行动，它对改变选举进程又会有多大影响呢？

对民主党人来说，另一个符咒般的不利因素是，它是一个执政党，而美国政治中存在着“反现政府”、“反华盛顿”的固有传统。这个传统的作用形成了本世纪美国政治的另一条规律：自1934年以来的60年间，在历届国会中期选举中，执政党都是夫家，丢失席位是肯定的，区别只在于丢失多少。1994年10月中旬进行的一次最新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对克林顿总统的支持率为39%，不支持率为52%。

1994年11月8日，国会中期选举开始投票。就在投票的当天，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发布的最新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在选民支持率方面，共和党以51%略微领先于民主党的44%，在选举中占优势。

选举的结果并不出乎预料：共和党人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民主党遭到惨败。在参议院，共和党由原来的44席增至53席，民主党由56席降至47席；在众议院新选出的435名议员中，共和党人占230席，比原来的178席增加了52席，民主党人204席，比原来的256席减少了52席，独立的无党派人士占有1席；在州长选举中，共和党人使其担任的州长由原来的20个增加到31个，民主党人则由29个下降为18个，无党派人士1个。

结论是明显的，共和党控制了国会，控制了大部分州，在新的政治力量对比中占有绝对优势。完全控制国会两院对共和党来说，还是40年来的第一次，而在州长中占有多数，则是24年来的第一次。

克林顿总统在得悉选举结果后痛心地表示，他将为民上党在选举中的失利承担责任，并说他“已经明白了选民传达的信息”。针对共和党人在竞选期间提出的一些建议，他表示将“坚决反对任何阻碍经济回升和把我们带回从前的失败政策中去的建议”，他说：“我们正处在一场变革之中，我们将不得不继续努力。直到美国人民认为他们有了一个为自己服务的政府。”

此次选举不仅震动了美国朝野，而且在世界各地引起强烈反响。日本时事社的评论认为，民主党惨败的背景是中产阶级对现政府的政策极端不满。法国电视台的一位评论员说：“这不是一次失败，对于克林顿来说，这是一场灾难，是打在他脸上的一记沉重的耳光。他的动力实际上将被切断，后果将是严重的。”意大利报纸甚至认为共和党人控制国会，就是“判了克林顿死刑”。国际舆论更多的是担心美国将因此而改变其对外政策的优先次序。一些分析家说，选举的结果对克林顿是沉重的打击，美国今后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将处于一种捉摸不定的状态；由于在国内遇到麻烦，克林顿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将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外政策上；但在对外政策上，他可能将更多地被共和党人牵着鼻子走，在对待盟国时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

这次选举对今后的美国政治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1994年11月，世界各地的舆论在估价这次选举的意义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它对今后两年克林顿执政行为及1996年总统大选的影响上面，并且大都作出了较为悲观的预测：由于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克林顿“新政”将在立法进程方面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为了达成妥协，将不得不降低自己的

目标，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的行动能力都将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可能使他在未来两年只能取得有限的政绩。唯其如此，在 1996 年的总统大选到来时，克林顿这个形象将很难对美国人民具有说服力。

笔者以为，此次中期选举对克林顿总统和他的民主党来说，的确是一次惨败，但就其结果对美国政治前景的影响而言，还不致有如此悲观的情形。何以见得呢？

首先，美国的政治记录表明，自 1934 年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时起，60 年来，执政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总是失分的，这已形成了一个政治规律，区别只在于丢失席位的多少，或者有时是在两院都丢席位，有时是在一院丢失席位。因此，此次中期选举，执政的民主党丢失许多国会席位，是选举前预料之中的事。人们感到惊愕的原因在于，这次选举的结果结束了民主党控制国会 40 年的局面。的确，初看起来，这个结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深入思考就能看出，在一个以两党轮流执政为特征的政治制度中，某一个政党控制议会长达 40 年，这本身并不是一种正常现象，因此，结束这种局面的意义不应被过分夸大。

其次，历史记录表明，国会中期选举的结果以及国会的组成本身，对在职总统的权力地位和施政行为将造成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总是单方面的，而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本党总统面对一个本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时，的确能得到很多的配合，但并不一定就一帆风顺，也还可能同国会发生激烈的争执，例如，在 1977 年至 1981 年的卡特政府时期，尽管民主党总统卡特面对的是一个完全由民主党议员控制的国会，但他提交国会的许多法案还是被否决了。同样道理，执政党总统面对一个在野党占多数的国会时，其施政行为肯定将受到很多牵制，但并不一定就是处处受阻，取得国会的配合仍然是可能的，例如，1990 年时，坐阵白宫的是共和党的乔治·布什总统，在 1990 年 11 月的那次国会中期选举后形成的第 102 届国会中，作为在野党的民主党，在参议院以 56 席比 44 席、在众议院以 267 席比 167 席的悬殊对比，拥有对共和党的绝对优势，但共和党的布什总统仍然在发动海湾战争和与苏联谈判及签署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等重大外交决策上，得到国会的一致支持。从一个相对长的时期来看，情况也是如此。自 1934 年罗斯福政府以来的 60 年间，共和党除在 1981 年至 1986 年的短暂时期内控制过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外，民主党人一直牢牢地保持着对国会两院多数席位的控制，但在这 60 年间，共和党人并非一事无成——他们前后占据总统职位 28 年，并出现过艾森豪威尔和里根那样有作为的总统。如果从美国政治思想的渊源来看，也许这种两党分别把持立法和行政权力机关的状况，正反映了美国人所吹嘘的“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政治体制的本质特征，是一种“常态”。至于中期选举的结果同在职总统竞选连任的关系，历史记录也表明，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此胜彼胜、此败彼败的必然联系。如果说国会中期选举的结果一定能够左右两年后的总统大选的话，既然自 1934 年以来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已经成为规律，那么，竞选连任似乎就是不可能的了。然而，事实是，这 60 年来，仍有分别来自两党的 6 位在职总统（40 年代的罗斯福、1948 年的杜鲁门、1956 年的艾森豪威尔、1964 年的约翰逊、1972 年的尼克松和 1984 年的里根）赢得了连任总统的机会。

当然，此次中期选举的结果将对克林顿总统的执政地位带来不利影响，这一点是肯定的。特别是，共和党人在竞选前提出了一个所谓“美利坚契约”

的 10 点竞选纲领，其中提到的减免税收、增加国防开支、自由贸易等建议，明显地与克林顿政府的现行政策相抵触，已经发出了国会与政府紧张关系的信号，使人们对克林顿“新政”在未来两年的命运难以表示乐观。在 11 月 9 日选举结果揭晓至 11 月 19 日的 10 天内，当克林顿总统和他的幕僚们忙于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的各种活动时，共和党人已经在以胜利者特有的自满为第 104 届国会制定议程了。这些议程包括：制定一项平衡预算法案，来制约政府的赤字开支，通过一项对国会议员的任期进行一定限制的法案，以减少那些长期吃国会饭的观点陈旧的人；减少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的数目，对各个委员会主席的任期作出限制，以提高国会的工作效率；大幅度削减国会工作人员，节约开支。据说即将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杰西·赫尔姆斯参议员，正在着手制定一项 1995 年的美国外交蓝图，试图通过控制开支来约束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这样看来，克林顿总统的麻烦似乎很大。他在国内改革方面的重大举措——被第 103 届国会搁置的医疗保健法案，通过的前景非常暗淡，或者，即使勉强通过，可能也将被共和党人弄得面目全非。克林顿经济政策中许多正在实施的计划也可能受到阻遏。另外，1993 年初提出的今后五年防务计划中对军费和美国武装力量的裁减目标恐怕也难以实现。政治上，“白水门事件”的小辫子可能将被国会内的共和党人揪得越来越紧。在外交方面，因共和党人的强硬态度可能使美俄关系出现新的不确定因素，使美日关系再度紧张。但总的看，此次选举结果对克林顿未来两年执政期的影响还不至于大悲观。应该说，对这次选举起了重要作用的，是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反政府”、“反在职”、“反现实”的逆反情绪，是一种“逆反综合症”效应。正如人们在评价 1992 年选举时所讲的，那次选举虽使克林顿当上了总统，但似乎并没有很辉煌的胜利者，而只有失败者。此次选举同样是如此，可以说没有成功者。以色列的一家报纸在分析这次选举的背景时，下了一个很深刻的断语：“世界上所有逻辑都不能帮助对付一种消沉的民族精神，这种消沉的民族精神把美国社会的所有不幸都归罪于华盛顿。这种结果不能归罪于克林顿总统，只能说，美国人民不再爱他们自己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次的选举不过是过去许多次选举的重复，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这次选举只是表明了美国人民面对克林顿“新政”引起的动荡而产生的茫然和失望情绪。即使共和党人利用他们新取得的优势拼命给克林顿政府制造障碍，但毕竟，在美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行政机构是主要·99·的行为主体，总统仍然是美国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者和运用者，国会只是制约施政行为，而没有越俎代庖、直接施政的权力。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在美国政治体制中，国会通过的任何一条法律、任何一项法案，都只有在总统签署后方能生效，总统否决国会决议只需说一个“ No ”即可，而国会要推翻总统的否决，却需要两院三分之二的多数票：353 票以上。

1993 年大量出台的克林顿“新政”的各项措施，其对美国这个病人的医治效果如何，将在 1994 和 1995 年充分地显现出来，克林顿政府还有时间看到他们的政策可能取得的成功，或者根据情况对某些方面作出修正。美国人民是重实际的，现政府仍有可能指望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即将出现的某些积极变化，能形成一种说服力，改变美国人民的政治倾向。正是这些未知的变化，将成为左右 1996 年总统大选的主要因素。

下一次选举：谁来投票？

在展望 1996 年总统大选及下个世纪初的美国政治前景时，困扰我们的首先是美国人民中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和政治冷淡主义情绪，它使美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丧失激情，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

1994 年 10 月，面对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笼罩美国社会的是一种悲观主义情绪，一次又一次的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正在朝错误的方向发展。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社会已经失去了道德准则，罪恶活动猖獗，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已被人们遗忘，没有什么值得信任的东西，更没有人相信政治家会遵守诺言。白宫办公厅主任利昂·帕内塔痛心他说：“政府的信誉在公众心目中已大力降低了，公众再没有耐心给予谁信任或予以相信了。”

这是一种“美国病”！

美国人说：“政治 = 肮脏”

在美国，假如你喜欢看报纸的漫画专栏，要不了几天，你就会发现，首都华盛顿及其他地方那些“穿条纹西装”的政客们，是漫画家笔下的主要讽刺对象。例如，1994 年 1 月 24 日一期的《新闻周刊》封面上，就是一幅克林顿总统夫妇的漫画：在一条波涛汹涌的河面上，克林顿总统和他的夫人希拉里驾着一叶扁舟，正在拼命地划桨，但船却似乎正在向前面的礁石撞去。漫画以此预示克林顿可能因“白水门事件”而“触礁”翻船。

在美国，热闹非凡的竞选运动往往使人产生误解，以为美国人是热衷于参与政治的，但同美国人相处时间长了，你总会发现，美国人是极少谈论政治的，假如你向他们提到政治，你一定能从他们的谈论中听到一个词：“dirty”（肮脏）。

1994 年 7 月 10 日，我们在美国的《巴尔的摩太阳报》上看到田纳西州孟菲斯城的罗兹学院政治学教授迈克尔·纳尔逊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人心目中的政治家形象：我们为什么憎恨他们？》。作者说，他在罗兹学院教美国政体课时，经常在开场白中作一种“词联想测验”，即随便说出一个政治学名词，要求学生回答他们由此而联想到的一系列其他的词汇。当他说出“政治”这个同时，他的学生们答出的联想词是：“腐败”、“肮脏”、“耍花招”、“追逐名利”、“浪费”等等，相比之下，“令人厌烦”算是其中最好听的形容词。当他说出“政治家”这个词后，他收集到的联想答案是：“自私自利”、“野心勃勃”、“平庸无能”，“没有原则”等等。教授认为，这表明，美国社会公众普遍对政治采取玩世不恭和漠不关心的态度，人民中间“普遍存在着对政治和政治家的绝望情绪”。

1994 年 9 月 13 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一位老新闻工作者赫伯特·罗恩（作者自称 50 多年前即开始了其新闻生涯）的文章，他在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历届总统的所作所为后，写下了这样一些结论性言辞：“美国健康的经济机体和民族自豪感所遭受的损伤，大半都是自己造成的。这个国家经济的现代史是一部官方所犯的大错误、管理不当、愚蠢和不负责任的历史。”“三十年来，我们美国人一直是华盛顿的管理不当达到惊人地步的受害者，我们经历了贪婪和读职的时代，从约翰逊未能越南战争筹措费用到里根经济学的多种失误。在二者之间，我们还遭受了理查德·尼克松的口是心非，本意良好但却笨手笨脚的杰拉尔德·福特的无能和吉米·卡特的惊人的软弱无力……任何美国总统在任何时候都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同石

油卡特尔的威胁、华尔街的骗子和工业界造成的环境污染作斗争。”

美国人说：只有富人才能影响政府，不能相信政客，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情和怎样去作正确的事情。

美国一位研究政治问题的学者凯文·菲利普斯提供的几组民意测验数据，很能说明美国普通老百姓对政治的看法：

对“你有多少时候相信政府能作正确的事情？”的回答：

A：总是相信或大部分时间相信的人。1964年占76%，1984年占44%，1994年只有19%；B：仅某些时候相信的人：1964年占22%，1984年53%，1994年72%；C：从来不相信的人：1984年为1%，1994年为9%，对“你认为以今天同10或20年前相比，普通美国人发展的机会是否更多了？”这一问题的回答：A：回答“更多了”的人：25%；B：回答“更少了”的人：49%；C：回答“区别不大”的人：24%。对“你认为下面列举的人群中哪些对美国的影响更大？”这一问题的回答情况是：A：富豪86%B：大公司84%C：新闻媒体83%D：华尔街的金融大亨79%E：律师79%F：外国政府67%G：特殊利益集团64%H：军火工业集团59%I：工会48%J：环保组织41%K：消费者协会36%L：中产阶级6%M：像你一样的人1%美国人民就是这样看他们的政府和自己的关系的。对政治的厌恶和对政治家的鄙视，导致绝大多数美国人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政治冷淡主义是世纪末的美国病之一。在美国这个号称是世界上民主制度最发达的国家里，60%以上的人却屡屡放弃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这对美国的政治家来说，实在是一件难堪的事。据统计，在1990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参加投票的人仅占美国登记选民的36%，1992年的总统大选中，投票率在40%左右，1994年的中期选举，参加投票的人仅占登记选民的39%。

美国一些著名学者认为，在冷战时代，由于存在着苏联的军事威胁和独裁制度的种种恐怖，美国人在政治上是团结的，对他们的社会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充满信心，从而也对美国的强盛和健康发展充满信心，但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失去了一个需要全力以赴去反对的对象，美国的政治家又难以给美国人民一个建立在肯定性之上的、值得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使美国陷入了一场空前的政治衰退期，这种政治热情的持续减退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伴随着美国社会经济中日益积累的两极分化和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下降，这种政治衰退孕育着社会阶级冲突的种子。

1994年9月进行的一次范围广泛的民意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克林顿所代表的民主党感到幻灭，对共和党人捉摸不定，对两党制度不再感兴趣，希望出现新的政党。接受调查的美国选民认为，共和党内部在诸如福利、堕胎、犯罪、移民等社会问题上争论不休，没有定见，而民主党人则在种族争端、外交政策等问题上摇摇摆摆，不知所从。大部分人认为，美国传统的两党在政治方面组织美国人民的感召力日益下降，他们都不知道如何应付美国面临的问题。调查发现，选民对党派的忠诚同1987年相比已大大降低，那时，坚定地回答自己支持某个政党的人都在40%左右，在今天，能毫不犹豫地声称属于某个政党的人降到30%左右，而多达60%以上的人对哪个党也不赞成。这样，调查者发现，建立新政党的概念得到广泛的支持，调查中，明确表示赞成建立新党和明确表示反对的比例是53%对43%，而在1982年时对同一问题的回答，比例是44%对44%，支持建立第三党的人增加了约10%，重要的是，在被认为是跨世纪的一代年轻人中，支持建立新党的比例

更高，29岁以下的人中，60%以上赞成这一想法。估计在这一代年轻人的努力下，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在美国建立一个独立于现有两党之外的第三党的问题，将提上政治议程，或者，至少像1992年总统竞选中出现的罗斯·佩罗那样的无党派“独立政治”倾向将变得越来越强烈。

美国公众对政治和政治家的绝望情绪，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便是自己组织和行动起来，建立各种非官方组织，解决自己关心的社会政治问题，从而使“社团政治”成为美国一个正在壮大的趋势，据美国一项研究表明，近年来，美国的非官方组织发展范围广泛、规模宏大、可谓波澜壮阔，到处都有人在组织协会、基金会、联合会、自治机构等等诸如此类的组织，目的是向人们提供政府难以顾及的服务，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防止环境退化，保障民权，共同对付犯罪等等，为实现以前无人过问或由政府负责的无数目标而努力。据说在美国目前有数千个这样的组织活跃在各地。这种现象的最初形态可能是60和70年代的各种社区自助团体，但自那时以来，它远远超出了社区的范围，影响也日益扩大。同华盛顿那些整日呆在国会大厦走廊里的压力集团不同，他们不是乞求政府做什么，而是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帮助自己，其特点是互助和非赢利性。这种非官方组织的迅猛发展可能在本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形成一种“社团革命”，其结果是形成一个由大批民间组织构成的第三部门，在正式的政府机构之外，通过各种途径的联合和互助，谋求公众的利益。这一运动的起因是对政府和国家能力的信任危机，而其发展和壮大，则将进一步削弱国家对美国公众生活的影响，使政治更加远离一般民众。这似乎预示着，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美国政治生活可能第一次出现更接近她的开国元勋们当初设想的那种状态——一种不需要政府多管闲事的民主。

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将给美国政治生活带来一场革命。未来一二十年，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投入使用，信息的充分涌流和普遍共享，可能产生一系列现在无法预料的政治后果：由于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生活的中间环节，政府决策不再被重视；公众对某一个问题的充分了解，将使以往那种仅限于政治精英们之间的争论无限扩大，整个社会形成一致意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政治决策的失误可能在最初阶段就被整个社会所发现，从而面临无休止的辩论等等。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人们很容易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下一次选举谁来投票？1996年之后谁有可能坐阵白宫以及他怎样面对那些对他的政府日益丧失兴趣的人民？

1994年11月初的中期选举前后，在美国和世界各地，人们对1996年及其之后的美国政治作了各种各样的预测，但总的来说，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是一种捉摸不定的情绪。

首先，哪些人有可能参加1996年总统职位的角逐？

目前看来，在民主党内，除了现任总统克林顿外，还很少看到另外一个在全国享有声望的人物，在克林顿之前出现过的迈克尔·杜卡基斯和黑人政治家杰西·杰克逊，失败之后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了。在国会的民主党议员中，几乎找不出有全国性政治经验的人物。在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几个大州中担任州长的民主党人，在1994年的中期选举中丢掉了他们的州长职位后，看起来也难以指望在两年后赢得总统职位。因此，在民主党内，目前有望参与1996年“驴象之争”的，似乎只有比尔·克林顿总统。

而在共和党内，受最近选举胜利的鼓舞，似乎有很多人认为他们有可能

在 1996 年当上总统。传统上，美国依阿华州的共和党地区会议，是共和党人挑选他们的总统候选人的地方，正如民主党人的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那些想竞选总统的头面人物们大都利用中期选举后的空暇，不失时机地到这里走一走，作出一种姿态。1994 年 11 月 11 日，中期选举结束仅仅二天后，得克萨斯州参议员菲尔·格拉姆就到了依阿华州的得梅因市，他在 13 日的公开讲话中宣布，他将于本周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候选资格文件，申请以总统竞选者的身份开始他的活动。13 日，即将上任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堪萨斯州参议员鲍勃·多尔也到了得梅因。14 日，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阿伦·斯佩克特在他的家乡费城宣布，他将成立一个探索性的委员会，以检验目前的政治趋向和他的集资能力，决定是否参与竞争，他随后便从那里出发，前往新罕布什尔和依阿华州旅行。除了上述几名议员外，据美国新闻媒体的分析预测，目前在党内呼声很高但本人尚未有动静的几个可能的人选是：海湾战争的英雄、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将军，前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前国防部长迪克·切尼，前住房部长杰克·肯普，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田纳西州前州长拉马尔·亚历山大等人。

另外，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罗斯·佩罗，这个在 1992 年大选中以独立人士身份参与角逐并获得 19% 选票的亿万富翁，仍受到相当多选民的青睐，他也很有可能在 1996 年卷上重来。

这些可能的候选人持什么样的政治态度？

现任总统克林顿作为下一届可能的总统候选人，其政治态度是明确的，就是笔者在前文已经介绍过的克林顿“新政”的那一套。此处无须赘述。

在目前的共和党内，存在着三个不同的阵营。一个是强烈谴责美国社会道德的沦丧、主张重建美国精神、深受极端保守的基督教联盟影响的那个团体，这一派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反堕胎、在美国各学校设立教堂让学生们每天做祈祷等宗教权利和社会道德问题。由于基督教联盟目前在美国的势力很大，据说已控制了美国 18 个州的共和党基层组织，因而，打算在 1996 年参加总统职位角逐的共和党人，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正在积极向该联盟及其所代表的政治观点靠拢。1994 年 9 月 18 日和 19 日两天，基督教联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它的政治战略会议，格拉姆、切尼、拉马尔以及多尔的夫人伊丽莎白都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向大会保证他们同该组织有许多共同点。第二个阵营是由一批被称为“新里根主义”的经济保守分子组成的，他们在国内问题上更强调减税、精减政府机构、增加国防开支、平衡预算、打击犯罪等课题，在对外政策上是意识形态激进主义，强调对世界上那些拒不认同美国价值观的独裁国家，或虽属民主国家但却在贸易上对美国持歧视态度的国家一律采取强硬措施，对俄罗斯加强防范等等。最明显归属于这一阵营的是格拉姆参议员和杰克·肯普。第三个阵营据说是由前总统福特和布什领导的一批温和的共和党人组成的，他们在政治上主张开明，对堕胎和宗教权利持一种较为灵活的观点，在对外政策中不那么强调意识形态分歧，主张从美国的现实地位出发与不同的国家打交道，只承担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义务，目前共和党内有实力和持稳健立场的人大都属于这个阵营。他们是：参议员多尔、迪克·切尼、詹姆斯·贝克、科林·鲍威尔、拉马尔·亚历山大等人。

那么，1996 年谁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对于克林顿来说，他最大的优势和最大的弱点都在于他是一位在职总

统。作为在职总统，他可以利用这一职位做无数迎合选民需要的事情来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为自己拉选票——既然他已经从 1994 年的中期选举中清楚地看出美国人到底不喜欢他哪些方面，他就有机会来调整自己。但正因为是在职总统，他将作为令人厌恶的“华盛顿权势集团”的代表，成为美国人民中间普遍存在的反华盛顿情绪的牺牲品。下面两个民意测验结果典型地说明了他作为一个在职总统的处境：1994 年 10 月中旬，在美国广播公司（ABC）进行的一项舆论调查中，认为克林顿总统“有蝉联价值”的人仅占 38%，认为他“没有蝉联价值”的人占 56%，这就是说，不赞成克林顿重新当选总统的人已超过半数，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CNN）在 1994 年 8 月 5 日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如果现在就进行总统选举，克林顿总统的对手若是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的话，那是必败无疑的，但如果对手是前副总统奎尔的话，那就可能获胜，然而，对克林顿来说，机会仍然是存在的。据政治史家们考证，历史上，在中期选举中遭到与他类似的惨败但两年后又东山再起赢得连任的最近一位总统，是 1946 年的民主党总统哈里·杜鲁门，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称道的，克林顿在角逐阿肯色州州长职位的最初一段政治生涯中，也曾创造过令人惊奇的东山再起的奇迹，这样看来，克林顿在两年后东山再起也不是没有可能。民主党内目前没有实力强大到足以替代克林顿的人，未来两年似乎也不大可能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在职总统，他是民主党团结的中心。共和党人虽然目前深受欢迎，提出了一些迎合选民心理的政治主张，但事实可能会证明，这只是一些对竞选有用的东西，即使他们的主张真正对挽救危局有用，但控制国会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在野党地位，他们将得不到足够的机会将他们的主张变成对选民有充分说服力的事实，而更有可能的是，如果民主党人稍微表现出一点谦虚，就可能捡起他们的主张中某些合理的东西，来为自己得分。共和党目前是一个群雄并起、没有领袖的局面，各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派别可能给选民造成一种印象，即这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群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吵吵嚷嚷的政客。同在位者一样，在野者也有它固有的困境：它如果在国会内执著地与行政权力分庭抗礼，将可能冒破坏美国的团结、损害政府权威和效率的风险，从而招致选民的谴责，它如果谨慎地寻求与行政权力的妥协，则可能被本党及那些投票支持他们的选民认为是没有主见的。共和党人的摇摆就是克林顿的机会。克林顿无论怎么不受欢迎，他毕竟还是一名年轻的新一代政治家。而共和党人致命的弱点在于，当他们成为在野党后，却没有利用这一机会使自己的党变得年轻化，没有推举出一批能顺应新时代的政治家，例如：即将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从而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挥重要作用的杰西·赫尔姆斯参议员，已经是一位 73 岁的老人了，而即将担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瑟蒙德参议员则已高寿 91 岁了。这再明确不过地告诉人们，当美国需要清新、变革和活力时，共和党却依然在实行老人政治，而这种老人政治正是该党在 1992 年大选中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最近，一个曾为美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现在领导着共和党内一个保守派别的老人——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宣布自己患了一种连现代医学也无能为力的“老年性痴呆症”。这对共和党人无疑是个打击。因此，克林顿总统如果想当第二个杜鲁门，他的机会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共和党人的弱点，如果利用得当，他竞选连任的机会可以说是一半对一半。

至于共和党人，情况就相当复杂了。该党内看起来有可能成为 1996 年总

统候选人的人实在大多，以致于一时竟难以弄清谁更有希望，这也正是共和党人在暂时胜利的背后所潜藏的危机：说得好听一点是群雄并起，难听一些，说它是群龙无首亦无不可。党内派别林立，政见难以调和将大大损害它在同民主党人较量时的地位。这个老大党目前唯一能达成一致的目标看来就是反对民主党，考虑到这一点正是它作为一个反对党存在的基础，这一致也就说不上有什么意义了。一个曾在共和党政府中有过卓越表现但却从未将自己标榜为共和党的人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这个人就是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将军。舆论认为，共和党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肯定将推举这位海湾战争的英雄为候选人，尽管他还不是一个共和党人，但由于他曾长期在共和党政府中担任要职，政治观点接近共和党，作为海湾战争的英雄，他在美国公众中享有很高威望，正如舆论调查结果所显示的。而且，作为一名出生在纽约贫民窟的牙买加裔黑人，鲍威尔将军可能会吸引很多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选票，而这一部分选票传统上都为民主党人所获得。尽管鲍威尔将军迄今仍未表示他是个共和党人，也从未说过他会参加总统职位的角逐，但共和党内有名的竞选战略家威廉·克里斯托尔在中期选举后说：“我在旅途中听说许多共和党人对鲍威尔将军感兴趣，人们渴望看到一幅新面孔，一个不是政客的候选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多尔参议员也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人选之一，人们在列举他的优势时，很看重他的筹款能力，他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募集到竞选所必须的2000万美元的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无法克服的不利条件，那就是，由于他在华盛顿权力中心呆得太久了，在美国政坛上面孔太熟了，难免不成为选民中日益增长的“反华盛顿情绪”的牺牲品。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菲尔·格拉姆参议员是另一个呼声很高的人物，他以前曾是大学的经济学教师，这决定了他更多地从经济角度去阐述他的政治主张，而这正是当今美国选民关注的焦点，因此，他的优势似乎在于他能以此抓住选民的心。但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而格拉姆参议员看起来对这一点并不敏感，他适时地强调了振兴经济和给人们创造能使其收入稳步增长的就业机会，但在这样做时，他却是以一个不怎么关心社会道德和家庭观念的面目出现的，他说过：“我不会把我的时间用在从道德角度去解释所有的问题上。”事实将会证明，对一个既渴望增加收入又渴望营造安全的社会环境和维持传统家庭的选民群体（代表他们的就是目前势力很大的全美基督教联盟）来说，他的这句话将是致命的。同样，美国人民尽管对在职者表现出强烈的厌恶情绪，但却并未开放到授权于一个几乎未担任过什么公职的新手。格拉姆恰恰是这样一个人，他除了在参议院供职外，还没有过担任州长或政府部长的经历。前国防部长迪克·切尼被认为是一个希望不大的人，虽然他作为国防部长和众议院领袖都曾表现出色，但据说他是一个只适合担任公务员的缺乏个性的人，而且，他有过突发心脏病的可怕记录。至于前住房部长杰克·肯普，在全国还基本上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人物，在他有限的政治记录中，人们评论说：“他的政治主张脱离共和党主流，经济学说又脱离民主党主流。”他究竟将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仍颇费猜测。

看起来，围绕1996年总统职位的角逐很可能将在克林顿、鲍威尔、多尔和格拉姆之间展开，究竟鹿死谁手，殊难预料。美国政治中素有“黑马”传统，说不定到时还会有谁也未见过的“黑马”奔突而出，从上面这些人手中夺走总统宝座。

无论谁当总统，可以肯定的是，20世纪末美国的政治情绪将变得愈来愈

保守，愈来愈回归传统，公众对政治将变得愈来愈淡漠。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上升的潮流将深刻地反映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届时，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将可能是唯一能被理解的政治，美国人民对政治的要求将可能再次回到这样一个在他们心头萦绕了一个世纪的梦想——养活一家人，拥有一辆汽车，最终拥有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也正是美国政治家一个世纪以来向人们许诺的“美国梦”。

寻找新的敌人

“我们国家要保持全球装备最精良、最训练有素和准备最充分的作战部队……要千方百计使我们的部队规模大大缩小，而技术和头脑出类拔萃。”

——引自美国总统克林顿 1995 年 1 月 24 日发表的国情咨文。

美国是当今世界无可争议的军事强国。它的武装部队拥有最充足的经费，装备着世界上最精良的武器，拥有当今世界最庞大的核武库，确立了面向未来的先进的作战理论。美军的指挥官和士兵经历过实战的锻炼。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网和快速机动的远距离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使美国的军事干预能力可达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但美国人似乎并不满足于拥有这样一支军队，每年仍然拨出数千亿美元的军费来维持和更新这支军队：研制更多的高技术武器装备，组建更具打击威力的“天军”部队，进行更多的面向未来的军事演习，总之，依然不遗余力地对其军队进行“未来化”（注意：不是“现代化”）改造，以期使它更快、更精、更高、更强，成为一支集现代所有高新科技成果为一体的“数字化部队”。这就是美国为其军队确立的新世纪发展目标。

敌人消失：兴奋与困惑

在战后持续了 40 多年的冷战时代，苏联是美国的头号敌人，以苏联为代表的那一套制度即美国人所称的极权主义或独裁统治，被美国看成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威胁。因此，战后美国军事力量的设计和发展，完全立足于同苏联和以它为首的华约集团打一场世界大战，或以远远超过对手的强大实力给敌人以“威慑”，迫使它放弃发动战争的意图，接受和平相处。美国从 50 年代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到 60 年代的“灵活反应战略”，从 70 年代的“两个半战争战略”到 80 年代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其基本的战略逻辑就是要准备同苏联及华约集团打核战争、打全面战争。这几十年中，尽管美国政府频繁更替，美国军事战略的名称也几经变更，花样翻新，但对美国政府和军队，甚至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来说，有两点是非常明确和毫不含糊的，那就是，第一，苏联及其令人生畏的庞大武库是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第二，美国武装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遏制苏联集团的侵略和扩张，保卫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在冷战年代，美国军备建设虽一直伴随着激烈的争论，但各种各样的争论却从未波及上述这两个基本问题，因为在任何人看来，这都是不言自明和不容争辩的。对美国武装力量来说，“冷战”是一个充满挑战、充满压力的年代，但也是一个目标明确和斗志旺盛的年代。

然而，到了 90 年代初，一切都改变了。

1989 年 11 月 9 日，发生在民主德国的抗议和逃亡浪潮，使象征东西方两大集团严重对峙和冷战的柏林墙，在一夜之间被推倒了。

1990 年 10 月，两德合并，分裂了 40 多年的德国获得了统一。

1991 年 4 月 1 日，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军事集团之一的华沙条约组织，正式宣告解散。这绝不是 1991 年“愚人节”的笑话，而是历史的真实。

1991 年 12 月 25 日，美国最大的敌人苏联宣告解体。

尽可能地削弱并战胜苏联集团，是美国几十年来所追求的目标。今天，这一目标的实现对美国来说简直可以说是不战而胜，而且实现得如此彻底，不是一般的政策转变，而是一个庞大帝国的土崩瓦解。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预见到变化会来得如此之快，甚至对美国来说，苏联的解体也是一个完全意外的惊喜。显然，在这种变化到来时，没有一个人作好了应付这种变化的物质和心理准备，因为，这涉及到对几十年来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结构进行彻底的变革。

对美国和他的军队来说，柏林墙的倒塌、德国统一、华约解散、苏联解体这一系列的变化意味着，也只能意味着：敌人消失了。但这只是问题的表面，只有那些诸熟历史或长期置身于军旅生涯中的人才能明白，“敌人消失”对一支军队真正意味着什么。彻底打败敌人或敌人不战自灭，既代表着辉煌的胜利，同时也意味着军队自身的生存危机。国家面临强敌的威胁是军队存在的前提，而敌人的消失动摇了这个前提。在中国古代，当和平到来时，人们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传统，在现代，大战结束后也总有大规模的复员。

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军队，首先就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尽管没有人因为苏联的解体而提出解散美国军队的问题，但在美国，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军队将领，都清楚地意识到，对美国军队来说，一个目标明确和斗志旺盛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不能及时地确定国家面临的新威胁来自何方，及时地指明这支

军队的新敌人在哪里，他们就无法抵挡来自国内外的、要求大规模缩减军队和从海外撤军的各种建议。现在，他们必须超越苏联这个老生常谈了几十年的威胁，向美国人民解释维持一支庞大军队的理由。

冷战的结束，在美国引起了一场关于安全威胁问题的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争论的焦点是：谁是美国的新敌人？因此，可以说，冷战结束后，美国军队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寻找一个新的敌人，这关系到这支军队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方向。

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也许是由于对瞬间到来的变化缺乏足够的准备，美国朝野各派倾向于这样一种变化不大的看法：苏联集团的变化并非不可逆转，它的庞大核武库仍对美国构成现实的威胁，美国应付这种威胁的军事结构和作战理论尚无必要作根本的调整。

渐渐的，美国开始寻找新的威胁了。在 1991 年夏天披露的一份美国国防部的内部文件（“防务指南”）中，人们发现了开列着美国潜在敌人的黑名单，除了朝鲜、古巴、越南、利比亚、伊拉克等这些人所共知的美国的死对头外，甚至连中国、德国、日本都被列力美国的潜在敌人。随着这场辩论的深入，核、化、生、导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破坏环境、国际恐怖活动、毒品走私、侵犯人权等等都被列为新时期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后来，又提出了外国的不公平竞争、为美国产品设置歧视性的关税壁垒等有关“经济安全”的问题。直至 1992 到 1993 年，布什政府与克林顿政府即将交替之时，美国才初步渡过了冷战结束带来的困惑，对冷战后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和美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方向有了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这些认识集中反映在布什政府 1992 年的国防报告、1993 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克林顿政府 1993 年的国防报告、五年防务计划报告和 1994 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

战略调整：面向 21 世纪

事实上，早在 1989 年苏联的自由化改革不断深入、东欧剧变开始不久，布什政府就提出了一个名为“超越遏制”的对苏新战略，从大战略上确定了对苏和平演变的总目标。为适应这一大战略的转变，当时就曾酝酿要制定一个不以全面核战争为目标的新的军事战略。有趣的是，可能连布什总统本人也未意识到，他在这里似乎扮演了一个未卜先知的预言家的角色——1990 年 8 月 2 日，就在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筹划入侵科威特的最后时刻，布什总统在美国的阿斯彭学会发表演讲，战后以来第一次提出，今后要将美国防务计划的重点从对付苏联的全球性挑战转向对付地区性冲突。熟悉美国军事战略的人立刻意识到，这一战略构想的提出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战略转变。就在这个讲话发表几个小时之后，美国就真真切切地面对着一场由地区强国伊拉克挑起的冲突。

海湾战争的经验使美国更加认识到地区强国的崛起给美国带来的严峻挑战。海湾战争结束后不久，华约集团解散，苏联解体，美苏全面核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时机成熟。1992 年初，在苏联解体后仅几个月，美国发表了 1992 年度的国防报告，迈出了适应冷战后世界现实、调整军事战略的第一步。1992 年 2 月，美国国防部长迪克·切尼向国会提交了 1993 财年的国防预算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正式抛出酝酿了 3 年之久的新军事战略——地区防务战略。

地区防务战略所反映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将美国的防务重点从冷战时代的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和准备打世界大战，调整为防止地区强国的崛起，对付地区冲突上。其主要内容是：在威胁判断上，提出苏联解体并没有使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减少，相反，美国面临的威胁更加多样化、更加复杂了；在威慑范围上，提出了一个大大扩大的全方位战略核威慑与战略防御的概念，以对付全方位的、难以预测的多样化威胁；在军事部署上，适应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的现实，大幅度削减驻欧美军，但仍强调在全球各地保持足够的前沿存在；在作战方针上，突出强调对突发性地区危机的应急反应能力；在军队建设上，强调削减数量、提高质量、合理编组的精兵政策，重点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地区防务战略的提出，是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最重要、最深刻的一次战略调整，它标志着美国武装力量的建设，开始从“冷战时代”向“冷战后时代”转变。

1993 年 1 月，在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的交替时期，美国先后发表了两个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官方文件，进一步补充和发挥了地区防务战略。

一个是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切尼向总统和国会提交的 1993 年度国防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这位即将卸任的国防部长在仔细整理了自己的思想后，开列了指导美国武装力量建设和构成地区防务战略的 4 个关键因素。这 4 个因素是：1. 战略威慑与防御，它要求美国保持一支平衡的战略威慑力量，具有战略的和战术的进攻能力，保护美国及其盟友免遭敌人弹道导弹的打击。2. 前沿存在，它包括美国军队的演习，在某些地区的定期部署，与友军的交流与互访，建立前沿军事基地和预储军事装备等，总之，通过一切手段显示美国对其盟友承担的安全义务。3. 危机反应，它要求美军具备对发生在相隔很远的不同地区的危机几乎同时作出反应的能力，要求美军维持一支具有快速机动能力和很高战备等级的、能快速部署的部队。4. 武装部队和军事工业

的重组能力，为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全面战争的威胁作好准备。

另一个文件是白宫于 1993 年 1 月 19 日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第一次明确了美国在冷战后世界上所面临的威胁。报告指出，美国在军事上面临的 4 大挑战或曰 4 大威胁是：地区不稳定，核扩散。国际恐怖活动、国际毒品贸易。报告强调，美国国防政策的逻辑是以实力求安全。1993 年 1 月，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基本上继承了布什政府“地区防务战略”的构想，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做了一些调整。新政府对美国国际安全环境的基本判断是：一方面，认为苏联解体后，美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另一方面，又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更加危险和难以捉摸，充满不确定性，特别是地区形势有可能失去控制，产生新的动乱等等。

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发表的第一个有关军事问题的重要文件，是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 1993 年 3 月 27 日提出的 1994 财年防务预算报告。阿斯平在向国会提交这个预算时称它是“第一个真正的冷战后预算”，在这个报告中，他列举了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在军事上应着重应付 4 大威胁：对美国利益的地区性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原苏联、东欧地区民主改革的失败；美国经济的不景气。可以看出，在威胁判断上，该报告的估价只有一点是与前不同的，那就是，它特别强调了经济安全的问题。

第二个文件是 1993 年 9 月 1 日国防部发表的《全面评估：新时期的军事力量》的报告，正式提出了美国在本世纪末之前（1995—1999 年）的军事计划，据说是一次自下而上的全面、系统研究的结果。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 认为今后 10—20 年，美国安全面临 4 大威胁：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储存和扩散；地区性大国可能发动的大规模侵略；原苏联和东欧地区民主进程可能发生的逆转及逆转之后的动乱和对美国的敌意；美国经济颓势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2. 关于战略威慑问题，报告认为，鉴于核大战的危险日益降低，应在继续强调核威慑的同时，重视和突出常规威慑，以制止某些地区强国的军事冒险，3. 在作战指导方针上，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美军的战争准备应立足于发展能打赢几乎同时发生的两场局部战争的能力，这两场战争，一场可能是在中东海湾地区，类似于海湾战争那样的战争，另一场在亚洲，例如朝鲜半岛可能爆发的战争。4. 提出了进一步削减军队规模的计划，将美军人数由 1993 年的 172 万人减至 1999 年的 140 万人。很明显，克林顿政府在军事上的一个重大发明，就是提出了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作战指导方针。

1994 年 7 月 21 日，美国政府发表了一份题为《参与和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全面总结和论述了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经过不断调整和更新而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最新和最权威版本。由于该报告反映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前后两届政府较为一致的战略构想，我们认为，它也大致可以代表美国在本世纪末至下世纪初这段时间里，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基本政策走向。其主要内容是：

1. 对美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的判断：

“新时代已经降临。冷战已经结束。苏联帝国的解体彻底改变了美国和我盟的盟国面临的安全环境。过去半个世纪的首要安全任务——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同时防止核战争——已成为过去。我们已不再在横贯东西方的分界线与大规模的苏军对峙，苏联的导弹也不再瞄准美国和随时准备发射了。然而，仍然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新老安全挑战，随着我们临近新世纪，美国必

须应付这些挑战。”

“大国间爆发战争危险和核毁灭的幽灵已明显削弱。”

“但令人烦恼的捉摸不定的形势和明显的威胁依然存在。替代苏联的新独立国家正在经历痛苦的政治和经济转轨，像中东欧许多新生的民主国家一样。虽然我们同其他大国的关系像本世纪任何时候那样富有建设性，但俄罗斯的未来捉摸不定，中国即使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作用，对内依然保持着一个压制性的政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造成严重的危险。狂暴的极端主义者威脉着从中东到南非的脆弱的和平进程。在全世界，重新出现好斗的民族主义及种族和宗教冲突，波斯尼亚、卢旺达和索马里已证明了这一点。”

“并非所有安全方面的危险都是军事性的。诸如恐怖活动、贩毒、环境退化、人口快速增长和难民潮之类的跨国现象，对美国目前和长远的政策也带有安全的含义。”

2. 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及其实现的途径：

美国要实现其安全，就必须由它来发挥对世界的领导作用，通过这种领导，做到“阻止侵略，促使和平解决危险的冲突，开辟国外市场，帮助民主政体，处理全球问题”，从而实现“使美国更加安全和更加繁荣的目标”。报告指出：“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建立在扩大市场民主国家大家庭并阻止和遏制对我国、我们的盟国和我们的利益的一系列威胁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民主以及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化在世界上，特别是在对美国具有地理战略意义的国家越牢固地扎下根，我国就有可能越安全，我国人民就可能越富裕。”实现国家安全总目标的3个主要途径是：——保持强大的防务能力；——开辟国外市场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促进国外的民主。3. 加强美国安全的7个要素：——保持强大的防务能力；——有选择地使用美国军事力量；——建立有效的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扩散的机制；——军备控制；——参与维持和平的行动；——加强情报机构的能力；——保护环境。4. 美国军队的任务：“要在危险和机遇面前保护和促进美国的利益，美国必须部署能够完成各种任务的强大而又灵活的军队：——应付重大的地区不测事件。——提供有效的海外驻军。——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为多边维和行动作贡献。——支持反恐怖活动的努力和其他国家安全目标。——另有一些任务，通常需要美军的普通或特种部队去执行，这些使命包括：反恐怖活动和惩罚性袭击、非战斗人员的撤离、反毒品行动、国家援助、人道主义行动和救灾行动。”

5. 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的原则：

“第一，我们的国家利益将支配我们参加战斗的速度和程度。

第二，我们（在决定使用军事力量时）将尽可能多地寻求盟国或有关的多边机构的帮助。

第三，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在投入军事力量前，将考虑下面几个关键的问题：是否已考虑过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非军事手段？应使用哪一种美国军事力量？是否能确保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符合我们的政治目标？我们是否得到了美国人民和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的明确支持和保证？我们是否制定了表明行动成功或失败的时间表？在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出现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撤退的战略？

第四，我们的参战不得超过合理的费用和可行性界限。”

此次战略调整也涉及美国的核政策。1993年10月，克林顿向美国国防部下达了第34号总统指令，要求国防部全面审议美国的核武器政策，提出今后10年美国核政策的方向。国防部根据这一指令组织了陆、海、空及战略研究界的军备控制专家们进行了历时1年的研究，于1994年9月公布了《核态势审议报告》，全面评估了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形势对美国核力量和核政策的新挑战、新要求，但其基本结论是建议总统维持布什政府核政策的基本框架，只作微小的调整。审议报告所概括的美国今后10年核政策的基本要点是：

1. 放弃冷战年代“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英文缩写为MAD，曾被戏称为“疯子”战略），转而在对俄关系中奉行“相互确保安全”的核政策。通过谈判进一步削减俄罗斯的核武库，并与俄合作，一道确保现有核武器系统的安全。

2. 保留一定数量的核武器，作为“有效威慑”手段，继续反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提法，坚持可用核武器来回击敌人的核进攻或生物、化学武器袭击，实行核报复政策。

3. 不再谋求与俄罗斯谈判达成新的核武器削减协议，应首先确保已经达成的START和START（美苏1991年第1阶段和美俄1993年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批准和实施。

4. 不改变或取消美国对其盟国承担的核保护义务，继续保留在欧洲的480件核武器。

5. 适应美俄关系现状，调整美国的核力量结构。报告对2003年后美国核部队的规模作出了下述规划：海基核力量，14艘可携带“三叉戟”核导弹的弹道导弹潜艇（现为18艘）；空基核力量，66架B—52战略轰炸机（现为94架）和20架B—2隐形轰炸机；陆基核力量，300—350枚“民兵”战略导弹（现为450枚）。届时，美国拥有的核弹头约为3500个。

6. 核作战目标：一旦发生美俄全面战争，将以核导弹摧毁俄罗斯境内的2500个目标。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经过冷战结束这几年来的战略调整，美国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跨越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的军事战略的基本特征是：

1. 在安全威胁的判断上，认为核大战的危险已经大大减弱，美国当前和今后主要面临四大威胁：一是地区不稳定，指某些对美国怀有敌意的地区大国可能发动的、威胁美国切身利益的侵略；二是核、化、生、导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高技术常规武器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扩散；三是原苏联东欧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民主改革的失败、极权统治的恢复或一国内部的政治动荡，都将被看成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和挑战；四是美国经济的不景气，一个经济上脆弱的美国是无力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无力捍卫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的。

2. 在战略威慑上，坚持全方位威慑，既注重战略核威慑遏制现有的能威胁到美国本土的一切敌对战略核力量，还要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新的核国家，又注重常规威慑，建立快速部署和远距离战略机动部队，来预防和干涉地区冲突，充当世界警察。

3. 在作战方针上，奉行新的灵活反应战略，突出强调几乎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这两场局部战争都可能是中、低强度的冲突。基本的作战思想是：首先集中兵力打第一场大规模的地区战争，同时分出少量兵力介入第二场冲突，主要是迟滞和拖延敌人的进攻，待第一场打赢后，再集中兵力投入第二

场战争，实际上是打防结合，打一场的同时防一手。

4. 进行前沿部署。美军在重要地区的军事存在，被认为是保护美国利益、实现对盟国安全义务的最重要因素。前沿存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在欧洲和东北亚各保持 10 万人的驻军，在中东长期保持一支海军特混舰队和预储可供 5 个作战旅使用的重型装备。同时，在世界其他地区，尽可能地寻找可以接受的地点，以预储军事装备。

5. 在军控问题上，重点转向防扩散，通过建立各种防扩散机制和签订各种防扩散条约，达到限制对手、保持美国军事优势的目的。

6. 坚持与盟国之间的各种共同防务条约体系，以共同分担防务责任，弥补美国力量的不足，并顺应新形势，争取建立各种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以制约潜在对手的行动自由。

上述军事战略是美军的跨世纪战略，在未来一些年中，可能作某些小的修正，但其主旨将不会有大的变动。

为了贯彻美军的新战略，美军各军种都先后修订了各自的作战理论。1994 年秋天，海军经过一段时间的审议，将此前的“从海到陆”战略调整为“前沿存在—从海到陆”战略，重点转向了以进攻陆上目标为主的两栖登陆作战。陆军将此前奉行的“空地一体作战”理论，发展为“空地海天一体”的大联合作战理论，突出强调高技术条件下的全方位立体作战。空军注重全球范围的远距离投送和战略机动能力，强调具备“全球到达”的能力。这些新的作战理论，目前正处在初步探讨的阶段，我们对其详尽的作战指导计划尚难知悉。

美国军队：向少而精的转变

冷战年代，鉴于持续紧张的国际安全形势，世界各国都将其军队建设的重点放在维持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上，并为此投入了巨额的资金。至 80 年代末，世界军费开支每年高达 1 万亿美元，维持着近 2000 万人的常备军。美国着眼于同苏联集团的全球军事对抗，为准备一场同苏联的全面战争，更是致力于建立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在冷战结束前的 1990 年，美国现役部队共有 204 万人，当年军费开支近 3000 亿美元，占世界军费开支的约三分之一，是世界上军费开支最高的国家，就军队员额而言，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之一。1991 年冷战结束后，笼罩在世界人类头顶达 40 年之久的核战争阴霾渐渐远去，人们终于感到，现在可以较为放心地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改善生活质量而不是生产更多的核武器和军备。可以理解的是，在美国和世界各地，人们开始关注国家用于战争准备的巨额费用，希望能对军费预算进行大幅度的削减，将节省下来的金钱用于拯救被冷战时代的军备竞赛搞得疲惫不堪的经济，提高生活质量，从而使人民分享到“和平红利”。在美国，80 年代中后期已显现出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的趋势，1990 年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后，要求削减军费赚取“和平红利”以振兴经济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样，从布什政府（1989—1993 年）开始，美国在其军事战略调整中，就确定了一条质量建军的路线。质量建军的起点就是裁减冗员。削减开支、加强重点，建立一支更精、更强的军队。

在美国，赚取“和平红利”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在确保重点项目的同时，实行精兵政策，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和军队员额。

1990 年 12 月 31 日，美国陆、海、空三军总兵力为 204.68 万人，就人数而言，仅次于苏联和中国。

1991 年 9 月 30 日，美国三军总兵力降为 202.96 万人，比上一年减少约 2 万人。1991 年 10 月，美国国防部公布了一个 1991—1995 财年的 5 年裁军计划，要求美军在 5 年内削减员额四分之一，到 1995 年时将现役部队降至 162 万人，但后来的削减幅度远远超出了这一计划。下面是冷战结束这几年来美军逐年削减员额的情况：

1992 年 9 月 30 日，美国三军总兵力降为 180.70 万人，比上一年减少了约 20 万人，主要原因是海湾战争期间转入现役的大批后备役人员再度转入后备役。（计划到 1993 年 9 月 30 日减至 172.83 万人。）

1993 年 9 月 30 日，美国三军总兵力降为 170.50 万人，比上一年减少了 10.20 万人，比原计划多裁减了约 2 万人。

据美国国防部 1994 年 10 月的一份报告说，截至 1994 年 9 月 30 日，美国三军总兵力为 161 万人，比上一年又减少了 9 万多人。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这时的军队员额，已比布什政府 1991—1995 年 5 年裁军计划中安排的 1995 年的人数还低了。1994 年现役部队的三军构成分别是：陆军 54.1 万人，空军 42.6 万人，海军 64.3 万人（包括海军陆战队的 17.4 万人）。

1993 年，克林顿政府上台后，根据大幅度削减开支和裁减人员的“小政府”政策，制定了裁减军队员额的新计划，比前届政府的削减幅度更大。按照美国国防部 1993 年 9 月制定的 5 年防务计划，1995 年 9 月底，美军现役总兵力将进一步减少到 152.57 万人，并将逐步削减至 1999 年 9 月的 140 万人。如果这一计划最后顺利实施，那么，从 1990 年到 1999 年的 10 年间，美

军就实际减少了 64 万人，削减幅度三分之一多。对美国这样一个军事大国来说，应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在逐年裁减军队员额的同时，美国的军费开支也大幅削减了。为了说明这一情况，我们可以用战后美国军费开支曲线中的几个高点和低点，来同目前的情况加以对比。

历史上的情况是 朝鲜战争时期的美国最高军费为 1953 财年的 504 亿美元，占当年政府总支出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是 65.6%和 14%，越南战争时期的美国最高军费为 1969 财年的 812 亿美元，占当年政府总支出和 GNP 的比例分别为 44%和 9%。越战后期军费开始下降，至 1973 年越战结束时达到一个低点，军费为 745 亿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比 1969 年减少了 100 多亿美元，占当年政府总支出和 GNP 的比例分别为 30.1%和 5.9%。整个 70 年代美国虽然没有介入大规模的战事，但随着 70 年代中后期美苏军备竞赛呈白热化状态，美国的军费开支再度大幅度攀升，至卡特政府时期的 1980 财年达到一个高点，当年军费开支达 1359 亿美元，占当年政府总支出和 GNP 的比例分别是 23.5%和 5.3%。1981 年里根政府上台后，一方面基于美国在军备竞赛中已落后于苏联的判断，一方面着眼于以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充足的军火订单刺激经济复兴的考虑，军费开支快速增长，在里根政府结束前的 1988 年达到一个高点，当年军费开支达 2904 亿美元，占政府总支出和 GNP 的比例分别是：27.3%和 6.1%，这两个比例都比 1980 年大为提高。

1989 年布什政府上台后，开始着手削减军费开支。布什在任的 4 年内，美国防务预算的大致情况（拨款与开支）是：1989 财年预算授权 2995.67 亿美元，实际开支 3035.59 亿美元；1990 财年 3032.63/2993.31；1991 财年 3035.74/2732.92；1992 财年 2950.70/2983.53。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开支最高的是 1992 财年的 2983.53 亿美元，这个开支占当年政府总支出的 21.6%，占当年美国 GNP 的 5%，两个比例都大大低于 1988 财年。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冷战结束后的政策调整趋势。

按照美国的预算法，政府每一年必须向国会提出下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要求。根据这一规定，布什政府为 1993 财年（1992 年 9 月 30 日—1993 年 9 月 30 日）提出的国防预算计划为：拨款 2727.68 亿美元，支出 2906.17 亿美元，这个开支约占政府总支出的 19.9%，占当年 GNP 的 4.7%。这同 1992 财年相比，下降幅度也是明显的。

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继续致力于削减国防开支，而且由于将振兴经济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将平衡预算和减少赤字作为政府的头等任务，军费削减的幅度就更大一些。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位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入主五角大楼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审议，于 1993 年 3 月 27 日正式向国会提交了 1994 财年国防预算，并称之为“第一个真正的冷战后预算”。预算总额为 2634 亿美元，但后来被国会砍掉 24 亿美元，最后经过批准的预算（即国防拨款）只有 2610 亿美元，这比 1993 财年的 2727.68 亿美元减少了近 120 亿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减少 9%，比布什政府原计划的国防预算减少了 40 多亿美元；国防开支力 2769 亿美元，约占政府总支出的 18.5%，占当年 GNP 的 4.2%，这两个比例都比 1993 财年有下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比 1993 财年的开支实际减少了 6.6%。

1994 年 2 月，克林顿政府向国会提交了总额为 2638 亿美元的 1995 财年国防预算，9 月 13 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这个预算。从表面看，它比 1994 财年的 2610 亿美元增加了 28 亿美元，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仍比上一年

实减 0.9%。这个预算约占美国 GNP 的 4%，占当年政府预算的 17.8%。尽管 1994 年 11 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后，克林顿总统迫于国会内持强硬态度的共和党人的压力，重新调整了今后 5 年的防务计划，要求增加 250 亿美元的拨款，但这可能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1995 年 2 月 6 日，克林顿向国会提交了 1996 财年的国防预算，预算总额 2614 亿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又比 1995 财年实际减少了 6.6%，这个预算占 1996 财年政府支出的 16%，低于上一年度的 17.8% 约占 1994 年美国 GNP 的 4%，这个比例也比上一年度大为降低。

“和平红利”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通过大规模关闭和调整海内外的美军基地来节省开支。自 1990 年 1 月起，美军开始对其海外军事基地或设施进行关闭，缩小或转作它用的调整工作，至 1992 年 12 月 3 日布什政府即将结束时，已先后进行 9 次，关闭和缩减了总数达 661 个军事基地或设施，其中 622 个在欧洲，占 94%。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在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的政策框架下，加快了对美军海外基地关、停、并、转的步伐。从 1993 年 3 月到 1995 年 3 月，先后 6 次调整军事基地，使经过调整的海内外军事基地和设施上升至 970 个。

毋庸置疑，这一系列包括军费、军队员额、军事基地在内的全面削减和调整，并不意味着美国有意弱化其军事能力或放弃了精兵强国的建军思想，恰恰相反，这只是其质量建军之路的起点，只是为建立一支更精干、编成更合理、效率更高、战斗力更强的部队作准备。这一点单从军费预算即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美国 1995 和 1996 财年的军费开支虽然降幅很大，但其经费分配的侧重点却是相同的：首先，在军种经费的分配上，侧重海军和空军，因为这是美军实施其新时期军事战略的首选干涉力量。在 1995 财年预算中，海军 784 亿美元，占总数的 31%，空军 745 亿美元，占 30%，陆军 608 亿美元，只占不到 24%；在 1996 年预算中，力海军拨款 756 亿美元，占 30%，空军拨款 726 亿美元，占 28%，陆军拨款 593 亿美元，只占 22%。其次，从经费使用情况看，重点仍然是放在保持美军的战备水平上的，1995 财年的战备训练费与 1994 财年相比上升了 5.5%，由 1994 财年的 880 亿美元增加至 1995 财年的 929 亿美元，占整个军费的约 35%。1996 财年维持战备训练的拨款仍高达 920 亿美元，占整个预算的约 36%，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基本与 1995 年持平，丝毫没有削减；这同军费整体下降形成鲜明的对照。第三，开发新技术和新武器的拨款增加，而武器装备的采办费大幅降低。1995 财年的军事科研拨款为 8.1 亿美元，比 1994 财年增加 4%，在优先确保的研究开发项目中，有新一代核动力航空母舰、“海狼”超级核动力潜艇、“海影”隐形舰艇、V—22 后偏转翼飞机、先进的第 4 代 F—22 隐形战斗机等高技术武器系统。武器维修与保养费也比上一年增加了 20%。与此同时，装备采购费的降幅是惊人的，1995 财年比 1994 财年下降约 15%，1996 财年比 1995 财年又下降了 12%。例如 1995 年与 1994 年相比，战略导弹采购从 175 枚降至 18 枚，军舰采购由 20 艘减至 6 艘，飞机采购由 511 架减至 127 架，坦克从 448 辆减至 0。

尽管目前还难以预测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世界军事领域将发生哪些新的变化，但由于下述几个看得见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美国军队的规模还将继续缩小。第一，世界战略格局多极化的趋势加速发展，各大国之间相互制约的因素加强，爆发世界性战争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从而使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的必要性降低。在此情况下，世界各国仍有可能对现有的武装力量

规模或已经确定的目标进行修正，以顺应国际安全形势可能出现的积极变化。美国也不例外。第二，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是：技术愈高、愈精，对人的解放程度就愈高，从目前世界科技发展状况看，不排除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发生另一次科技革命的可能性。历史经验表明，新的科技革命在使更多的人离开生产线的同时，也能使更多的人撤离“战线”。对于像美军这样一支技术构成非常密集的军队来说，接受新技术的速度和新技术的采用对其军队规模与结构的影响速度都要快得多。第三，在美国政治史上，4年一次的政府更替给我们提供了政策变化无常的众多先例，目前克林顿政府确定的长远建军目标能坚持多久虽然值得怀疑，但假如未来5—10年不发生需要美国全力以赴的战争（看起来不会），那么，即使那批在防务问题上持极端保守观点的共和党人得势，要重新提高“1999年140万美军”这个指标，也将是极其困难的。

美国军队将变得越来越小，但可能将越来越精干，能量将越来越大。

数字化部队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调整中，美国为自己的军队确立了打赢同时发生的两场较大规模局部战争的目标。现在人们普遍关注的是，美军靠什么来形成打赢这两场同时爆发的局部战争的作战能力。

尽管美军装备的精良程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美军的训练和演习多于任何一国的军队，但美国国防部仍然认为，美军的战备程度仍然存在严重缺陷，难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从 1994 年初开始，国防部组织了一个专门检查美军战备状况的小组委员会，成员包括 8 名退役高级军官，陆军上将爱德华·迈耶任组长。该小组在对美国三军进行了半年多的巡回考察之后，于 1994 年 7 月底提出了他们的评估报告。报告说，美军目前为打仗作好了准备，但漏洞很多，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军队仍有可能倒退到 20 年前的“空虚”状态中去，当时，军队人数很多，武器装备数量很大，但作战技能却十分低下。报告认为，美国军队缺乏改善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之间的协调所需要的空运能力，没有准备好如何对付使用生物武器的敌人。报告建议军队在研制新武器装备的同时，应该更经常地举行大规模的诸军种合成演习，以检验美军是否足以应付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局部战争。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国防部对美军是否具备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能力没有信心。到了 1994 年中，就连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也不认为美军具有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能力，并提出应把确保打赢一场局部战争作为近期的战略目标，而把打赢两场局部战争作为长远追求的目标。原因在于，一方面，在美国的潜在对手中，似乎还没有两个能同时发动对美战争的敌人，另一方面，随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美国军费和军队员额的不不断裁减及先进装备采购数量减少、速度趋缓，美军将不具备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能力。据说当时制定这一战略时，使用的措词是“几乎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笔者 1994 年 11 月在北京同美国众议院预算和拨款委员会的一名资深议员讨论这一问题时，对方称，这一战略的最初考虑或者说它的底牌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美军在全力投入一场战争的同时，能够分出兵力来应付可能发生的另一场战争，在战争准备中确立这一原则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或威慑那些可能受到诱惑而趁火打劫的国家。这样，就明确了，所谓应付两场战争的战略，既不是同时打赢，也不是先后打赢，而是在同时“打一场，防一手”的战略。美军将领们也有同感。据美国《陆军时报》1994 年 6 月的一篇报道说，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在内的一大批美军将领们认为，美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具备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能力，原因是三个不足：兵力不足、运力不足、财力不足。

另外，为了落实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战略方针，美国在继续对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进行调整的同时，竭力谋求在世界一些地区建设新的军事设施，进行有针对性的军事物资和装备的预储，但这一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1994 年夏天的某个时候，美国向它在亚洲的忠实盟国泰国提出了在泰国湾建立浮动军械库的要求，但遭到泰国的拒绝。这项建议是由访问泰国的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理查德·马克海军上将转交给泰国政府的，1994 年 11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印度尼西亚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期间，据说也曾当面向泰国总理川·立派进行游说。具体要求是在泰国湾停泊 6 艘满载军事装备的大型运输船，之所以选中泰国，据说是因为它处在中东和朝鲜半岛中间

的上个合适位置上，一旦发生战事，这些船只将能在一周后运抵朝鲜，在两周后运抵中东。美国人自以为是地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加快部署，而对泰国来说“不构成什么主权问题”。但泰国政府并不这么认为。尽管美国施加了很大压力，然而，1994年10月31日，泰国总理川·立派还是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一建议，他说：“美国选择泰国，是因为我们正好处在一个合适的战略地点。但我要遗憾地说，我们不能接受这一建议。”因为，“我们的邻国可能不会理解这一作法。”据说，美国在此前还曾私下同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进行过类似的接触，但这两国政府干脆就未给予答复。

据说，对美军能否具备同时打赢两场中低强度的局部战争的能力，美国军方目前似乎普遍没有信心，一个主要的担心是：尽管用高技术装备武装起来的美国军队，能力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但军队人员的裁减和无限增多的任务，可能将使美军无法承受国家赋予它的使命。根据克林顿政府的军备建设5年计划，本世纪末美军将缩减至140万人，据说这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至今的半个世纪中美军规模最小的时候。但与此同时，美军的任务却大大增加了，除了为保卫美国而作战这个传统的使命外，现今的美军还要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对盟国的保护、国内外的救灾、缉毒、反恐怖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军事或非军事任务，总之，今天的美军将不仅作为保卫国家的工具来使用，而且要作为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工具来使用。这将使美军变得不堪重负。据一份材料透露，1994年9月，在美国出兵海地和前往科威特制止看起来像是又一次来自萨达姆的入侵时，美军第1机步师某旅的2000名士兵分别在9个国家和国内18个州执行任务，像这样一支精锐的作战部队，因统帅部的调遣而非由于激烈的战争行动被肢解到如此地步，在该师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到1994年9月底，美国军队竟然一度陷入了无钱运转的困境，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美国国会和军界一些人士认为，“这是个危险的迹象，它表明美军又重新回到70年代那种徒有其名而毫无战斗力的老路上去了”。但正如美国一些批评家所说的，“这支坦克、舰只、飞机数目减少，军事任务过重、预算日益减少的军队，仍然必须能够执行其首要任务：在大致相同的时间里，在波斯湾和朝鲜打两场大型的地区战争”。

怎样打赢两场几乎同时爆发的局部战争呢？据说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将军直到美军的下层军官，都坚持说美军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他们也承认，美军存在许多薄弱环节，特别是把美军运送到世界各个角落里去的能力非常有限，这严重制约了美军的战争能力。目前，美军正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威廉·欧文斯海军上将负责，研究一种弥补美军各种薄弱环节和不足的替代办法，这个研究小组主要在下面几个问题上上下功夫：1. 空战制敌：寄希望于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战斗机和从美国本土起飞的战略轰炸机，通过轰炸和打击敌人的重要交通线、后方指挥中心、前进中的部队等办法，使敌人根本到不了前沿，这样，将可能大大减少对美军部队的海运能力、后勤供应和作战经费的需求。之所以这样设想，据说是因为今天美军从空中打击和摧毁敌人的能力已经大大超过了海湾战争时期。例如，1992年最新服役的“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上的55架战术作战飞机，都配备了灵巧炸弹，总数约700枚，这比参加海湾战争的“萨拉托加号”和“独立号”航空母舰所载的同类炸弹多5倍。驻海湾地区的美海军司令斯科特·雷德海军中将说，他的军队现在有能力从空中消灭伊拉克的整个坦克纵队，他

不无得意地夸耀说：海湾战争时我们考虑的问题是击毁敌人一辆坦克需要出动多少架次飞机，现在我们考虑的是每出动一个架次可以击毁敌人多少辆坦克。2.协调行动，为克服运力不足的问题，美军正尝试陆、海、空三大军种的协调行动，据说这样可以取得更快和更强的打击能力，使先期到达的人数有限的部队在较长时期内滞敌行动，为大批部队的到来赢得时间。3.更清晰、更全面地了解战场形势：欧文斯上将认为，信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战争资源，未来的军队将越来越多地为争夺信息的控制权而战，计算机就是战场，“控制信息是在未来战场取胜的关键”。1994年夏天，美国和韩国的军事指挥官们在美国海军军事学院举行了两场针对朝鲜的模拟军事演习，在第一场演习中，美军是在没有充分掌握对方情报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的，结果用了23天的时间才扭转了战局，在第二场演习中，美军事先掌握了确切的信息，结果，在发动进攻的朝鲜军队还没有打到汉城之前，美韩联军就在第3天开始投入反攻。

目前，美军正根据信息时代的特点，去设计和从事具有创新意义的军事演习。美国陆军1994年夏天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的一次军事演习中，战场指挥官就是直接从部署在近地轨道上的卫星获取所需情报的，陆军目前正在研究如何将空间监视系统、数字化战场、瞬间通信和远程精确攻击能力结合起来形成战斗力。美国海军也正在建造隐型战舰，在其上部署用于袭击敌人内陆的、射程为120英里的弹道导弹，海军还考虑要建造一种漂浮在海上的“浮动船坞”（比如将几个石油钻井平台连接起来），可供像C—130那样的大型运输机起降，或建造一种有车间和装配线的大型供应船，直接部署到作战区域，在其上生产作战所需的弹药和物资，以此降低后勤支援的费用，并使后勤保障更加直接。

可见，美军是把打赢未来战争的希望寄托在信息战、寄托在拥有信息资源优势的数字化部队上的。从目前美军建设的各个方面来看，美军已定下决心，要建立一支高度数字化的部队，通过部署众多的卫星、无人驾驶飞机和传感器来取得信息优势。

究竟什么是数字化部队？

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所谓数字化部队，简单地说，就是装备了数字化通信系统的部队。它与一般军队在编成和结构上没有什么区别，但它从单兵到装甲战车、坦克、火炮、战斗指挥车、作战飞机和后勤支援等等，都采用了数字化的通信装备，使战场信息的传递达到一种近似实时的程度，从而大大提高对战场情况的反应速度，使部队的作战行动更加快捷。数字化通信设备可使不同的军种和武器系统之间的信息获取、传递和处理实现一体化，使战场上的各种作战要素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成为作战能力的“倍增器”。美国陆军副参谋长加纳将军说：“建立数字化部队的目的就是快速利用信息，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为建立一支数字化部队，从美国国防部到各军种都已经在着手开发自己的先进信息战项目。

1.美国国防部从1994年初开始进行一个名为“先进概念技术示范”（ACTD）的高级研究计划，旨在开发三军数字化部队所需要的各种关键技术。1994年4月，负责技术开发的国防部副部长帮办拉里·林恩公布了ACTD计划的首批6种技术和正在研究之中。可能将纳入计划的其他8种军事技术。例如，他介绍说，精确信号情报侦察技术（SIGINT）和图像情报技术（IMINT）

就是其中的 2 项。SIGINT 将由在精确信号情报来源和需要这种数据的武器之间起纽带作用的工作站和信息处理器组成，敌方目标的各种数据将传输给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移动式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陆军战地炮兵系统。1994 年 9 月，美国国防部公布了一个经过修改的新的《国防科学技术战略》，要求根据未来三军联合作战的 5 大需求来确定国防科技的开发重点，这 5 大需求是：实时、准确地了解敌情，并及时传输给作战部队；迅速将兵力投送到世界任何地点；以低强度的行动制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以最小伤亡和附加破坏达到预期的军事目的；控制和利用外层空间；应付美国敌人得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本土和海外驻军的威胁，与该战略同时公布的《国防技术计划》就根据上述需求，开列了 19 个关键技术领域，1994 财年为这些技术的研制拨款高达 66 亿美元。这 19 个关键领域是：航空航天推进与电源、航空器、航天器、作战空间环境技术、生物医学、化学和生物战的防护技术、被服与食品、指挥控制与通信、计算机和软件、常规武器、电子技术、电子战与定向能武器、土木工程与环境质量、人员系统接口、人力培训、材料工艺与结构、探测器技术、水面水下航行器与地面车辆、制造技术、建模与仿真技术。这些技术取得的研制成果，将为美军数字化部队的信息和装备优势提供坚实的技术基础。

2. 美国陆军正在试验一个快速部队投放计划，该计划由陆军的导弹司令部负责实施，目前正处在一个为期 6 年的技术示范阶段。事实上，这是建立陆军数字化部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计划的背景是，美国陆军意识到，它的应急部队目前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一旦发生战争，把他们从美国本土部署到一个海外的战争发生地的预警时间，将大大短于 1991 年海湾战争爆发前他们所享有的充足时间。因此，陆军长期以来一直想使它的部队具备一种远距离攻击能力，这样就可以不受空运能力不足的限制。为此，美国陆军设计了一个高度保密的“高级陆地战”体系，根据《简氏防务周刊》的材料，“快速部队投送计划”是这个神秘的“高级陆战体系”的 5 大组成部分之一。该计划设想用一套由众多传感器组成的“猎手—杀手”的系统，去捕捉（侦察、分辨、指定）目标的全部信息，并从远距离予以摧毁。具体过程是：在传感系统捕捉到目标的全部信息之后，通过一套数字式指挥控制网络，目标信息被迅速传到后面处于隐蔽位置的武器系统——“远距杀手”，杀手立即出动，在精确制导下找到并击毁目标。这个系统将使原本近距离的战场扩展到上百、上千公里，可能使美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不再面对面战斗”的愿望。陆军导弹司令部领导着一个高级示范项目，以测试该计划可能采用的传感器及武器技术的性能，在今后 6 年中将对各种系统进行全面的示范与演习。可能的系统和技术包括：“猎手”系统的低亮度电视、红外传感器、音响传感器、机载传感装置、前视红外雷达、单兵激光测距仪；“杀手”系统的加强型激光制导导弹、以卡车为平台的火箭吊舱和导弹等多种平台发射器、车载反坦克高速动能导弹—火炮系统（弹炮合一系统）、智能雷区、高命中率迫击炮。根据该计划的日程，到 1999 年 7 月，各个组成部分将合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到时将举行一次综合野外演习以检验其效果。

陆军目前的另一个计划是加紧部署已经研制或改造成功的陆基传感器和前沿地区防空指挥系统。陆基传感器是安装在一种高机动性多用途轮式车辆上的先进雷达，它能向战场指挥员提供通过空中侦察获得的数据，并以数字显示引导“复仇者”和“毒刺”地空导弹小组攻击敌人的飞机、无人驾驶航

空器和巡航导弹,据说陆军从 1995 财年国防开支中获得的相关经费足够部署 8 至 10 个这样的系统。前沿防空指挥和控制系统将硬件和软件信息处理机结合在一起,通过联合战略分发系统雷达和各种机载预警雷达接收信息,并负责将它们传递给所有防空系统的指挥官。该系统目前正在分区配备给美军的地面作战师使用。

为了提高单兵的战场生存、防护和机动能力,美国陆军打算耗资 5000 多万美元,研究开发 21 世纪的陆军单兵装备,主要的項目有:一体化头盔、袖珍计算机、无线电装备、具有防弹、防化学等多种功能的防护服等等。据说美国陆军目前正在试验一种便携式 486X 型单兵袖珍计算机,该机外型只相当于 1 个香烟盒大小,其功能很全,能进行多种数据处理,可直接与卫星通联。美军初步计划于 1996 年试列装,到 1999 年,争取每个士兵都配备 1 个,这将大大提高美军士兵的战场生存能力和作战协同能力,另外,据说一种类似于作战机器人的“士兵综合保护系统”(SIPE)也正在研制之中。

美国陆军一位高级将领在展望新世纪的美国陆军时这样写到:

“美国陆军计划在 2000 年实现完全的数字化。我们将通过现代信息系统的力量改善我们较小的陆军的质量。数字技术和电子计算机将通过提供自动化的战术报告、对敌我双方位置的更好的阵地报告以及改进了的探测和监视,使指挥官能够更清楚地综观战局。这一能力将把坦克、作战车辆、火力支援、战斗中心、直升机和无人驾驶飞行器紧密联系起来。指挥官和士兵能够立即得到信息和报告,战地指挥官和士兵将共享对战局的空前了解,使得更加准确、更大的杀伤力、更好的同步配合、更快的速度成为可能,同时减少自相残杀的风险。”

3. 空军正在从国防部的“先进概念技术示范”计划得到图像情报技术,已通过一个名为“魔爪”的工程计划,努力寻求在飞机座舱中安置图像情报装置,以便在未来的战争中,飞行员能够获得目标的清晰图像,实现精确打击,更重要的是,防止对己方目标的误击。

1994 年秋天,美国空军完成了一个《2020 年空间新技术展望报告》,其中开列了以下几个关键技术领域:从地面起飞而非由火箭发射的载人轨道器、采用新动力的太空升降机、可对地面和大气层内目标进行攻击的太空武器、可改变局部战场环境的气象控制技术、监视和摧毁对地球构成威胁(例如,像 1994 年 7 月的彗木相撞之类的灾难)的小行星的防御系统、监视和预警太阳黑子活动情况的卫星系统。

4. 海军的“合作作战能力系统”可能也将被纳入 ACTD 计划内进一步研究。该系统实际上是一个改进水面作战舰只发射的巡航导弹作战效能的计划,它由信息处理器和数据网络组成,这两者将舰载雷达互相联系起来,以便给海军战斗群更多的导弹来袭警报和截击来袭导弹的机会。目前,试验性的装置已经安装在“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安齐奥”号和“对乔治角”号宙斯盾导弹巡洋舰、“基德”号导弹驱逐舰和“黄蜂”号两栖突击舰上。1994 年 6 月 19—26 日,以“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战斗群在波多黎各海域利用这些试验装置进行了一次火力演习,有关这次演习的结果目前仍处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但据说国防部长佩里参观了这次演习,并对这种新的“合作作战能力系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并希望海军“加快速度继续进行这种系统的研究”。另外,海军在进行有关数字化部队的关键技术研制的同时,仍在加快更新其武器装备。根据美国海军 1994 至 2000 年发

展规划，到 2000 年，美国海军的中坚作战力量将由 12 艘航空母舰和 11 艘两栖攻击舰组成，“美利坚”号和“独立”号航空母舰及 4 艘大型两栖作战舰将在 2000 年前退出现役。装备发展重点是：新一代“百人队长”级核动力潜艇，“海影”隐形战舰，大型海上浮动作战平台（长 3000 英尺，宽 300 英尺），它可搭载各种作战飞机和导弹，造价仅为 1 艘航空母舰的 1/3。1994 年 8 月，美国宣布将大西洋舰队的“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1956 年服役，常规动力，舰号 CV—60）彻底退出现役，改建为一座海军博物馆，供游人参观，并决定将同属大西洋舰队的“肯尼迪”号航空母舰（1968 年服役，常规动力，舰号 CV—67）改为一艘预备/戒备航空母舰。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的缩小，而属正常的更新换代。原定 1995 年底服役的“斯坦尼斯”号新一代核动力航空母舰，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另一艘正在建造中的新一代核动力航空母舰“合众国”号已完成舰体建造，进入内部安装阶段，原定 1997 年竣工服役，看起来，也有提前服役的可能。其他大型作战舰艇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1993 和 1994 财年，美国海军共有约 90 艘各型舰艇被裁减下来，退出了现役，1995 财年还将淘汰 33 艘舰艇。与此同时，国防部 1994 年批准，在 2000 年前拨款 150 亿美元，继续进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的建造工作，计划共建造 29 艘，该型舰的第一艘“阿莱·伯克”号是于 1991 年下水的，截止 1994 年 8 月，已有 7 艘服役，它们装备着先进的“战斧”巡航导弹和“宙斯盾”舰空导弹系统，将同航空母舰、核潜艇一起，构成 21 世纪美海军主力。

5. 1993 年 5 月 13 日，美国国防部长阿斯平宣布，经过一段时期的审议和评估，美国决定放弃耗资巨大而又前景不明的“战略防御计划”（即人们熟悉的“星球大战”计划），10 年来在实施这一计划中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将用于进行一个新的“战区弹道导弹防御计划”，该计划将由美国国防部新成立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局”组织实施。具体工作已从 1993 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在 1994 年全面铺开。该计划的发展重点是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及其技术。在 1995 财年的国防预算中，为该计划拨款近 33 亿美元，其中的 60% 用于开发新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技术。据说 1994 年一年，国防部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局共组织了 40 多次有关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技术的较大型试验。该系统包括陆基、海基和高空防御三个层次，1994 年这三个方面的研制工作都有新的进展。2 月，美国陆军选定了美国劳拉·沃特公司最新研制的“增程拦截导弹”，作为“爱国者”pac—3 导弹防御系统的主要截击导弹，计划要求停止“爱国者”拦截导弹的生产，以新型的“增程拦截导弹”为主来建立未来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1994 年 7 月，美国国防部批准“增程拦截导弹”走出实验室，进入工程研制阶段。当年 10 月底，据说陆军已正式与生产这种导弹的劳拉·沃特公司签订了价值 5 亿多美元的研制合同，要求最迟在 1997 年完成飞行试验，1998 年开始部署。据美国报刊披露的有关材料说，美军计划在 2002 年前采购 1500 枚新型增程拦截导弹。这种新型导弹与“爱国者”导弹的主要区别在于，“爱国者”导弹是通过在来袭目标附近爆炸后形成的碎片毁伤目标，而后者则是直接命中目标。美国海军负责实施的海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基本武器是一种代号为“标准—2IV”的防空导弹，1994 年一年完成了该型导弹的 20 多次陆上和海上发射试验，导致国防部在年底前欣然批准了该导弹的研制和部署计划，要求海军在 1995 年年底前进行该导弹的拦截试验。由空军负责的战区高空防御系统也在 1994 年完成了一系列的前期试验，可望在 1995 年 2、3 月份进行飞行试验。另外，1994 年，国防部还决定在今后 5 年内每

年拨款 8000 万—9000 万美元，用于研制一种天基化学激光武器，利用氢氟反应产生的高能激光束打击来袭导弹，据说这种武器也将是美军未来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各军种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试验进度看，美军在 2000 年可望形成一个新的、高度数字化的反导弹体系。

6. 为建立数字化部队而进行的大规模高新武器研制计划，还得到国防部负责的军民两用技术计划的支持和配合。美国国防部的高级研究计划局在 1994 年底公布了一个 1995—1999 年五年技术计划，该计划提出了包括新一代计算机元件、新型复合材料、目标探测、信息处理、分布式仿真等前沿高技术在内的一揽子研究课题。该计划可能产生的技术和工艺将大大推动美军武器系统的更新换代进程。正像美国国防部研究与工程司司长阿尼塔·琼斯博士介绍的那样，开发军民两用技术是美国新的国防科技战略的主要内容，该战略首先考虑的关键问题是美为美军未来的信息战服务，主攻方向是加快将实验室技术用于作战的速度。

7. 数字化部队建设及其将来作战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军队指挥与控制系统，而现代化的指挥控制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多样化的复杂信息系统。美国国防部控制着世界上最多种类的信息系统，这个系统由大量的计算机体系结构、操作系统、硬件、程序设计语言，软件应用、数据库语言和通信规程等分系统组成，每一个系统都能完成某项特殊任务，但据说各个系统并不存在一致通用的性能。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未来信息战的指挥与控制畅通，美国国防部从 1994 年底开始，着手实施两项旨在使它掌握的所有信息资源一体化和标准化的计划。一项被称为“军人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情报系统”的计划，该系统的长远目标是在整个国防部系统内实现 100% 的信息共用，其途径是：建立一个全球信息数据库和融合中心网络，可以在任何时候向任何地方的指挥员和部队提供成功进行作战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在任何一个终端上，指挥员都能够检索与他们的“作战空间”有关的所有信息。另一项计划是“国防信息管理计划”，其目的是创建一个全面的、国防部范围内的信息基础设施（军用信息高速公路），全力支持美军的总任务，该计划的技术目标是使整个国防部信息系统的数据库标准化和共同使用。目前，这两个计划正由“国防部信息系统局”全面负责实施，估计将一直进行到下个世纪，这两个项目全部建成投入使用后，美军的数字化部队将能顺利运转。

从美军为建立数字化部队而进行的一系列研制工作来看，这种部队的潜力是难以预料的，它可能将引发一场真正的军事技术革命和作战方式的划时代变革，毫无疑问，先行一步的美军将走在这一革命的前列，其作战能力最终可能远远超过应付两场局部战争的需要。现在值得怀疑的倒应该是，具备了如此可怕的作战能力的军队，是否将非常谦逊地满足于自己的行动自由被两场局部战争所限制？因此，不能不提出未来的美军数字化部队将如何作战和同谁作战的问题。

未来美军：与谁作战？

如果仔细观察过 1994 年美军的各种活动的话，就可以发现目前美军的一些重要动向。其中之一就是关于建立数字化部队的各种试验活动全面展开，这一点上面已作了介绍。另外，当前美军中围绕未来战争的各种讨论和有针对性的各种演习空前活跃。1994 年下半年以来，美军院校的一些军事问题刊物非常重视对战争问题的研究，发表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观点：1. 战争问题没有过时，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表明，解决国际争端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军事力量。2. 战争的可能性和破坏性增加了，这主要是由于核、化、生、导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小国家的扩散。同时，爆发先发制人的战争和预防性战争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因为武器性能的提高，将使突然袭击的一方拥有决定性的优势，一些国家由于担心敌手的军事能力会很快超过自己，也可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一些大国为防止某些国家军事力量过于膨胀后铤而走险，制造破坏国际稳定的事端，也可能发动所谓预防性战争。3. 未来战争多发区将是第三世界，这些冲突可能形式多样，有些规模较大，并可能对美国在海外的利益构成严重挑战。因此，美军应作好应付各种形式的局部战争的准备，保持足够的威慑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有效地影响或干预可能发生的危及美国利益的冲突。

世界各国也都注意到了美军在加利福尼亚、亚拉巴马、内华达等州的基地进行的图上作业演习和大规模实兵演练。

看来，美军是时刻准备着打仗的。未来，它究竟可能与谁打仗？根据美军的“打赢两场局部战争”战略，一切战争准备似乎都围绕着与朝鲜和伊拉克打仗而展开，但实际情况可能并不完全是这样。

据美国新闻媒介透露，1994 年 10 月，克林顿政府在一份防务计划指南中设想，美军在 2000 年后可能在下面 8 类情形下卷入战争行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朝鲜攻入韩国；伊拉克和朝鲜同时发动战争；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欧洲某国发生内战；在某个冲突地区展开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参与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某个国家的内部叛乱危及地区稳定。

设想中，美军投入兵力最多的情况是伊拉克和朝鲜同时发动战争。届时美军将在两地分别投入 5 个陆军师、2 支陆战远征部队、16 个空军战术战斗机联队和约 100 架轰炸机、5 个航空母舰作战群，并立即征召 2 万名后备役人员。从现在起，美军将按此设想来建设。

美军甚至还将中国作为它未来的作战对象。1994 年夏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过一个大型的中国军事情况研讨会，来自美国军界、政界和战略研究界的有关人士对 2000 年中国的军事能力进行了评估。有意思的是，关于中国是否对美国构成威胁已经不是研讨会要探究的问题，会议特别关注的是“中国可能对美国形成何种程度的威胁”。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1994 年美军在加州举行的几次模拟未来战争的演习，其假想敌都是中国军队。

在美国，仍然有人认为美军将来的主要对手还是俄罗斯军队，但 1993 年以来不断看到的美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在设计新北约和新欧洲时对俄罗斯安全的特别照顾，这一切似乎表明，美军与俄军交战的可能性正在日益降低。

在未来的作战方式上，美国 1993 年颁布的现行《作战纲要》中，特别强调的是机动作战理论。这种理论一改 80 年代以前美军奉行的消耗战理论，更

加注重的不是从肉体上和其他物质形态上消灭敌人，而是瓦解敌军，粉碎其抵抗意志，从精神上战胜敌人。机动作战的主要作战原则被概括为“主动、灵敏、纵深、协调”，其思路是怎样用规模缩小、数量较少的军队，通过陆、海、空各军种的立体协同和配合，在多样化的战场环境中，以积极进攻、快速机动、避强击弱、整体作战、全纵深同时攻击的作战样式，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因此，有人认为，未来的美术机动作战，类似于“扩大了游击战”，主要战术原则是快速机动、“打了就跑”。另外，由于美军拥有的一整套高技术作战工具，它将是未来最有资格打一场高技术战争的军队，而现代高技术战争愈加强调“先胜而后求战”的思想——战争行动本身与战前准备的时间可能呈现反比关系，战争行动的时间越短，战争准备时间愈长，在旷日持久、周密细致的战前谋划中，战争行动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都被反复推演，最后确定下来的将是一个最优化的全胜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战争行动几乎全部按预想进行，是对一系列事先做好的“设计图样”的最后加工，由于战前进行的许多次图上作业和实兵模拟演练，对于参战人员来讲，真正的战争很可能失去其真实性，表现为“最后一次模拟”。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的美军作战，可能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具有了“导演战争”的意味。

当然，各军种的作战方式仍会有所不同。

美国空军的作战方式也正在酝酿着一次革命性转变，那就是，从海湾战争中空中战役的经验出发，将未来美国空军作战的重心由天空转向地面，不是着眼于打击敌人已经升上天空的飞行目标，而是叫敌人根本飞不起来。美国空军大学（亚拉巴马州的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空中实力高级研究院院长迈林格上校曾在一篇题为《空中优势：不运用便会丧失》的文章中，对如何夺取和利用空中优势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认为，获取空中优势的关键，是在进攻型防空行动中合理选择目标，从他的论述来看，这实际上是一种“空中优势的取得决定于对敌地面目标的打击程度”的理论。这要求进攻型防空行动重点打击敌方下述目标：停放在机场上的飞机、跑道和机场、指挥控制与通信设施、敌机组人员等等。为达成这些战役目的，美空军今后一个时期将重点发展下述武器：隐形作战飞机、精密制导武器、非杀伤性武器、无人驾驶侦察机、飞机座舱内的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等等。

1994年10月，美国海军新战略“前沿存在—从海到陆”正式出台，与1992年提出的“从海到陆”战略相比，重点转向了前沿部署，据称这一转变的主要考虑是，未来有可能向美国利益提出挑战的国家大都位于大陆边缘，是沿岸国家。新战略强调的两种基本作战方式是水雷战和两栖作战，这两种作战方式旨在把海军力量扩展到岸上，以支持地面部队并控制沿岸水域。

1994年秋天，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们要求美军各级指挥官根据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际形势的演变可能给美国提出的挑战，预测今后20年美军的作战方式。相当一部分军官断言，20世纪美国军队曾5次远涉重洋帮助盟国打仗，未来将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未来美国拥有一支数字化军队的新军事环境下，美国可能只向受到入侵的盟国运送一些高技术系统去，并派少许部队去帮助操作和维修这些系统，而不派大批部队去实际参战。与此同时，美军将充分利用自己的指挥控制系统收发图像、电子情报和其他情报，合并数据，研究确定目标，提供可靠的指挥控制渠道，总之，向盟国提供一切作战所需的信息资源。如果时间允许，美国还可为实际参战的部队提供训练和模拟试验。

看起来，美军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武器装备和技术优势，已经使它处在这样一种志得意满的境地：随时准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同任何敌人、以美军所选择的方式（实验室的多次模拟）作战。

鉴于世界军事领域里绝大部分可以预见到的变化都在朝着有利于美国军队的方向发展，美国军队对自己的能力和使命的上述看法，可能将是跨世纪的。

美国面对的世界

“随着旧秩序消失，新世界变得更加自由，但是也更不稳定。美国必须继续领导我们曾经作出巨大努力创造的这个世界。当我们的利益受到挑战的时候，或者当国际社会的意志和良知遭到蔑视的时候，我们将采取行动，如果有可能，就进行和平外交活动，如果有必要，就使用武力。”

——引自美国总统克林顿 1993 年 1 月 20 日的就职演说“美国必须继续介入世界并发挥领导作用。主张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并介入世界的有远见的作法必须指引我们的对外政策。我们现在有令人瞩目的机遇以建设一个有助于实现美国利益和符合美国价值观的世界，即由实行开放市场和开放社会的美国，领导世界走向开放市场和开放社会。”

——引自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 1995 年 1 月 20 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当前的这个世界是在美国领导下创造的，但它已变得让美国不太喜欢了。美国必须继续领导这个世界，使它沿着美国设计的自由民主道路走向未来。美国有能力也有机遇这么做。如果有人不喜欢、不赞成美国这么做的话，美国将不借使用武力，并采

取单独行动去完成这一使命。

这就是美国迈向新世纪的外交誓言。

领导参与扩展

1992年11月，比尔·克林顿当选为美国总统。从一开始，他就把自己看成是一位将领导美国走向新世纪的跨世纪总统，他的一切政策思想都力图勾画美国发展的长远目标。在这样作时，他抛弃了一些陈词滥调，带来了一些新的名词和语言。外交政策是“克林顿主义”的新名堂最多的领域。

1993年1月18日，克林顿在拟好一个主要谈论国内经济复兴问题的就职演说之后，特意光临他的母校、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大学谈了一通外交政策问题。克林顿20多岁时就是在这所大学学习国际政治和法律的。

克林顿说，他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坚持的一个原则，便是当年乔治城大学的一位名叫卡罗尔·奎格利的教授给他上的第一课：“未来第一”。当他展望未来时，他看到了什么呢？

“虽然我们还不能全部看清这个新世纪的轮廓，但它显然是一个既有危险、又有希望的时代，一个未来对千百万人来说会比今天更好的时代，一个自由民主、经济繁荣和人权的梦想能够变成现实的时代”。

克林顿声称，为了这个美好时代的早日到来，世界“需要美国强有力的领导”。接着，克林顿阐述了他为美国对外政策确立的“三大支柱”：

“我的政府的对外政策将建立在三个支柱的基础上。

首先，我们将把我国的经济安全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如果国内没有健全的经济，我们在国外就不可能保持积极的接触。然而，如果在国外没有接触，我们在国内就不可能繁荣起来。因此，我们将设法提高生产率来加强国内经济力量，同时我们要设法确保全球贸易以公开、公平和互利的原则为基础。

其次，我们的对外政策将以改编我国的武装部队为基础，以对付我国的安全利益和国际和平受到的新的和持续不断的威胁。潜在的侵略者应当明白美国的决心：我们不欣赏在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的前景，但是在一切适当的外交措施用尽之后，我们也不会在使用军事力量问题上退缩。

第三，我的政府的对外政策将以民主原则和民主制度为根基。民主原则和民主制度使我国团结一致，也是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人所追求的。民主价值观念的传播已使世界各地饱受几十年压迫的千百万人对自由抱有希望。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我们将支持那些同我们一样抱有民主价值观念的人，因为这是符合美国和全世界的根本利益的。”

从此，美国的对外政策就挂上了“经济安全”、“军事实力”和“民主”这三个标签。事实证明，这三个东西既是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的“三根支柱”，也代表了未来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精神——无论从199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还是从1994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后得势的共和党人的表现来看，美国两党在这些原则上是没有分歧的，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共和党人对这些东西的强调比民主党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共和党人赢得1996年的总统大选而入主白宫的话，可能又会提出新的名词，在具体政策上肯定也会有一些调整，但其所表达的思想，即对外政策的哲学基础仍将是这些东西。这三根支柱看起来要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直到下个世纪。

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套东西立刻被冠以“克林顿主义”的名称。1993年6月1日，克林顿的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一语道破“克林顿主义”的实质，他说：“美国必须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这就

是克林顿主义的核心。”

这个以发挥美国在全球的领导作用为核心的克林顿主义的外交政策，在过去两年中由美国政府的各级政要、以各种不同的语言向世界进行了充分的阐述。

1993年1月13日，克林顿提名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参议院外委会为他举行的听证会上，再次阐述了“三大支柱”，并提出了实施这些原则的七大措施，这七大措施是：

1. 帮助俄罗斯实现经济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防止俄及其他前苏联共和国的核武器向外扩散；
2. 继续向北约组织作出承诺，支持建立包括东欧新兴民主国家在内的新的欧洲安全体系；
3. 继续同中国保持接触，谋求促进中国出现广泛的和平演变，鼓励中国实行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努力；
4. 加强同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为美国的经济复兴注入活力；
5. 在中东，继续推进已经开始的中东和平进程，促成阿以和解；
6. 在非洲，鼓励那里已经出现的多党民主制度的势头和经济开放；
7. 巩固拉丁美洲在过去10年中取得的政治民主和经济进步，争取将西半球北部的自由贸易体制扩大到南部。

1993年2月26日，克林顿在美利坚大学就美国外贸政策发表演讲，阐述了美国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5大步骤。这5大步骤是：第1，治理好美国的经济。第2，将贸易作为美国安全的首要因素。第3，尽最大努力发挥美国在世界主要财政大国中的领导作用，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而进行有成效的国际协调。第4，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第5，支持俄罗斯和其他新兴民主国家的经济改革，确保民主在这些国家获得成功。

“三大支柱”中的“民主”一条后来被奉为外交战略的根基，在随后提出的“扩展战略”中，民主既是起点又是终点。1993年9月21日，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安东尼·莱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发表演讲，提出“扩展战略”。他认为，冷战结束后的新时代有四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美国的核心思想——民主与市场经济得到了世界广泛的接受，10年来民主国家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民主与市场经济已经在当代世界占据优势。二是美国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大国：它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规模最大的经济、最生机勃勃的多种族社会，苏联解体后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对美国构成有效的威胁。美国是世界各国效仿的榜样。三是当今世界的种族冲突激增，对美国的思想、政策和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形成挑战。四是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使信息传播和世界变化的速度加快。他说，在这样的世界上，为了确保美国的利益和理想，美国不仅要参与其中，而且必须发挥领导作用。美国的信念是：捍卫美国利益的最好办法是扩展市场民主制度，“民主和市场经济越能在其他国家起支配作用，我们自己国家就能越安全、繁荣和有影响，更广泛的世界就越有人情味与和平。”因此，他说，美国在冷战后必须采取一种新的“扩展战略”——扩大这个由市场民主国家组成的自由大家庭。这个战略有四个组成部分：第一，加强由主要市场民主国家组成的大家庭，因为它是扩展所依据的核心；第二，在可能的地方帮助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特别是在有特别意义和机会的国家（指前苏联东欧国家）；第三，反抗敌视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侵略，支持其国内的自由化；第四，提供援助，实现美国确定的人道主义议程（人权）。

原则和目标确定之后，随后强调的便是坚持原则和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方法，于是，便有了1994年7月21日公布的、名为“参与和扩展”的国家安

全战略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美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政策的核心思想：以强大的军事实力、繁荣和安全的经济及全球民主化为三大支柱，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发挥美国对世界的领导作用，在全球推进民主化和西方价值观念，扩展由民主国家组成的自由世界大家庭。

1994年11月的中期选举后，共和党人控制了美国国会，并开始激烈抨击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一时间引起世界上许多人的猜测：在共和党人的强大压力下，克林顿政府两年来为美国外交所确定的原则和议事日程会不会发生重大的改变？被称为外交谈判高手的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发挥了他的特长。在1994年11月赴印度尼西亚参加第二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前，他利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同国会内外有影响的共和党人进行接触，最后，克里斯托弗终于确定下来，美国对外政策将在七个方面得到两党一致的支持，从而表明，未来一段时间，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坐阵白宫。美国的对外政策将在下述方面显示连续性：

1. 通过支持公开的国际贸易体制而获得经济上的好处；
2. 在中东实现全面和平，在巴解和以色列、约旦和以色列实现和平的基础上，继续促进黎巴嫩和以色列、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谈判，争取实现阿以全面和解，促成中东地区形成阿以和平共处的局面；
3. 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作为对外政策的优先议程；
4. 支持北约扩大和欧洲一体化进程；
5. 继续维持对前苏联集团新独立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支持；
6. 继续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保持前沿军事力量，对这一地区的安全承担义务；
7. 特别关注危及全人类安全与未来的问题，加强在反恐怖活动、打击毒品走私与国际犯罪、改善世界环境质量、促进人权等方面的国际合作。

在与共和党人协调的基础上，1995年2月初，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国会参议院作证时，进一步将美国外交政策具体阐述为“五大任务”与“四项原则”。

“五大任务”是：

1. 推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协议的实施，保证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常运转，加速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以形成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
2. 推动北约扩大进程，加强欧洲安全与合作，支持北约和俄罗斯发展相互关系，从而完善和建立新的欧洲安全秩序。
3. 支持阿、以和叙、以谈判，继续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同时，继续制裁伊拉克，制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4. 谋求无条件、无限期地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扩大导弹技术控制制度的作用，推动建立“巴统”替代机构，限制敏感武器技术的出口，加大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力度。
5. 谋求国际社会的积极合作，共同抗击国际犯罪、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

“四项原则”是：

1. 坚持参与和领导世界事务，以可信的武力威慑为后盾，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
2. 加强美国与西欧、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和集团的合作关系。
3. 根据新的形势推进和更新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合作机制。

4. 民主和人权将继续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利用北约、联合国、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西方大国控制的机构。在全世界推进西方式民主和市场经济。

从这一系列的对外政策声明和讲话中，可以看出，美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外交战略的基本要点是：第一，将发挥美国对世界的“领导作用”，作为对外政策的根本战略目标继续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第二，将促进美国的经济安全，作为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强调外交为“振兴美国”服务。第三，将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外交的坚强后盾，随时准备对外进行军事干预。第四，是将促进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在全球推行美国式的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经济。

为了体现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参与和领导，克林顿政府在过去两年作了一系列的外交努力。

1993年1月，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违反海湾战争后联合国关于在伊拉克南部建立“禁飞区”的规定，断然决定沿北纬32度线部署防空导弹阵地，企图寻机击落侵犯伊拉克领空的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军用飞机。美国认为，这是伊拉克对西方实行的战争边缘政策。在美国的主使下，美、英、法三国空军出动了数百架作战飞机，对伊拉克南部的伊军导弹阵地、高炮阵地、导弹工厂和核工厂等重要军事设施进行了连续几天不间断的轰炸。这种强硬的军事行动，意在通过回击伊拉克对美国主导的海湾战后安全格局的挑战，显示美国遏制地区强国军事冒险的决心和能力。

1993年2月，为显示美国在维护冷战后欧洲稳定方面的领导作用，美国宣布了一项包括外交、军事、经济制裁和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在内的解决波黑冲突的一揽子和平计划，正式介入国际上谋求波黑冲突政治解决的进程，并在军事上承担了一定的义务。此后，美国出面策划和实施了北约对波黑塞族武装的空袭行动，组织了和平解决波黑冲突的五国（美、英、法、德、俄）国际联络小组。

为了显示美国对俄罗斯民主改革的支持，发挥在国际援俄行动中的领导作用，协调国际援俄行动更好地服务于西方对俄战略，美国于1993年4月出面组织其西方盟国及国际金融机构，在东京召开了援助俄罗斯国际会议，制定了一个援助金额达434亿美元的一揽子援俄计划。这项庞大的援助计划将是一个跨世纪工程。

为了显示其在水世界经济领域的领导作用，1993年12月，美国克服众多困难，最后与欧共体达成妥协，顺利结束了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并表示将支持以新的“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1994年4月，美国参加了在摩洛哥马拉喀什的乌拉圭回合最后协议签字仪式，截止1995年初，美国国会批准了乌拉圭回合协议最后文件，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在欧洲，美国设计和实施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又提出了北约“东进”和“南下”的未来发展战略，为主导冷战结束后正在形成中的欧洲安全新格局，展开了一场面向未来的战略谋划。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美国在1993年7月倡议举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很快在1993年11月于西雅图主持召开了第一届会议，并使这一会晤制度化。1994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第二届会晤中，通过了该组织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日程表，确立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发展的长远目标。1994年，美国国防部推出了美军介入亚太地区的“合作参与”战略，

计划以强大的前沿军事存在为后盾，介入亚太地区的安全对话和建立安全体系的进程。

在非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宰了联合国在索马里、卢旺达和西撒哈拉的维和行动，不同程度地参与推动了南非、安哥拉、莫桑比克、利比里亚的政治和民族和解进程，并力图利用经济和军事介入的机会，在非洲掀起一场多党民主革命。

在西半球，美国主导下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提出了在2005年前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构想，打着联合国的名义出兵海地，恢复了海地的“民主”政权。

在中东，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自1993年2月以来的两年间，曾十下中东，创下了外国政要出访这一地区的新记录。1993年3月10日，美俄联合发起第九轮中东问题和平谈判。1993年9月13日，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了关于巴以相互承认和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加沙—杰里科实行自治的原则协议，中东和平进程取得突破性进展。1994年5月4日，巴以签署关于巴勒斯坦人在加沙—杰里科实行自治的执行协议，1994年11月，约旦和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相互承认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黎巴嫩和以色列、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谈判也已经开始，在中东实现阿以全面和解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为了克服巴以和约以在实施和平协议中产生的深刻分歧，1995年2月12日，美国将埃及、约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外长邀请到华盛顿，举行一次新的中东和平会议，会后发表的公报强调他们决心克服一切障碍和争端，同一切恐怖行为和暴力行动作斗争，将中东和平进程继续推向前进，并希望黎巴嫩和叙利亚同以色列之间的谈判也能尽快取得成果。此外，1994年10月，美国还再度出兵科威特，阻止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另一次可能的入侵。

美国上述外交努力的功过是非，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有时甚至搞得声名狼藉，但它作为昭示美国主宰世界野心的指标，已经足够了，作为说明美国野心十足与能力有限的困境的例证，也已经够淋漓尽致的了。

战略重点：变化的方向

观察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的对外政策，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这个国家外交战略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冷战时代，美苏关系处在全面对抗的状态，为防范苏联对西欧的大规模军事入侵，美国的战略重点一直在欧洲，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许多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战略上面临三大难题，其中之一便是如何确定新时期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的重点，是亚洲还是欧洲？抑或是欧亚并重？

目前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鉴于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开始向经济方面倾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健康发展的经济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此时适逢亚洲经济蓬勃增长，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美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对亚洲国家的出口，据说美国目前有250万个就业机会同亚洲相联系。因此，在未来的新世纪里，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的重点将由欧洲转移至亚洲，美国外交的“欧洲重点”时代将告结束。事实上，1993年美国对亚洲的热情的确异乎寻常，可以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亚洲年”。1993年3月初，美国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在国会作证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美国对亚洲政策的目标——创建一个“新太平洋共同体”，宣布美国新政府将积极介入亚洲事务，分享亚洲经济繁荣的好处，维护亚洲的稳定，推动亚洲国家内部的民主进程，鼓励本地区国家间的安全对话。1993年7月，克林顿在赴东京出席第19次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之后，于7月10日和11日两天访问了韩国。一位新的美国总统上任后的第一次国外旅行就前往一个亚洲国家，这在美国外交中是多年不见的新鲜事。就在这次访问中，他提出了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主张，他说，这个共同体应以共同增强实力、共同繁荣、共同恪守民主价值观为基础。为了实现这个“繁荣、稳定和民主”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排在克林顿政府第一年外交议程上的几乎都是与亚洲有关的问题。4月份，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访问美国，克林顿总统在与其会见时，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向对方施加压力，企图以新的姿态向日本人表明美国新政府谋求平衡美日贸易的决心，向日本方面提出了开放市场的数值指标。紧接着，美国便将在亚洲的主攻方向转向了中国和朝鲜，姿态更加咄咄逼人。克林顿政府挥舞“人权”大棒，在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上施加压力，干涉中国内政，1993年5月23日，克林顿宣布将把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同中国的人权状况相联系，今后是否继续给予中国这种待遇，将视中国的人权状况而定。在朝鲜，为迫使朝鲜放弃其核计划，美国最初是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谋求对朝鲜核设施进行彻底的检查，在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后，美国就开始向朝鲜施加强大的外交和军事压力。1993年11月，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倡议下，亚太经合组织14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云集美国的西雅图，进行了该组织历史上第一届领导人非正式会晤。这次会议显示了美国企图主宰亚太经济合作的战略意图，也被看成是美国实现其“新太平洋共同体”计划的一个重大步骤。这次会议可以说是美国外交“亚洲年”的高峰。正是西雅图会议的前前后后，世界上开始出现这样的议论：美国的战略重点正在由欧洲转向亚洲，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个转变已经完成。的确，就连美国的许多政府官员也认为，对美国来说；当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能像亚太地区那样重要，21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这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纪，它将比“大西洋世纪”更加富有

挑战性，更加繁荣昌盛，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必须积极介入这个新世纪形成的进程。持这种观点的人提供了下述一些令人信服的说法：亚洲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1960年东亚经济只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这个比例在1991年上升为25%，赶上甚至略微超过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如果目前7%—8%的增长速度保持到下个世纪初，亚洲经济的规模将占世界的40%，超过欧洲和美国；是否拥有市场潜力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现在世界正在崛起的10大新兴市场中，4个在亚洲，它们是中国、韩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亚洲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978年时，美亚贸易额只有800亿美元，15年间增长了3倍，达到1993年的3610亿美元，比它同欧洲的贸易额高出50%，占美国对全球商品贸易额的40%，对亚洲市场的出口维持着美国约300万个就业机会。据说克林顿总统之所以一上台就看中亚太地区，是因为他认定太平洋地区能够并且必将成为美国人民就业、收入、合作、思想及经济增长的巨大来源。

然而，到了1994年初，美国的这个所谓“新太平洋共同体”计划就开始触礁了，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面临全面困难。在与日本的贸易谈判中，美国坚持其“数值目标”的强硬立场，频频威胁要援引美国贸易法的超级301条款对日实施经济制裁，导致日本坚定地对美国说“不”，美日经贸关系空前紧张。在朝鲜半岛，美为迫使朝鲜就范，不断威胁要领导国际社会对朝鲜实行伊拉克式的制裁，还把“爱国者”导弹运到韩国，加大了对朝鲜的军事压力，导致半岛形势的持续紧张，同时，由于韩国、中国、日本等坚持以和平谈判解决朝鲜核问题，使美国无法形成对朝鲜施压的国际阵线，在外交上陷于极大的被动，在与中国的关系中，美国以人权问题为借口，顽固坚持干涉中国内政，遭到中国的坚决抵制，中美关系持续紧张，新加坡顶住了美国政府的干预，坚持对一名违反新加坡法律、随意涂鸦的美国青年处以鞭刑，给美国政府一个很大的难堪。以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则坚决反对美国在人权问题和所谓“劳工权利”问题上强加于人的作法。到了1994年初，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的亚洲外交四处碰壁的难堪处境，美国朝野也是一片批评声。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撰文称，克林顿政府的亚洲政策“处在灾难的边缘”，在安全、经济和人权这三个目标上都陷入了困境。其原因在于“外交政策的不连贯和对该地区形势的错误理解”，克林顿“对在亚洲进行政治投资不感兴趣也不在意”，而他的顾问们又都是一些“思路狭窄和目光短浅的人”，他们所作出的影响国家利益的重大决定总是“只着眼于眼前，而不是建立在高瞻远瞩和全面战略的基础上”。前国务院亚洲政策顾问罗伯特·曼宁和前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保拉·斯特恩则认为，美国在人权和贸易等问题上对亚洲国家实行强加于人的那一套，其结果只能是美国与亚洲国家关系的紧张，在此情况下，仍企图建立所谓“新太平洋共同体”，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但上面这些观点还只是一些温和的分析性批评，在美国报刊上更多的是对克林顿政府亚洲政策的猛烈抨击，有人称其“混乱不堪”、“破绽百出”，有的则称克林顿“丢掉了亚洲”，葬送了美国分享亚洲经济繁荣的大好机会等等。到了1994年春天，就连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新太平洋共同体”政策的始作俑者温斯顿·洛德先生，也终于忍不住要站出来讲话，成为克林顿外交政策班子里的第一个叛逆者。1994年4月底，洛德上书克里斯托弗国务卿警告说，除非美国立即采取措施改善

其同亚洲国家的关系，否则美国的亚太政策可能走向“全面失败”，因为美国在处理同亚洲国家关系时的对抗性作风，使它看起来“即使不是恶霸，也像是一个国际保姆”，这招致亚洲国家纷纷抵制美国在亚洲的主动外交行动。据说，这已是这位主管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一年之内第二次异乎寻常地上书了，1993年7月，他曾上书克林顿总统要求缓和在与中国关系中的强硬作法。

“洛德备忘录”促使美国重新审议其亚洲政策。在此期间，美国从1994年初开始，将其外交工作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欧洲。1994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欧洲年”，这是新的一年开始时许多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世界宣布的。就在这个“欧洲年”开始前的1993年11月4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参议院外委会作证时说：“美国与欧洲存在着持久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联系，我们必须把这些联系保持下去。欧共体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在北约保证的集体安全中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这个历史上最成功的民主国家联盟可以为建立扎根于政治和经济自由原则的统统一的大陆奠定基础。”1月初，美国总统克林顿利用参加北约首脑会议之机，进行了他上任以来的首次欧洲之行，先后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就在这次访问中，他以极其明确的语言再次重申了美国的战略重心仍在欧洲的思想。1月9日，克林顿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发表演讲时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宣布也是为了表明，欧洲仍然是美国利益的中心所在，我国安全的核心仍在欧洲。”“欧洲作为美国最重要的伙伴，不仅体现在民主和自由的事业中，而且也体现在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中。”这次北约首脑会议正式批准了美国提出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这是美国设计未来欧洲安全新格局的战略性大动作，6月，克林顿再访欧洲，参加了“诺曼底登陆”50周年纪念活动，强调美国仍将像二战时期那样重视同欧洲的关系。7月，克林顿在赴意大利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之后第三次访问欧洲，在德国提出了建立“德美领导伙伴关系”的美欧关系新思路。12月，克林顿在一年之内第四次赴欧洲，参加欧安会首脑会议，积极兜售美国的“北约东进”战略。

在美国的“欧洲年”落下帷幕之后，世界上一些人似乎倾向于接受克林顿总统的说法，那就是，美国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但大部分人显然对这种一年主攻一个方向的非平衡外交感到更加困惑了，其中一些人讥讽说，目前的美国外交没有什么重点，它“左右摇摆”、“忽东忽西”，令人难以捉摸，反映了美国政府战略思想的混乱。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的观点是：美国当前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的重点仍在欧洲，这是因为：

第一，在世界力量对比的天平上，“亚洲称雄”既不是现实，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目标。尽管目前亚洲经济发展迅速，亚洲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实力日增，但其综合国力及社会发展水平同欧洲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亚洲世纪还远未到来。

第二，将美国与欧、亚两洲的当前经济关系相比较，可以看出，美国与欧洲的经济关系是成熟的和“赢利”的，而与亚洲的联系基本上是粗放的和“亏损”的，美国公司海外利润的60%是从西欧赚得的。美国向亚洲出口的相关产业为它提供了约300万个就业机会，但与此同时，单是欧洲人在美国开办的公司就雇佣了290万名美国职工，占外国在美公司雇佣美国职工总数

的 62%，如果再加上所有其他与欧洲有关的行业，与欧洲的经济关系为美国创造的就业机会至少是亚洲的 2 到 3 倍。美国和西欧国家间的相互投资数额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美国接受的外国投资有 59% 来自西欧国家，只有 17% 来自亚洲，而在美国的制造业中，来自欧洲的投资占到 71%，亚洲只有 14%。另外，从美国对海外投资的数量和效益看，50% 是投往欧洲的，只有 16% 投往亚洲，即使在 1989 至 1992 年的经济衰退期间，美国对欧洲的投资仍然增加了 540 亿美元。就贸易而言，尽管目前美亚贸易额几乎两倍于美欧贸易额，但欧洲市场对美国的开放程度远高于亚洲，美国对欧洲贸易几乎一直是有盈余的，特别是在服务贸易方面，而在对亚洲贸易方面，美国一直是逆差。例如，1992 年美对亚洲贸易存在 800 亿美元逆差的同时，对欧贸易却有 60 多亿美元的盈余，1993 年对亚洲的贸易逆差升至 940 亿美元，而对欧洲仅出现 20 亿美元的逆差。似乎可以这样说，美国与亚洲的经济联系维持着美国工人的就业，消化着美国垄断财团的一部分剩余资本，而对欧洲的经济联系则维系着美国资本的高额利润。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经济政策研究所”和“北大西洋研究咨询公司”在 1994 年夏天提出了一份题为《缩小大西洋：欧洲和美国经济》的研究报告，在对美欧经济关系的所有方面进行了资料翔实的考察和分析之后，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对今后 10 年和下个世纪具有核心重要性的所有经济问题，如贸易法、竞争政策、劳工法等方面，美国的利益和欧洲共同体的利益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美国式资本主义和欧洲式资本主义有着明显的差别，但同太平洋两岸存在的分歧相比，这些差别就相形见绌了。”“欧洲仍是美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美国经济的前途更多地同欧洲而不是同亚洲联系在一起。”

第三，美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对的主要麻烦、需要全力应付的主要挑战来自欧洲，冷战结束后欧洲地区爆发的武装冲突可能危及全球稳定，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民主化进程潜伏的危机也被认为是美国安全面临的巨大挑战。美国要实现北约扩大和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有利于美国的欧洲安全新机制的战略目标，就需要继续在欧洲作大量的工作，将其对外政策的主要精力倾注在欧洲。

第四，当前美欧之间，由于冷战时代的共同战略对手消失，矛盾冲突正在暴露和发展，特别是经济领域里的磨擦和围绕欧洲安全新格局的主导权之争日趋激烈，但这些矛盾和冲突在短期内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欧是美国在世界上最接近的“精神同盟者”，对美国这样一个表面看似重视经济利益，实则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国家来说，欧洲的支持和共鸣对它来说将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少的安慰。大西洋联盟是一个同种、同源、同制的价值共同体，议会民主制度、天赋人权的信念和对基督教文明的共同皈依是这一共同体的基本纽带，它使这一共同体表现出某种超乎世俗经济利益之上的价值，对这种价值的追求决定了美国将继续把欧洲引为它最忠实的伙伴。而美国与亚洲显然不存在这种联系。在亚洲，只有一个被美国认定的“民主国家”，这就是日本，但日本的文化与所谓西方文明有天壤之别，更何况美国将中国、朝鲜、越南等亚洲主要国家的意识形态看作洪水猛兽。

第五，在欧洲，存在着北约、欧安会等由美国牵头成立并可自由操纵的一整套安全机制，可为其战略利益服务，而在亚洲，既不存在这样的机制，同时，意欲建立这样的机制，其前景也是难以预测的。

第六，撇开艰涩的分析和论证不谈，这方面最简单的论据便是美国人自

己的宣示，这从上文克林顿和克里斯托弗的演说中已经看得很清楚。这里，不妨再看一下 1994 年 7 月 21 日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欧、亚两洲的不同描述。首先，在这个报告中，欧洲仍然被置于地区战略的首位，亚洲则位于其后，这并不是一个在政策上毫无意义的版面技术处理，其次，描述这两个地区的用语是有明显差别的，关于欧洲。它写到：“欧洲的稳定对我们自身的安全至关重要，这是我们在本世纪两次付出巨大代价后才得到的一个教训。欧洲经济充满活力，意味着美国人在国内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国外有更多的投资机会。随着苏联帝国的解体和随后新兴民主国家的诞生，美国在争取建立一个统一和自由的欧洲方面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能与美国携手合作保持和平和促进繁荣的一个统一的、民主的欧洲。”这是一个既有历史感，又充满信心、富有乐观精神的“欧洲观”。美国的“亚洲观”又是什么样的呢？报告的第一句话是：“亚洲是一个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具有越来越重要意义的地区。”即这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才刚刚由潜在变为现实。另一句话是：“在考虑亚洲地区时我们必须记住，安全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这即是说，亚洲是一个需要美国抽出力量加以防范的地区，而不是其依托的基本力量。

然而，问题的另一方面同样不可忽视。我们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美国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但这已同冷战时期谈论的欧洲重点有所不同。美国对外政策过去两年在欧亚之间的摇摆，恰恰说明美国的战略重点已经不是一成不变的了，而是处在一个变化和转移的过程中，尽管现在把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称为“亚洲世纪”或“亚太世纪”还为时过早，但不能否认的是，近年来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重心的确在明显东移，这是一个看得见的发展趋势。随着亚洲在世界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中的分量的日益加重，它在美国经济、外交和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也将日趋上升，目前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的美国，其利益和政策将随之愈来愈多地向亚洲倾斜，可以预见，这种“倾斜”或“转移”，将可能导致美国在下个世纪初的某个时候形成一种“欧亚并重”的对外战略。但这也仅仅是一种过渡。在亚太世纪真正到来时（2030 年？2040 年？），美国的对外战略可能是、也只能是：以亚洲为重点，兼顾欧洲。

美国与俄罗斯：背靠背的伙伴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这远远超过了美国对实现其对苏“遏制”战略的最高期望值。美国人在度过最初的狂喜和困惑之后，终于在1993年时形成了处理新时期美俄关系的基本思路：尽一切可能支持俄罗斯国内正在进行的民主和市场经济改革，阻止俄罗斯及拥有核武器的其他前苏联共和国的核扩散，在此基础上建立美俄“建设性伙伴关系”，将俄纳入西方战略轨道加以限制和利用。美国政策的逻辑是：只要俄罗斯能够顺利地成长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它就必然会成为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自由民主大家庭的一员，而对引导它走上民主自由道路的“导师”美国来说，这将会是一个顺从的和听话的好伙伴。当代的美国政治家们就是从这样的战略意图出发，去设计它同俄罗斯的关系的。1993年5月27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明尼苏达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美国对俄政策的5项基本原则：1. 尽快向俄罗斯人民提供实惠；2. 帮助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3. 扩大美俄两国间的人员交流项目；4. 着眼于增进美国的安全；5. 与国际社会共同行动，协调立场。

无论这个新的对苏战略与冷战时代有多大的差别，但有一点同冷战时代还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美国仍然将美俄关系看成其外交战略中最重要 的双边关系，1993年11月4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参议院外委会作证时说：“我们支持俄罗斯及前苏联集团其他国家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进程，确保这一进程的成功是我们对外政策最优先考虑的重点。”1994年7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写到：“我们的战略核心是，在我们有着最严重的安全方面的忧虑但又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的其他地区，帮助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生存和发展下去……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努力集中在最有影响的地方，在这方面，俄罗斯是一个关键性的国家。”

1993年，美国对俄政策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削弱俄罗斯的核武库，解除前苏联其他有核国家的核武装，防止其向外扩散。

在美国对俄政策的日程表上，美国最关心的就是削弱俄罗斯庞大的核武库。布什政府在任的4年间曾为此作出过努力，在1993年初布什政府与克林顿政府交接之际，排在布什政府外交日程上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完成美俄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START II）。1993年1月2日—3日，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俄罗斯。1月3日，美俄两国总统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条约规定在10年内（至2003年）将各自现有的核弹头削减2/3。届时，美拥有的核弹头为3500枚，俄为3000枚。应该说，美通过这一条约大大削弱了俄在这一关键性的领域一直享有的对美国的优势。1993年10月底，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遍访俄罗斯、哈萨克、乌克兰和白俄罗斯4个独联体核国家，利用这些国家的经济困难，挥舞“经济援助”的“胡萝卜”，诱使它们放弃核武器。在哈萨克，美国以区区1.4亿美元的援助，换取哈萨克承诺将它的1000枚核弹头尽快拆除和运往俄罗斯销毁，在此之后加入核不扩散条约；在乌克兰，美乌签署了关于乌克兰接受美国帮助拆除其境内所有核武器的双边协定，美国为此支付的代价仅为3.3亿美元；在白俄罗斯，克里斯托弗非常满意地看到了该国完全出于自愿的非核化行动，在这里他没有付钱，但却“慷慨”地邀请白俄罗斯加入北约组织。这样，美国就接近于实现将前苏联的所有核武器都推回俄罗斯境内统一管理

（实际就是拆除和销毁）的目标。

第二，以大规模的援助俄罗斯计划去支撑叶利钦的政治地位，确保俄民主改革计划的顺利实施。

1993年1月20日，克林顿政府宣誓就职。时值俄罗斯国内政治斗争空前激烈，以俄总统叶利钦为代表的行政权力受到俄议会的强有力的挑战，两权斗争的焦点是国家权力的分配问题。斗争主要围绕限制总统权力和扩大总统权力这一问题而展开，在这里，叶利钦面对着强大的议会反对派，执政地位每况愈下。美国新政府作出判断，亲西方的叶利钦地位的削弱是一种危险的趋势，除非美国采取果断行动支持叶利钦，否则，美国和西方将可能面对俄罗斯改革进程发生逆转的严重局面。1993年2月25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结束上任后的首次中东之行回国途中，在日内瓦与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举行会谈，共同设计了一系列支持叶利钦地位的双边和多边行动，这其中包括一次美俄首脑会晤、一个援助俄罗斯国际会议、一次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美俄联合军事演习。3月10日，美国在发起第九轮中东和谈时有意拉上了俄罗斯，与其联袂作中东和平进程的推动者，满足俄罗斯显示其大国地位的愿望。事实是，美国承担了发起这轮谈判的全部艰难的幕后工作，它在完全可以独吞果实的情况下慷慨地送给俄罗斯一顶促进中东和平的桂冠，这是美（苏）俄关系史上空前的外交举措，3月14日，为期三天的西方七国援助俄罗斯秘密会议在香港结束，会议宣布在1992年向俄提供120亿美元援助的基础上，1993年将继续提供资金支持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其规模将比以前大得多，此时，俄罗斯议会正就叶利钦提出的全民公决动议进行激烈的辩论，在3月20日叶利钦宣布实行总统特别治理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4月3日至4日，美俄两国首脑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举行克林顿上台以来的首次会晤，就在这次会晤中，美国许诺向俄罗斯提供16.2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援助。美国在东京会议的最后一天又宣布，除了在月初的美俄首脑会晤期间已答应提供的16.2亿美元的援助外，美国还将向俄提供另外18亿美元，很明显，西方在一个月之内的这两大举措，都同俄罗斯将于4月25日举行的宪法全民公决有关，目的是支持叶利钦的地位，使其不致在即将到来的全民公决中失利。美俄首脑会晤结束之后，美国总统克林顿宣称，这次会晤为美俄建立新的“民主伙伴关系”及结束45年的核武器对抗政策奠定了基础，援助俄罗斯是对俄民主和改革的支持，更是对美俄关系未来的一笔投资。

1993年4月25日，俄罗斯如期举行了全民公决，两天后发布的统计结果表明，叶利钦渡过了一场政治危机，巩固了他的权力地位——占参加投票总人数58.2%的人对“是否信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得知这一结果后说，美将继续扩大对俄援助，继续支持叶利钦和他的市场经济改革方针。

在此之后的1993年7月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应邀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这次会谈中，西方七国又同意为俄罗斯提供30亿美元，用于帮助俄加快实现经济私有化。

1993年秋天，俄罗斯两权斗争呈现白热化状态，美国依然坚持其支持叶利钦总统的既定立场。9月25日，美国将西方七国的财长邀请到华盛顿开会，会后发表的声明赞扬叶利钦的改革道路代表着俄罗斯人民的美好未来，是致力于将俄罗斯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唯一正确道路，西方将继续支持他

及他所代表的政策。这个声明对叶利钦的政敌是致命的一击。10月3日，叶利钦动用坦克攻击反对派占据的议会大楼，莫斯科发生流血事件。即使如此，美国仍然表示了对叶利钦的坚定支持。这年秋天，在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访问华盛顿期间，美俄还签署了关于在宇宙空间探索、能源开发和环境保护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美国方面根据这些协议取消了对俄罗斯有关行业的制裁。

第三，建立较为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成为美俄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1993年4月20日，美俄两国军队在俄罗斯境内举行了二战结束以来的首次联合军事演习，走出了美俄关系史上划时代的一步。8月18日—20日，美俄两国海军在堪察加半岛外海举行了一次联合海上演习，这是美俄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举行的首次联合演习。最后，两国于1993年9月8日在华盛顿的五角大楼签署了一项军事合作协定，决定在两国国防部之间架设一条处理突发性危机的“热线”电话，建立两国国防部长每年一次的定期磋商制度。更为惊人的是，双方决定突破近几年来象征性的小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搞一次师规模的大动作，地点在俄罗斯境内，演练科目是模拟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克林顿政府1993年对俄外交取得的多种成果，在1994年1月的美俄首脑会晤中进行了总结。1月12—15日，克林顿与叶利钦在莫斯科举行了自1993年4月温哥华会晤以来的第二次正式首脑会晤。此次会晤的主要成果表现在：政治上，双方宣布美俄关系进入了“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新阶段”，美国支持俄罗斯关于西方七国吸收俄罗斯变为八国集团的建议；经济上，克林顿承诺1994年将向俄提供25亿美元的援助，并尽力说服国会1995年再向俄提供9亿美元，另外拨款3亿美元建立支持俄中小企业基金，1亿美元建立支持俄大型企业基金，美支持俄加入关贸总协定，取消4400种俄输美产品的进口关税，鼓励美国企业家到俄投资等等；军事上，双方签署了不再将核武器瞄准对方的协议，规定1994年5月3日以前重新确定两国核武器的瞄准目标，签署了关于美向俄购买从核弹头中拆下来的浓缩铀的协议，今后20年美将向俄支付120亿美元购买500吨浓缩铀；在国际和地区问题方面，签署了美、俄、乌（克）三国关于销毁乌克兰境内所有核武器的协议，规定将乌克兰境内现有的176件核武器和1800枚核弹头运往俄罗斯销毁，销毁费用将由美国承担。

很显然，在1993年，美国通过上述重大外交行动，成功地维护和促进了维系于美俄关系之上的美国利益的一切方面，然而，我们即将看到，由于美国在设计和实施对俄战略时存在着下面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疏忽，注定了克林顿鼓吹的美俄战略伙伴关系的脆弱性和虚幻性——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通常很少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俄罗斯人对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怎么想的？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举行了全国性的新宪法全民公决和新议会选举。在这次投票中，叶利钦代表的民主改革阵营在宪法公决问题上取得一定胜利，叶利钦炮制的以扩大总统权力、削弱议会权力为主要特征的新宪法得到52%选民的赞同，但他们在议会选举中遭到很大挫折，三个主要的反对党占据了议会多数席位。政治力量对比的如此变化使俄政坛一批主张渐进改革的所谓保守派势力和一些持强烈民族主义观点的人地位上升。对美俄关系来说，这次投票还反映出—个重要的倾向：大多数选民对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的衰退感到痛心疾首，企盼着俄罗斯改变对西方一味妥协退让的软弱外交，在

国际上重树俄罗斯的大国形象。这表明，在俄罗斯社会，大俄罗斯主义正在抬头。同时，这次投票使叶利钦在政治斗争中拥有了新宪法这一强有力的工具，也多少淡化了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仰赖西方支持的需要。

1994年2月24日，从叶利钦发表的一篇题为《关于巩固俄罗斯国家的咨文》中，美国人似乎才第一次听到了俄罗斯对美俄关系的真正看法。叶利钦说，新的一年俄在国内政策方面要摒弃机械照搬西方模式的作法，在对外政策领域也将“结束单方面让步这种错误的实践”，因为它“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性，与俄的大国地位不符”，俄今后应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加强独立性，特别是要“将维护俄罗斯的国家 and 民族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以重新“树立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形象”。

从叶利钦的讲话中，美国人得出了两个结论：俄在国内无意实行完全西方式的民主和市场经济，在国际上并不满足于做一个驯服的小伙伴，俄正处在一个“大国意识”复苏的阶段。意识到这两点，使1994年成为美调整对俄政策和美俄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的一年。

第一，美调整对俄政策。1994年3月14日，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在华盛顿大学发表讲话，传达了美国政府的这样一种看法：俄罗斯的走向依然难以断定，它既有可能成为一个完全民主和面向市场经济的国家，也有可能在经济动乱之后成为同西方敌对的极权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国家，即使俄成为像德国和日本那样的盟国，美国在与其打交道时仍会存在竞争和争夺。为此，美今后将本着现实主义的原则，谋求同俄建立一种“实用伙伴关系”。这表明，美国既想维持同俄罗斯的总体合作，以继续推动俄的政治经济改革，又将针对现实情况，同俄展开利益的争夺，并加大对俄的防范与抑制，这将成为美制定对俄政策的新的出发点。

第二，美俄关系中的矛盾和摩擦增多。在前苏联地区，俄罗斯多次声称俄享有“特殊利益”，负有“特殊责任”。1993年11月公布的“俄罗斯新军事学说基本章程”宣称，俄拥有在俄以外地区部署军队的权利。1994年4月，俄宣布将在独联体其他国家内建立30个永久性的军事基地。俄谋求独联体势力范围的这一动向引起美国的警觉，美国在这一年春天，先后邀请了哈萨克、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三国总统访美，向他们分别提供了经济援助、安全保障，或建立了军方之间的定期磋商和合作制度，以抵抗俄罗斯的攻势。在欧洲安全方面，俄提出一个“全欧安全构想”，同美国的“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相抗衡，企图以欧安会为基础建立欧洲安全体系，挫败北约东进的企图。后来，又在俄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问题上多次“叫停”，以显示其大国地位。在波黑问题上，俄坚决反对美国主使北约空军空袭波黑塞族军队，强调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是和平谈判，并通过积极的外交斡旋缓和了波黑的紧张局势，再次显示了其作为一个欧洲大国的地位和作用。在朝鲜问题上，当美国威胁要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之际，俄则建议召开朝鲜问题国际会议，谋求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并异乎寻常地声明，如朝鲜遭到外国侵略，俄将履行苏联1961年同朝鲜签订的友好互助条约。在南亚，俄不顾美国为防止核扩散而对印度施加的压力，坚持向印度转让低温火箭发动机技术。1994年7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应邀参加了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的第20届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政治问题磋商。他在会议期间同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会见中抱怨说，美国虽然承诺了大规模的援俄计划，但却仍然根据1974年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对俄罗斯进行贸易歧视，终于使美国于当年9月

发布新政策，使俄不再受那一法案的限制。1994年12月，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提出北约东进战略时，尽管他们一再强调了“北约扩大不是针对俄罗斯的”、“将尽量避免孤立俄罗斯”等等，俄仍然坚决表示了对这一进程的反对。总的看，1994年是美俄关系发生较多龃龉的一年。

从冷战结束以来美俄关系的反复中，我们看到，美、俄两国政府在某个时期曾大肆渲染的所谓“民主伙伴”关系、“建设性伙伴”关系或“战略伙伴关系”，其实是脆弱和虚幻的。如果说现今的俄罗斯已不具备在世界范围内同美国争霸的实力，从而谈不上美俄全球战略利益冲突的话，那么，至少在欧洲，由于美俄根本战略利益的不同，它们之间难以建立起携手合作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如果说它们之间目前存在着一种伙伴关系的话，那么，双方对这种关系的理解和期望值也将是不同的。最根本的一点是：美希望在花费了巨额金钱之后，能看到一个感恩戴德地、建设性地服务于美国利益的俄罗斯“小伙伴”，而俄罗斯却指望美国和西方帮助它渡过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难关，重新崛起为一个有影响的“世界大国”。两种不同的期望即使不是尖锐对立的，也完全可以说是隔膜的和难以沟通的，而且，双方都指望在同一种关系中——双方也都乐于将它称为“伙伴关系”——实现自己的期望或者至少改变对方的期望。这注定了美俄伙伴关系是一种各怀鬼胎、各取所需、相互充满戒备和防范之心的古怪关系。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两个“背靠背的伙伴”，而不是肩并肩的伙伴。

因此，对未来的美俄关系，我们只能作出下面的展望：

1. 美俄关系的主流仍将是合作与妥协，不大可能再回到冷战时代的全面对抗中去。俄罗斯需要西方的资金、技术和经验来渡过难关，实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不大可能会改变与西方合作的基本政策。美国需要俄罗斯的合作来推行其国家大战略，为建立一个世界自由民主大家庭，也不大可能会放弃对俄民主改革的支持。美俄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将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等多方面表现出来。

2. 矛盾和摩擦将伴随美俄关系走向新世纪。从地理上看，矛盾将主要集中在从中亚开始、经高加索和东欧直到大西洋这条线的周围，焦点是俄罗斯的边界安全问题。但是，美俄矛盾冲突升级为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3. 随着美国战略重点的逐渐东移，美俄关系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将可能下降。就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力而言，今天的美俄关系与冷战时代的美苏关系不可同日而语，随着世界多极化格局的进一步成形和完善，未来的美俄关系对国际形势演变的影响力也将越来越小。

美国与欧洲：恼人的重点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当前和今后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欧洲仍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地区，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维系于欧洲，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麻烦也来自欧洲。这种既爱又恨的复杂感情决定了美国在同西欧的联盟关系中，既存在利益共享的愉快，又充满懊恼之情。由于大西洋两岸的人们大都习惯于享受这种关系的愉快氛围，因此，在争吵和摩擦日益增多的今天，这种关系更多地使人感到懊恼。

在战后持续 40 多年的冷战时代，为了遏制共同的战略对手苏联，美欧结成了看起来似乎牢不可破的大西洋联盟，但即使是在美苏对峙最紧张的岁月里，大西洋联盟内部关系也存在矛盾和冲突，美欧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明争暗斗是这一联盟固有的伴生现象，冷战结束后，随着共同的战略对手消失，联盟的基础被动摇，过去被掩盖着的矛盾开始暴露，被压抑着的能量和感情寻求发挥，自我克制以维护团结的精神正在被遗忘。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寻求自身特性的进程与美国力图继续主导欧洲事务的努力日益产生冲突，使得美欧关系中的摩擦和争吵进一步发展，这里所表现的，既有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又有政治上的自行其事，也有安全问题上左右为难的迷茫情绪。过去两年，可以说是美欧关系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进行艰难调整的时期。

1993 年，美欧关系基本上是在贸易争吵中渡过的。

新年伊始，大西洋两岸就爆发了新一轮充满火药味的贸易报复与反报复。1993 年 1 月，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准备实施它的“公平贸易”政策，向欧共体提出开放市场的进一步要求。谁知，还没等美国人行动，欧共体已经走在了它的前面。1 月上旬，欧共体委员会颁布一项保护主义指令，要求其所有成员国在政府采购合同中拒绝使用“欧共体生产部件不足 50% 的外来产品”，同时要求各国在进行政府采购合同招标时，在欧共体厂家的报价不高于外来产品 3% 的情况下，优先使用欧共体的产品和服务。这一行动等于将其他国家的厂商，特别是传统上在这一市场中占有很大份额的美国厂家，排除在欧共体 12 国的政府采购市场之外了。这一决定立即招致了美国的谴责和报复。1 月 27 日，在克林顿政府上台刚刚一周的时候，美国就宣布对包括欧共体在内的欧洲 19 国向美国的钢材出口征收 109% 的反倾销税。2 月 1 日，又宣布禁止美国政府部门在公共采购合同中接受欧共体的产品和服务。这两个措施给欧洲国家的钢铁工业带来严重的后果，可能使欧共体对美国钢材出口减少 1/3。2 月 2 日，欧共体 12 国外长会议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并称将保留对美采取必要的报复行动的权利。

另一轮更为激烈的贸易争吵不久就到来了。

2 月底，在英国首相梅杰访问美国期间，克林顿总统大声指责欧共体国家向欧洲“空中客车”工业公司提供补贴的行为。1993 年 3 月初，法国总统密特朗访问华盛顿。就在这次美法首脑会晤中，克林顿却毫不客气地提醒他注意，欧共体国家特别是法国实行的农产品出口补贴政策，已对美国农场主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5 月 27 日，美国政府宣布了对欧共体的制裁措施，其主要内容是：禁止美国公司在通信、能源、运输等方面与欧共体国家签订合同。对此，欧共体毫不示弱，随即于 1993 年 6 月 8 日宣布了反报复措施：在公共服务、产业和公共工程等方面，禁止美国公司在欧共体国家投标。

在贸易争端激化的同时，双方在波黑问题上也开始进行较量。自从 1991

年前南斯拉夫境内爆发民族武装冲突以来，美国一直采取的是较为超脱的立场，放手让西欧国家（主要是法、德）出面解决这一问题，这也是西欧国家的想法。但到了 1993 年，美国终于对西欧在此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失去了耐心。2 月 10 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宣布了一个包括外交、军事、经济制裁和人道主义援助在内的解决波黑问题的一揽子计划。2 月 25 日，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宣布美国将派飞机在波黑空投救济物资。3 月 31 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操纵下，通过决议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波黑禁飞区有关规定的实施。此后不久，在美国总统的波黑问题特使从中斡旋下，一直由欧洲国家主导的波黑冲突三方和谈（谈判地点在日内瓦），转移到美国纽约举行。尽管和谈也像从前一样没有谈出什么结果，但这对欧洲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美国突然间插手波黑冲突，实际等于向欧洲表明，美国经过近两年的观察得出结论：欧洲并不具备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要维持欧洲的和平与稳定，离开美国是不行的。这令欧共体国家感到十分不快和难堪。

然而，到了 1993 年年中，大西洋两岸似乎都意识到，美欧关系如此恶化下去，对冷战后欧洲安全新格局的建立将带来致命的危害，也许是该“踩刹车”的时候了。1993 年 12 月 15 日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最后期限，如果因为美欧难以调和的贸易争执而导致这轮谈判的失败，他们就将招致全世界的指责，这是促使他们“刹车”的原因之一。在这一年 7 月初于日本东京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我们看到了美欧缓和其贸易争端的第一个积极步骤。当时，美、欧、日、加拿大四方达成了涉及药品、建材、农机、服装等众多领域的一揽子市场准入协议。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协议签字后喜气洋洋他说，该协议的执行将在今后 10 年内为美国创造 140 万个就业机会，增加 1.3 万亿美元的产值。在此后的 5 个月中，美欧双方的贸易谈判代表经过多次讨价还价，终于在 1993 年 12 月 15 日之前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使乌拉圭回合谈判顺利结束。

1994 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四访欧洲，全面提出和实施美国对欧洲政策，使冷战后的美欧关系基本定位，如果说 1993 年的美欧关系是明里交手、通过激烈争吵而找到妥协的话，那么，1994 年的美欧关系就是暗地较劲。在总的合作局面中蕴藏着新的矛盾。

1994 年 1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上任以来第一次访问欧洲，寻求修复他执政第一年中日益冷淡的美欧关系，正如前文介绍过的，他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发表的演说中重申欧洲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并促使北约首脑会议通过了美国提出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准备将中东欧的新兴民主国家和中立国家纳入北约的安全范围之内。在这一点上，美欧达成了共识，为新的一年双方关系的改善奠定了基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由于俄罗斯对西方政策日趋强硬，美欧在协调对俄政策中似乎找到了冷战后美欧关系的新支撑点，那就是，在支持俄罗斯面向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改革、照顾俄在欧洲的安全利益的同时，美欧仍应携手合作，共同防范俄罗斯帝国的重新崛起。1994 年 6 月，克林顿借参加诺曼底登陆 50 周年纪念活动之机，第二次访问欧洲，协调美欧经济政策及对波黑政策，再次强调欧洲对美国利益的重要性。

1994 年 7 月，克林顿在参加完在那布勒斯举行的第 20 届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之后，第三次访问了欧洲国家，只不过这次访问的是一个欧洲大国，访问中提出的新口号，揭示了未来美国对欧政策及美欧关系演变的方向。7 月 10 日，克林顿到达波恩，开始他对德国的首次访问。这次旅行表面看起来是

对3月份德国总理科尔华盛顿之行的礼节性回访，实际却是美国筹划对欧新政策的一次大动作。在波恩，克林顿提出，“德国今后将在世界政治中，同样也将在欧洲事务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德国不能逃避它应当承担的领导责任”，他要求德国与美国一道在国际政治中“共同承担”领导责任。这表明，美德关系已由过去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变成了共同发挥对世界领导作用的伙伴关系，德国已经被确定为美国在欧洲的“决定性盟国”。如果说欧洲是美国的战略重点，那么，德国现在就是重点的重点，今后美欧关系的日程可能将主要在美国和德国之间确定，战后维持了40多年的美英“特殊关系”将不再特殊，其特殊性将转移到美德关系上。美德“领导伙伴关系”构想的提出，加速了欧洲内部关系的分化和重组，是美国在冷战后参与欧洲事务、利用和控制欧洲的重大战略行动。

1994年12月，克林顿为参加欧安会首脑会议而第四次出访欧洲。在这次会议上，美在反对俄罗斯对北约扩大行使否决权的问题上，与欧洲盟国站在一边，显示了大西洋联盟安全利益的一致性。

通过对冷战结束后这几年美欧关系的回顾，我们对未来的美欧关系作以下展望：

1. 在美国为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而推行的“两洋战略”中，欧洲将继续是美国的战略重点。有利可图的美欧经济关系、利益共享的安全关系以及同种同源的文化共性，决定了美欧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将继续维持一种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的稳定性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联盟。美欧关系中的摩擦和冲突不会消失，有时可能还会变得很激烈，但将不会冲破美欧合作的基本框架。

2. 美国将继续通过主导北约组织，来维持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参与和领导，它主导这一组织的基础就是以10万驻欧美军为代表的军事存在。但在欧洲联盟共同防务政策取得进展的基础上，美将允许西欧盟国在欧洲外交与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3. 新时期美欧关系的基本定位，是在支持俄罗斯和东欧的民主和市场经济改革，防止俄罗斯帝国的重新崛起方面保持合作，因此，处理他们与俄罗斯的关系，将是未来美欧关系的最主要方面。

4. 美国对欧政策的重点及美欧关系的主轴是美德关系。美国将利用美德领导伙伴关系牵制德、法、英小三角，制约俄罗斯，扩大美国在欧洲的活动空间。

美国与日本：同床异梦

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主要的盟国，也是一个完全处在美国安全保护羽翼下的盟国。如果单纯从概念上看，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主从关系，在冷战时期，这恐怕也是美日关系的实际状况。冷战结束后，美日关系也出现一个在调整中重新定位的问题。这种重新定位对日本来说，表现为企图运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在日美双边关系中争得更大的政治独立性，在国际事务中争得更大的发言权，同时，在军事安全上不突破日美安全同盟的框架，继续享受美国的安全保护。对美国来说，重新定位美日关系带有非常矛盾和复杂的心情。苏联解体后，美国希望日本利用其经济优势，开始为其在安全领域 40 年的“免费乘车”付帐，其方式是通过向美国开放市场、平衡美日贸易。进行技术转让等，为美国经济的振兴和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通过更积极地介入国际事务而分担责任。在军事安全问题上，希望继续维持美日安全同盟体系，但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费用。美日关系就是在如此不同的战略考虑中进入冷战后时代的。

1. 冷战结束后，日美经济摩擦日趋激烈。从 70 年代初开始，美对日贸易出现逆差，但数额不大，1971 年的逆差额仅有 13 亿美元，尚不致影响美国对外贸易的总体平衡。70 年代末就突破了 100 亿美元，到 1983 年，又突破 200 亿大关，当年的逆差为 216 亿美元。整个 80 年代，逆差直线上升，进入 90 年代的第一年，1990 年的美对日逆差达到 411 亿美元之巨，此后，每年的逆差数字都在 400—500 亿美元之间，使日本成了美国贸易伙伴中最大的盈余国。在美国，对日贸易的巨额逆差不仅是美国平衡其对外贸易的一大障碍，而且严重冲击了美国工业的基础，汽车、电子、化工、通信等美国工业的支柱产业都受到影响。美国历届政府都向日本施加压力，企图达到使日本开放市场、改变美日贸易结构、平衡美国对外贸易的目的。布什政府时期两国于 1989 年 7 月 14 日开始进行“美日贸易结构障碍谈判”。在这一谈判中，美国方面向日本提出两大要求，一是短期性的，要求日本向美国产品和服务进一步开放市场，取消歧视性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二是长期性的，要求日本改变其总体经济结构，增加国内需求，促使其经济由出口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日本方面也要求美国对其总体经济政策作出改变，特别是应鼓励民众储蓄，实行谨慎的货币和预算政策，以求降低联邦预算赤字。1990 年 6 月，双方达成初步协议。日方承诺的具体义务是在 1991 至 2000 年的 10 年间，政府编列总值 2.9 万亿美元的预算，用于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内需和向国外的采购额，对美方提出的其他有关开放市场和改革贸易管理体制的要求，只承诺进行“可行性研究”。美方在 1990 年协议中只原则承诺削减预算赤字、通过抑制过度消费鼓励储蓄、放宽高技术出口管制等。为实现这些目标，两国在各自政府内成立了相应的贸易工作小组，负责定期磋商和解决争端，然而，由于该协议的内容涉及两国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及企业经营思想等等，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很大阻力，并未产生什么实质性效果。美对日逆差仍在不断上升。

1993 年克林顿政府上台后，根据公平贸易的原则，首先拿日本开刀，希望纠正长期不平衡的美日贸易。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与解决美欧贸易争端不同的是，克林顿特意先送了一根“胡萝卜”给日本。1993 年 1 月 25 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发表讲话，第一次明确表示同意日本进入联合国安理会

担任常任理事国。尽管这个声明的目的可能是想表明美国政府敦促德、日两国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的意图，但在日本，这被看成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姿态，这是它过去梦寐以求的承诺，今天，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仅五天就提供了这个承诺。日本政府为它所理解到的信息而感到振奋，并立即进行了回报。1993年4月15日—18日，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访问美国，在与克林顿的会谈中，就缓解日美贸易摩擦达成了一项意向性协议，为了实现平衡美日贸易的承诺，这一次，日本政府特意制定了一个“国际经济贡献新对策”，其中包括一个金额高达13.2万亿日元的综合经济景气对策和1000亿美元的资金回流计划。据说，这将对增加日本政府对美采购和平衡美日贸易产生很大的刺激作用。但克林顿仍要求日本在汽车、大型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农产品方面进一步向美国开放市场，并迫使日方同意在三个月之内就减少美对日贸易逆差问题开始进行谈判，因为1992年的美对日逆差已达540亿美元。

1993年5月，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鲁宾的主持下，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克林顿上台后新成立的机构，直属总统）的日本小组负责制定了一个“对日经济通商战略”，提出以日本开放市场和改变其经济结构为目标的“美日一揽子经济协商”建议。6月11日，第一轮美日经济协商谈判开始，并取得了一定成果，7月份，克林顿在赴日本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与日本首相宫泽签署了一个“美日贸易框架协议”。日本在协议中承诺，将采取多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以增加进口，减少外国的逆差，并同意在医疗、电信、汽车零配件等方面，扩大对美开放市场的份额。每年会晤两次，但不巧的是，1993年8月，战后日本政坛持续了38年的自民党一党政权宣告结束，诞生了以新党党首细川护熙为首相的八党联合政权。自民党，这个战后日美联合体制的始作俑者和坚定守卫者，从此沦为在野党。尽管细川首相的施政演说就日美关系传达了积极的信息，称日本政府将继续把日美安全同盟作为日本外交的基轴，将把减少贸易顺差作为本届政府的优先课题，努力发展内需主导型经济等等，但由于新的多党联合政府在执政过程中将受到更多的牵制，日美经济协商可能变得更加困难。

事实正是如此。日本新政府忙于国内政治斗争，在执行美日框架协议中拿不出实质性的措施。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坎特在9月份宣布，将从11月1日起对日实行贸易制裁。威胁的结果，双方第二轮协商于1993年10月26日达成协议，日本承诺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允许外国公司（当然主要是美国公司）获得参与日本国内市场竞争的平等机会。于是，11月的最后制裁期限被延长至1994年1月20日。

在1994年1月20日的最后期限到来前，日本外相羽田孜来到华盛顿，企图说服美国政府保持耐心，但效果甚微，因为，最新统计数字表明，1993年的逆差额又达502亿美元之巨。2月10日，细川首相亲自出马，急赴美国举行美日首脑会晤，试图在高层解决问题。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希望在同细川的首次正式会晤中拿出落实框架协议的具体措施。这一次，日本政府带去的是一个涉及14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是通过减少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的办法，刺激家庭消费，带动总需求和进口增长。但美国人不满意，认为这个计划力度不够，难以给日本经济带来大的变化，虽许诺要扩大从美国的进口，但没有具体的保障措施。最后，克林顿亮出了美国“对日经济通商战略”的底牌——“数值指标”，即日本市场对美国的开放必须具体到为每一个领域开出数值指标，比如，在日本的电信市场上，美国至少应该占到百分

之多少。美国方面首先要求日本政府接受这个原则，然后再由美国提出一个单子，双方逐个协商每一领域的具体指标。如此苛刻的条件，日本政府事前并未料到，闻之大惊，并立即予以拒绝，大声地向美国说了一声“不”，两国首脑级的贸易谈判不欢而散。正如日本人所说，任何有贸易常识的人都知道，“数值指标”实际上就是“管制贸易”，是不问产品竞争能力而只服从政治关系的不正当竞争，与自由贸易的精神相违背。一贯倡导“自由贸易”的美国政府，竟然能向日本提出如此要求，可见双方贸易争执之激烈。

1994年9月30日，美日达成了一个部分开放日本市场的协议。主要内容是：1. 扩大日本政府及政府控制的公司购买美国及其他国家医疗和电信设备的份额；2. 允许外国公司进入日本的保险业市场；3. 向外国开放日本的玻璃市场。这一协议的达成避免了美日间的一场近在眼前的贸易战，对缓解日美贸易摩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双方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领域——汽车及其零配件贸易上，分歧依然如故。据统计，美国对日贸易逆差的60%来自汽车及与之相关的行业，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减少对日逆差的目标难以实现。因此，尽管达成了一项协议，但美国仍根据1988年贸易法的“超级301条款”的规定，将日本列为“需要密切观察的国家”之列，这意味着美将在今后12到18个月之内（1996年4月1日前）对日本的汽车及其零配件行业进行调查，如果两国在此期间仍不能就此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将选择对日制裁。

冷战结束后，美日经济摩擦加剧，双方解决分歧变得日益困难，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提出的苛刻要求是一方面，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近年来，日本的对外贸易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的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正在降低，对亚洲市场的依赖正逐年加重，国际上有些人称这种变化为“脱美入亚”。日本对美国和亚洲近邻国家的贸易都是盈余的，但从1992年开始，对亚洲国家的盈余已非常接近对美国的盈余，到了1993年，对亚洲的盈余第一次超过了对美国的盈余，当年日对亚洲贸易顺差为536亿美元，对美顺差为502亿美元。并且，对亚洲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对美贸易，1994年，日对亚洲顺差达到617亿美元，比1993年增长了15.1%，同年对美顺差为550亿美元，比1993年增长9.6%。日本在亚洲出口市场的日益扩大，才使它有可能以亚洲市场为依托，去抗衡美国向它提出的苛刻的贸易要求。

2. 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美日关系正在逐渐疏远，冷战年代，岛国日本也算是美苏全球对抗美国的战略前沿，直接面对着苏联太平洋舰队和远东军区百万大军的压力，为此，美国在这个区区岛国驻军近7万人。苏联的解体消除了日本的一大威胁，尽管日俄之间的北方四岛领土争端仍悬而未决，但日本的安全环境已经是大大改善了。这一事态发展的意义在于，日本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正在降低，维系美日安全同盟的纽带有可能日益松散。对此，太平洋两岸都产生了危机感，互不信任的气氛已开始出现。最近两年，有迹象表明，在日本，有人开始谈论冷战结束后驻日美军的作用问题，提出了它将对付谁的问题。在美国，国会和民间的反日情绪日益上升，美国国会在1994年美日贸易争端异常激烈的9月份，曾起草一份有关90年代美日关系的研究报告，其结论是：“美日关系目前正处在战后以来最不稳定而又最紧迫的时期”。

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上，美国对日本究竟期望些什么呢？这可从克林顿政府1994年7月21日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有关日本的寥寥数语中窥

见一斑。在这份长达 2 万多字、有关今后美国安全的战略蓝图中，只有两处文字提到日本：其一是说：“我们正在同日本一起努力来执行 1993 年达成的框架协定，以确保美日关系中的经济方面也像我们的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一样能保持健康和充满活力。”其二是说：“我们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良好的双边关系以及美国继续承担在那里驻军的义务，将为美国在亚大地区发挥安全方面的作用奠定基础。目前，我们在这一关键地区驻军近 10 万人，除执行前沿布防的一般性任务外，他们有助于威慑朝鲜政权，使它不敢入侵和冒险。”很明显，除了要求日本在经济上向美国开放市场，平衡美日贸易外，美国指望当自己同朝鲜政权进行对抗时，日本能坚定地同它站在一起。

但过去两年的情况表明，在这两个方面，美日关系的情况都很不妙。经济方面的激烈争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矛盾似乎是无法调和的。这里，不应忽视一个正在出现的新的复杂因素，那就是，随着亚大经济合作组织日益走向机制化，出现了一个由谁定调、由谁主导的问题，有一个主导权之争。美国和日本是亚大地区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人们认为，这种争夺有可能在美日之间展开，美国自恃是该组织内最大的经济实体，其未来经济增长的希望也紧紧维系于这一地区，因此，有当头儿的强烈愿望和嗜好，但就其文化背景而言，它同该组织内大部分国家所拥有的佛教和儒教文化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它在积极参与和分享该地区经济蓬勃发展的机会和好处时，不断就民主和人权问题向该地区内的主要国家施加压力，这使它不可能对本地区国家具有文化上的吸引力。日本战后的经济飞速发展的确为亚洲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榜样，而且无可争议地在文化上属于亚洲传统的一部分，但它过去对大部分亚洲国家的野蛮侵略、战后以来对美国的过份依赖、近年来急不可待地争当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势头，也不大可能使人们相信它具有领导本地区走向新世纪的负责精神，但日本人清楚，它要走向世界，必然要依托亚洲，因此，日本政府近年来一再强调其对侵略战争的反省，从经济上加大了对亚洲国家的援助，在政治上注意与亚洲国家的协调一致，似乎执意要在亚大经合组织内起一种亚洲代表的作用，并希望被人们所接受。例如，当美国在乌拉圭回合协议达成后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新兴国家提出所谓“劳工权益”问题时，日本似乎更同情和支持亚洲国家。日本“脱美入亚”倾向的发展在美国被看成是与美国争夺影响的恶意步骤。现在的情况是，日本人警惕美国主宰 APEC，美国则警惕日本在 APEC 中拆他的台，这种相互警惕已经损害了双边关系中的信任气氛，使美日从政治上疏远起来。

1993 年，围绕朝鲜核问题，美国和韩国与朝鲜的对抗曾一度步入军事冲突的边缘。进入 1994 年，形势更加紧迫。3 月，由于朝鲜方面拒绝美国为美朝高级会谈设置先决条件（恢复南北会谈），美韩方面加大了对朝鲜的压力，不仅谋求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而且从美国将 36 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运抵韩国，威胁恢复美韩“协作精神”联合演习，摆出了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架势，朝鲜半岛局势曾一度剑拔弩张。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一个首要盟国，而且与朝鲜毗邻，朝鲜发展核能力同它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美国在谋求解决朝鲜核问题的过程中，日本完全可以起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美国也一直是这样指望的，仅就经济制裁朝鲜而言，日本握有一个重要的法码——据一项粗略的估计，目前生活在日本的近百万朝鲜侨民，每年通过侨汇方式向朝鲜注入的外汇达 6 亿美元之巨，这对外汇紧缺的

朝鲜来说是一笔重要的收入来源。西方一些分析家甚至声称，朝鲜发展核能力及维持一支庞大军队的开支严重依赖这笔钱，假如美国在谋求对朝鲜经济制裁时，能得到日本方面的配合，切断这一来源，朝鲜可能将不得不认真考虑作出妥协。另外，如果美朝高级会谈就解决朝鲜核问题达成协议——1994年10月已经达成，目前正在执行，日本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将乐于为此慷慨解囊。但情况表明，美国政府似乎对此不感兴趣——美国因双方在核问题上的争执而与朝鲜处于严重对抗之时，也正是它与日本就贸易问题谈判而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日本和朝鲜几乎是在同一段时间内、因不同的问题而受到美国的强大压力。显然，美国在向日本施加压力时，似乎并未顾及当它要求日本同它一起向朝鲜施加压力时，日本人会怎么想、怎么做。因此，不难理解的是，在1994年春天，当美国联合其在安理会内的西方盟国要求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当美韩两国积极备战向朝鲜施加军事压力时，它在亚洲的头号盟国日本，大部分时间都是站在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的中国、俄罗斯等国家一边的。

展望未来的美日关系，我们可以说：美日经济摩擦和争端不仅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而且还可能进一步激化，因为双方争执的问题涉及到各自不同的经济结构、不同的经济决策和管理模式及不同的文化背景等深层次的问题，双方在经济上的矛盾和分歧将影响到双边政治和安全关系，加之两国外部安全环境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巨大变化，政治和安全关系的逐渐疏远可能是一个趋势。另一方面，美国对日施压和日本对美政策的独立性都还是有限度的，双方的矛盾冲突尚不致突破美日安全同盟的基本框架。日本需要继续仰仗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在走向世界政治大国的过程中仍需美国的扶持，美在处理与亚大地区的经济和安全问题时仍需日本的配合和支持，共同的利害关系将继续把两国维系于现有的框架之内。但一个致力于领导世界的美国和一个努力争取成为世界一极的日本，即使共处一隅，也必将是有各打各的算，互有防范的，形象地说，这种关系如同床异梦。

美国与中国：难言的滋味

当今世界，也许没有哪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像中美关系这样，如此重要而又充满如此之多的矛盾和摩擦。20 多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曲折道路表明，它既是一个致力于调适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课题，又是一个在爱恨交织中亦喜亦悲的浪漫主义感情磨难，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这后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

70 年代初，两国的政治家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考虑，决定结束中美两国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对抗，通过相互的合作，为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而努力。1972 年 2 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中美两国发表了《上海公报》，确立了共同反霸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精神。这种政策在美国得到了两党一致的支持，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正式建交，实现了两国关系的全面正常化。80 年代的里根政府时期，两国关系虽然出现了许多摩擦，但在 1982 年 8 月两国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达成协议后，双边关系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那时，美国政府和公众舆论倾向于这样的认识，中国政府温和有礼、乐于合作，中国的改革开放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中国传统文化魅力无穷，中国人民勤劳善良、渴望过好日子，整个中国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美国面对的世界中，没有比中国更好的伙伴了。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美国宣布对中国进行政治和经济制裁，加紧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对华政策在致力于对中国施压和“和平演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美关系出现全面倒退。在美国国内，1989 年之后，持续了近 20 年的两党一致的对华政策基础消失，对华政策开始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两党斗争的一个焦点，政策制定过程日益偏离现实主义的考虑，越来越带有感情用事的色彩。在 1992 年的总统大选中，除了经济问题之外，对华政策可能是候选人之间辩论最激烈的问题，几乎展开了一场看谁对中国更强硬的竞赛，由此可见中美关系的悲剧色彩。美国的公众舆论也突然间一边倒，把中国说成是一个封闭的、落后的、没有民主、没有人权、难以捉摸的遥远的蛮荒之地。

遥远的中国对美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在 90 年代初似乎成了美国社会的一个难解之谜。

自 70 年代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都无一例外地强调这样一个观点：一个繁荣、稳定和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不仅有利于美中两国的长远利益，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但 20 多年来两国关系发展的事实表明，在美国政府言行之间存在着差别，甚至是根本的差别。例如，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表面上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将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但实际上它一直奉行的却是“双轨政策”，在武器扩散、人权、经贸关系等方面，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奉行双重标准。近两年来的情况表明，正是在如何对待中国的强大这个问题上，美国对华政策陷入了困境。正如一些战略家所分析的，中国必将成长为一个世界强国，这是历史的必然，面对这种前景，美国对华政策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支持和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将加速中国走向强国的进程，这等于是在为美国制造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它可能比日本更强大，但却不会像日本那么听话；任其自然发展，中国可能将用更长的时间，但它走向强大是必然的，难以阻止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美国漠然旁观，它将失去对强大的中国的

影响力；如果美国试图阻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能使中国为强国地位付出更长的时间和更高的代价，但美国仍然无法阻止中国走向强大，在此情况下，美国将由于其所作所为而把一个强大的中国变成真正的敌人。但另一方面，美国人似乎也承认，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国力的弱小和影响的式微同样是一个有碍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因素，总之，看起来美国人需要的是这样一个中国：强大到能够自卫但不足以扩张，无力对美国形成挑战，从而使美国能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将亚洲演变成它设计的世界“自由民主大家庭”的一部分，如果可能，中国赞成和支持美国的战略，成为美国的一个听话的小伙伴，那就更好。

事实证明，美国政府在经过权衡后，将对华政策的选择放在两个基点上，一个是利用，一个是限制——通过“全面接触”参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获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实惠；同时，着眼于“扩展”美国式的民主和人权，以此作为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手段，在中国的强国之路上设障，迟滞这一进程并使中国付出更高的代价。在这一过程中，尽可能避免与中国为敌，以确保未来对中国的影响力。

1993年初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制定对华政策的思路正是这样。

表面上，一切声明都是积极的。美国总统克林顿1993年5月28日在他关于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的声明中说：“我们同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我们准备同中国建立更加合作的关系，并希望同作为国际社会积极一员的中国通力协作。”1993年11月19日，克林顿在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会谈中说：“我坚信美中两个大国应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中国是一个伟大、重要的国家，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届政府将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美中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1994年5月31日，克林顿在宣布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地位并将其与中国的人权状况脱钩后，提笔为《洛杉矶时报》撰写了题为《孤立中国不可能改善人权状况》的文章，他说：中国是亚洲安全乃至全球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必须从比亚大地区范围更广的利益角度看待同中国的关系，美国将同中国增加接触、增加贸易、增加国际合作并增加在人权问题上的广泛和经常的对话。

一篇来自较低级官员的演讲使我们看到了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内在逻辑。1993年12月9日，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罗斯先生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对外政策演说，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美国政府的“中国观”——制定对华政策的依据。他说：“美国现政府对中美关系有五点认识：第一，中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而中国的重要性在过去几年受到忽视。第二，中国可以做美国的朋友，也可以做美国的对手。第三，中国的发展有若干难以看清的变量，第四，中国现在不是美国的敌人，应设法在国际问题上，使它成为美国的伙伴。第五，美国政府乐于看到一个强大、统一和繁荣的中国。基于上述认识，克林顿政府将对中国采取一种全新的接触战略，以全面加强与中国对话和交流，来改变美国政府近年在对华关系中所处的消极被动局面。”关于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景，这位官员说：“中美关系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到1989年之前的水平，美国不期望与中国在一夜之间解决所有的分歧，但美国必须与中国接触，只有接触，才能确保两国关系走上改善之途。”

美国政府奉行的上述对华政策，决定了中美关系既可能取得改善和发展，又充满诸多矛盾和摩擦。

近两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双方关系持续得到改善，但摩擦和争执始终存在，还不断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和冲突。

两国关系走出了 1989 年之后形成的不正常状态，进一步得到改善，并朝着积极的方向稳步发展，主要标志是：

1. 高层互访增多。自 1993 年以来，实现了两次首脑会晤。1993 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克林顿的邀请赴美国西雅图，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第一次非正式会晤，在那里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了会谈。1994 年 11 月，两国首脑于雅加达实现第二次会晤。在部长一级，1994 年，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财政部部长本特森、农业部部长埃斯皮、商务部部长布朗、国防部部长约翰·佩里、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拉森、前总统布什、前国务卿基辛格和万斯、前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高级官员相继访华。中国副总理李岚清、邹家华、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外经贸部部长吴仪等相继访问了美国。中美两国间频繁的高层互访，彻底打破了美国自 1989 年以来对我实行的制裁，为两国关系的持续改善注入了活力。

2. 经贸合作取得显著成果。据美国商务部部长布朗说，中国在 2000 年前将耗资 6000 亿美元用于公路、水坝、电力、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这将为美国提供巨大的商业机会，美国不会放弃这个巨大的市场。美国的大公司对这一前景更加感到振奋，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发言人迈尔斯曾说：从现在起到 2000 年，该公司能从中国的项目开发中赚到 30 亿美元，在这样的估计下，渴望赚钱的美国商人纷涌中国。1994 年 9 月，美国商务部部长布朗访问中国，同行的有 24 家美国大公司的负责人。访问期间，与中国签署了 15 项合同和意向书，总金额达 70 多亿美元。1995 年 2 月，美国能源部部长黑兹尔·奥利里率团访华，中美双方就中国的能源开发达成价值 65 亿美元的交易，涉及中国的约 50 个项目。在这些经贸访问的带动下，中美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1993 年中美贸易额为 277 亿美元，1994 年近 400 亿美元，一年间增长了近 50%。据美国的统计，1988 年时中国在美国的贸易伙伴排名中居第 12 位，1992 年上升至第 7 位，1994 年跃居第 5 位。截止 1994 年，美国仍是各国在华投资最多的国家（就地区而言，排在香港和台湾之后），投资项目约 1.5 万个，协议金额约 170 亿美元。美国 500 家大公司中，有 80 多家在华有投资项目，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公司更多。中美合资的北京切诺基吉普车公司、上海麦道公司成为中外合资的成功范例。1994 年 10 月 5 日，美国宣布不再禁止向中国出售卫星技术，显示了美国在高新技术转让方面对中国的限制也正在松动。

3. 两军交往得到恢复，军事关系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晴雨表。1989 年之前，中美两军关系涉及从高层互访、院校交流到军事技术转让、武器销售等各个方面，1989 年之后，两军中断交往 5 年之久。近两年，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恢复两军交往逐渐提上日程。1994 年 3 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华期间，中美决定成立一个军转民混合委员会，就军工企业转产民品问题探讨合作的渠道。1994 年初以来，美国国防大学校长塞尔姜中将、太平洋舰队司令拉森海军上将、美国空军参谋长麦克皮克上将等相继访华。8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将军访问美国，受到美方的热情接待。1994 年 10 月，美国国防部部长约翰·佩里率团访华，同中国军方领导人就加强两军交往举行了会谈，进一步推动了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两军交往的恢复对加深两国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将起重要作用。

由于美国顽固坚持干涉中国内政，中美两国间的矛盾和摩擦始终不断。

1. 台湾问题。美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和政策已经全部反映在中美两国 1972 年、1979 年和 1982 年的三个联合公报中了，那就是：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美国不予干涉，至于历史遗留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美国承诺不向台湾出售进攻性武器，防御性武器的出口将遵照逐年减少的原则，直到最后停止。如果美国政府信守诺言和义务，在中美之间就根本不会存在台湾问题，因为根据上述三个联合公报，这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但事实是，美国在这里奉行了两面派政策，说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在 1983 年至 1992 年的 10 年中，美国售台武器的确在逐年减少，但减少的幅度是“滴水式”的，看起来就如同儿戏。下面是笔者从不同渠道综合统计出来的这 10 年美售台武器的数字：1992 年 10 月，布什政府决定向台出售 150 架 F—16 战斗机，价值 60 多亿美元，几乎相当于 1983 年以来的 10 年间销售金额的总和，而且，作为美国空军的主力战机，F—16 战斗机是地地道道的进攻性武器。克林顿政府执政后，为挽救美国军火工业的困境，同时，借口中国扩充军力破坏了海峡两岸的军力平衡，开始近乎疯狂地向台湾出售各种先进武器系统：价值 7 亿美元的 4 架 E—2C 空中预警与指挥机；价值 5.7 亿美元的 200 枚“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价值 3 亿多美元的 160 辆 M60A3 型坦克；600 枚“毒刺”防空导弹；美还以租借方式向台提供了坦克登陆舰、导弹护卫舰等先进海军装备。尽管美国政府煞有介事地对售台武器作了官方销售和商业销售的区分，但事实上，在美国，对外军火销售是一项严格受政府控制的交易，每一笔买卖都需要经过政府严格审查和颁发许可证才能进行，因此，这种区分充其量只具有统计学方面的意义。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在美国政府的官方销售逐年下降的同时，确保对台湾的持续武装，并将销售额上升的责任归咎于民间——如果它想这么做的话。

1994 年 9 月，美国宣布调整对台政策：允许台湾将其驻美机构改为可以识别的“台湾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原为“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开放美台之间的部长级官员互访；允许台驻美官员前往美国政府机构与美国官员会晤。尽管美国声称继续遵守不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的政策，但这种改变已经突破了非官方关系的框架。美国国会和一些研究机构还嫌不够，继续鼓吹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邀请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等论调。

美国调整对台政策给中美关系的改善制造了新的麻烦。

2. 中美经贸摩擦日益激烈。首先是最惠国待遇问题。近几年来，中美两国围绕最惠国待遇问题的斗争每年都闹得沸沸扬扬，特别是在美国国会，该问题简直可以说是那些别有用心的议员老爷们向白宫发难的最方便的武器。中美两国自 1979 年建交后就一直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那时，尽管美国国会也是每年审议一次，但截止 1989 年，每年的延长基本上只是走一个法律程序，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1989 年两国关系出现倒退后，美国国会开始在此问题上大做文章，每年都提出有条件延长的议案，有些议员甚至提出过取消中国享受这一待遇的建议。尽管如此，布什当政时期，还是顶住了国会的压力，连续三年（1990、1991 和 1992 年）否决了国会提出的有条件延长的议案。1993 年克林顿政府上台后，抓住这一问题大做文章，多次表示要对之附加一定的条件，把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贸易待遇作为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

1993年5月28日，克林顿签署第12850号总统行政命令，宣布决定将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顺延一年，至1994年7月3日。同时还宣布，以后是否继续延长这一待遇，将主要视中国的人权状况而定。这是美国第一次为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附加先决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所谓的良好的“人权记录。”

美国政府将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挂钩的作法不仅受到中国政府的谴责，在美国国内也是不得人心的。自1994年年初以来，美国政界、商界对此进行了激烈辩论，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一项极不明智的作法，是在西方主要国家围绕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将贸易和投资机会拱手让给欧洲和日本，是自己拆自己的台。

1994年5月17日，美国国会106名议员联名致信克林顿总统，敦促他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5月18日，美国800家大企业的负责人联名致信总统，信中说，如果美国停止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将使美国消费者每年遭受10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企业界也将因此而失去12亿人口的中国大市场，他们坚决要求总统作出无条件延长的决定。

在强大的压力下，1994年5月2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他决定继续延长给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并停止将其与人权问题相联系的做法。

其次是知识产权问题。1994年12月30日，中美两国历时20个月的知识产权谈判宣告破裂。第二天，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米基·坎特即单方宣布：如果中国在1995年2月4日前不能满足美国提出的有关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的要求，美将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并同时公布了制裁将涉及的中国输美产品的清单，主要包括电子器材、箱包、玩具、鞋、发电机、自行车、手表等，总价值约28亿美元，制裁措施就是对这些商品的进口征收100%的关税。同一天，中国外经贸部发言人公布了一份中国对美的反报复清单，一旦美国对我实施上述贸易制裁措施，我国将采取的反报复措施是：第一，对进口产于美国的各种游戏机、游戏卡、录音带、激光唱盘、香烟、酒和化妆品加征100%的关税；第二，暂停进口产于美国的电影片、电视片及其相应的录相带和激光视盘；第三，暂停与美国音像制品协会、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商业软件联盟的贸易合作关系；第四，暂停受理美国音像制品制造公司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的申请；第五，暂停受理对美国化学和药品制造商根据我国《化学、药品行政保护条例》所提出的申请；第六，暂停与美国公司正在进行的大型汽车合资项目的谈判；第七，暂停受理美国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在华设立投资公司的申请。

据中国外经贸部提供的材料说，美国政府在两国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谈判中，顽固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向中方提出了许多无法容忍的无理要求。例如：对中国的立法和司法横加干涉，要求中国限期修改《民事诉讼法》，缩短一审时间，降低诉讼费用，要求中国法院在审理有关知识产权的案件中要按美国的法律作出司法解释；限期中国于1996年1月1日之前修改知识产权法律，比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提前4年达到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要求，甚至要求中国政府将查抄侵权产品的情况定期向美国政府报告，直到美国政府满意为止。

1995年1月，两国政府经过接触恢复了谈判。但由于美国继续坚持其无理要求，谈判于1995年1月28日再次宣告破裂。2月4日，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坎特宣布，由于中国不能实施对美国公司知识产权的保护，美国将对价

值 10.8 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 100% 的关税。制裁生效的日期被定在 2 月 26 日。几天后，双方宣布，谈判将于 2 月 13 日在北京恢复。双方最终在 2 月 26 日最后日期到来前 1 个小时达成协议，避免了两国之间的一场贸易战。

1995 年 2 月中旬，正当中美两国因知识产权纠纷而进行激烈交锋之时，英国的 BBC 广播提供了一条非常有趣的“新闻”——只有美国人清楚这并非新闻。报道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披露了美国商业软件联盟（该组织是要求美国政府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持强硬态度的最有势力的院外活动集团，也是中国政府 1994 年 12 月 31 日公布的反报复清单中点名制裁的 3 家美国公司之一——作者注。）的一份内部调查报告的内容。报告提供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并不是使美国软件行业蒙受损失最大的盗版软件销售国，日本、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的盗版（美国）软件销售额远远高出中国，然而，这些国家的盗版商人照样大赚其钱而平安无事，而在同一问题上，美国与中国却闹到爆发大规模贸易战的边缘。美国政府多次向世界舆论表白说：中美知识产权纠纷是一个纯粹商业问题，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但上述材料恰恰说明，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问题，美国政府的辩解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归根结底，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某些利欲熏心的中国商人盗用多少美国的软件和唱片，而在于美国政府从根本上不喜欢中国的制度。

3. 两国围绕“人权”问题的争吵日益激烈。1989 年之后，随着一大批中国的动乱分子逃往美国，美国政府更加集中地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致于在一段时间内，“人权”几乎成了中美关系的全部问题。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克林顿上台后第一个有关对华政策的重大决定——1993 年 5 月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总统行政命令，就与“人权”问题挂了钩，这项命令附加的“人权”条件共有 7 项。其中 2 项“强制性”条件是：允许其国民有移居国外的自由；遵守 1992 年美中两国就监狱劳动问题达成的双边协议。5 项作为重大参考的条件是：开始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公布人们能接受的有关中国政治犯和宗教犯人的情况；给予囚犯以人道主义待遇和允许家人探监；保护西藏富有特色的传统和文化；允许国际电台和电视台向中国播放节目。在 1994 年克林顿决定“脱钩”的行政命令中，再次提出了就“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新战略”，其主要内容是：邀请在华从事商务活动的美国大公司代表，同政府一道制定和宣布一套指导企业在华活动的准则，以促进中国的人权；增加对中国的国际广播，除了扩大“美国之音”的节目覆盖面，还将增设“自由亚洲”电台；扩大多边议程，将中国的人权问题列入国际论坛的议程，进行联合施压；支持中国的非官方组织促进人权的各种活动。

另外，近年来美国还多次接待从事分裂中国活动的流亡的达赖喇嘛，支持中国境内外的西藏分裂分子，美其名曰“保护西藏的文化”，促进那里的人权。在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也得到美国政府各种形式的资助，从事反对中国合法政府的活动。

4. 美国散布“中国威胁论”，给中美关系的改善制造了新的麻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国际地位的稳步提高，使国际上一些不那么喜欢中国的人深感苦恼，尽管中国的历史充满外国殖民主义入侵的悲剧，尽管中国政府始终致力于宣扬和实践和平，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和正在作出巨大的贡献，但美国一些人从他们的偏见出发，恶意宣扬所谓中国

的威胁，到处散布中国一旦强大势将向外扩张的谎言，说中国扩军备战，是亚太安全的一大威胁，中国不遵守核不扩散条约和导弹技术控制制度（MTCR），破坏地区稳定，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不应再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等等。

1993年，美国报纸大肆宣扬中国从俄罗斯购买 Su—27 战斗机和新型防空导弹，目的是将来在南中国海动武时夺取空中优势。

在 1994 年 11 月 21 日一期的美国《新闻周刊》上，我们看到对哈佛大学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的一篇采访，这位善于观察国际冲突问题的教授鼓吹说，中国未来必将在世界上显示其力量从而引起国际体系的不稳定，这是一个历史规律。“历史表明，当一个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时候，它们往往变得极其过分自信。在我看来，中国很可能要显示其力量。中国曾经是东亚居支配地位的大国，时间长达 2000 年之久。但是，自从 1850 年以来，它一直从属于西方和日本，中国人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因此，他们当然希望恢复他们所认为的他们在世界上理所当然的地位。这将引起不稳定的后果。”他认为，无论中国将来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但“中国喜欢显示其力量的倾向肯定将占首位”。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寻求民族主体意识成为一种时代潮流，而对中国来说，这种努力的结果将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这将使上面提到的不稳定倾向变得更加明显”。这位美国的大教授要告诉人们的就是：中国人由于过去被人欺负惯了，因此它强大之后，必然要通过压制别的国家来寻求一种民族心理的平衡，或者说，进行民族报复，而这报复的理由，源于近百年被欺侮的历史。

1993 年 5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先后发表了用“购买力平价法”（PPP）对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重新估算结果，将中国列为仅次于美国（1992 年 GNP5.6 万亿美元）和日本（1992 年 GNP2.37 万亿美元）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1992 年 GNP1.66 万亿美元）。国际金融组织这一计算法的源头是美国。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曼教授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罗伯特·萨默斯教授早就这么算过，也是这两位教授，在中国被列为第三经济大国后，道破了这样计算的目的。克鲁曼说，新计算方法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地缘政治方面，它可能对以人均 GNP 为主要判定标准的国际援助计划产生深远影响。萨默斯教授说，改变计算方法是重大胜利，有助于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事实上 1995 年初以来，美国已通过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世界银行同意今后不再向中国发放低息贷款。

5. 美国极力阻挠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盖特”（GATT），是 1947 年 10 月 30 日由当时的 23 个国家在日内瓦签订的一项多边条约，目的是调整各自在国际贸易方面的相互关系。后来，加入的国家不断增多，至 1994 年，已有 115 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该协定缔约国。据统计，目前世界贸易额的约 90% 是在 GATT 缔约国间进行的，缔约国在相互贸易中给予关税互惠的幅度，发达国家大致在 3—5% 之间，发展中国家在 10—15%。可以说，GATT（及即将取代它的“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今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中国是 GATT 的 23 个创始会员国之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缔约国地位被剥夺近 40 多年。1986 年 7 月，中国政府向当时的 GATT 总干事邓克尔递交了恢复中国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因为，复关是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推动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开拓海外市场

场的最佳途径，也是我国抗衡西方国家利用其国内立法对我实行歧视性贸易政策的有力工具。从中美关系来说，复关带来的直接好处是：美国将不得不废除它每年一次审议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的作法，只有按照 GATT 的有关规定，无条件和永久性地给予我国这种待遇，这同时意味着，美国将因中国复关而失去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施压的一个重要法码。因此，不难理解的是，自中国提出复关申请的 8 年来，美国要处处设障，极力阻挠这一进程，在两国关系中制造又一个争执“热点”。

1986 年至 1989 年，中国复关问题谈判取得一定进展。1989 年之后，美国对华实行全面经济制裁，单方面终止了就这一问题同中国进行的双边磋商。

1993 年克林顿政府上台后不久，派出贸易谈判副代表德沃金斯率领的 GATT 事务磋商团访华，同以外经贸部副部长佟志广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就中国复关问题举行会谈，这是 4 年来中美两国就这一问题进行的第一次接触，也是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个高级代表团。至 1994 年 11 月，中美就这一问题共进行了十一轮双边磋商，尽管那时距 1995 年 1 月“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仅剩 2 个月时间，尽管在此之前的 1994 年 9 月西方国家中的欧洲联盟、加拿大及亚洲的日本，已明确承诺支持中国在 1994 年年底复关，但中美之间的谈判仍未达成一致。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政府为了通过中国复关获取最大的商业利益、使美国公司能够长驱直入占领中国的巨大市场，它在谈判中提出了难以为中国政府接受的无理要求。美国的所谓最后要求是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中国不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入关后遵守的一切义务必须比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来执行，例如，复关后必须立即取消全部的非关税措施，如进口审查、许可证、配额审批之类；第二，贸易透明度，要求中国公布所有的进出口商品配额；第三，贸易体制问题，要求中国放弃贸易公司的中介作用，实行汇率自由浮动等等；第四，国民待遇问题，即一旦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即与中国产品享有同样待遇；第五，市场准入，要求中国完全开放银行、保险、航空、农产品等第三产业，要求中国立即取消对外资企业国产化率的要求（乌拉圭回合协议就此问题规定了“过渡期”，发达国家的过渡期还是两年呢！）。由于美国的蓄意阻挠，中国没能于 1995 年 1 月 1 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前实现复关。

6. 武器扩散问题。美国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扩散作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部分。在这方面，它借口《导弹技术控制制度》（MTCR）的规定，向中国施加压力。MTCR 是由美国倡导，美、英、法、日、联邦德国、意大利、加拿大七国于 1987 年 4 月达成的一项多边协议，提供了控制导弹及其技术出口的相应参数（基本要求是：不出口射程超过 300 公里、有效载荷超过 500 公斤的导弹和无人驾驶飞行器）。但作为一份非正式文件，它并不代表参加者负有遵守其规定参数的强制性义务，成员国只是按照本国立法程序参照执行而已。1991 年 11 月美国国务卿小詹姆斯·贝克访华期间，中国政府承诺遵守 MTCR 的有关参数，但美国政府并不满足于这一点，寻机对中国进行刁难，1993 年 8 月初，美国制造“银河号”事件。8 月 25 日，美国在“银河号”事件尚无结果的时候，就匆匆忙忙地借口所谓中国向南亚某国出口 M—11 导弹，宣布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在此后两年内，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电子设备。太空系统技术及军用飞机技术，此举涉及美国每年对中国的 4—5 亿美元出口额，约占美对华出口的 10%。

过去两年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些特征，实际上已向我们昭示了未来两国关系演变的基本趋势。在世界战略格局多极化加速发展、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中美关系的状况，将继续是影响世界格局变动的重要因素，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可以预见的是以下几个趋势：1. 国家利益的相互需要决定了中美将继续保持密切的接触，并在加强接触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总体上积极的合作关系，这种相互需要既有安全上的，又有经济上的，而随着整个国际形势继续趋向缓和及亚太安全形势将出现的积极变化，安全考虑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将可能逐步降低，中美双边关系的状况，将越来越取决于各自在经济方面所寄予对方的期望能实现到何种程度。如果说 20 年前中美接近是建立在反对什么的基础上、近 5 年来中美是在矛盾和争吵中探索双方关系的新基础的话，那么，未来的中美关系将建立在这样一个肯定性的基础上：谋求经济增长和国家实力地位的改善。

2. 意识形态的相互冲突决定了中美关系将继续是充满矛盾、摩擦、有时甚至是剧烈的政治冲突。双边关系由经济主导，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冲突会淡化，就中美双方而言，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完全不同。中国早已摆脱以意识形态主导对外政策的时代，但当前和今后的美国却是在对外政策中最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国家，向全世界扩展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人权观念被确立为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这决定了中美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冲突不仅不会减少，而且还有可能激化。在这方面，双方不存在求同存异的可能，因为，无论哪一方在更深入地了解对方的制度后，都难以产生“求同”的愿望。

3. 未来中美关系的摩擦仍将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台湾问题，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中国国家统一问题变得日益紧迫，美国对这一问题的介入也将更加积极，两国在此问题上的斗争将比以前更加激烈。二是人权问题，它将继续是中美争执的“热点”，正如前文所述，由于这是一个涉及双方完全不同的国家制度的问题，因此，如果说其他方面的摩擦具有周期性的话，那么，在这方面的冲突将可能是长期的和不间断的，三是在经济贸易方面，双方围绕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和贸易平衡问题的摩擦将交替出现，其中最经常的摩擦将集中在市场准入问题上，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将直接影响中国与世界经济组织的关系。四是军事安全方面，摩擦将主要围绕武器扩散、军事透明度、核试验与核不扩散、地区安全机制、台海局势。南沙争端等问题展开。

4. 无论双方的合作。矛盾和摩擦将如何发展，下述两个因素的作用将可能使未来的中美关系越来越趋向真正的平等互利。这两个因素是：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突出地位和影响将逐步降低；今后 10 年将是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迅速增长的时期。

21 世纪：顶峰不再

创作这本书，对于笔者来说，是一件如履薄冰的事情，因为，得出的结论是针对一个遥远的未来。人是如此渺小和有限，而未来寄藏于宇宙的无限和广衰之中。人类的困境在于：未来包含着无数的可能性，然而，当它一天一天走近我们时，每一步实现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这种无数归于唯一的过程，循环往复，永无尽头，每一天都有人预测未来，每一天的现实也都在嘲弄前一天的预言家。因此，在提供对未来的某种描述时，一个人一生如果能看到他所预测的哪怕是一种可能性变为现实，也应该知足。正是这种侥幸使笔者敢于贸然在这里写下关于美国未来的一些文字。

当前，世界战略格局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一个以美、俄、中、日、德五大力量为基本框架的多极世界正在形成。美国处于这个框架之中，它将使这个框架变得更加平衡还是日益倾斜？它将独领风骚还是与其他力量平分秋色？这就是笔者在下面试图回答的问题。

被紧紧追赶的巨人

美国未来学家马丁·塞特龙坚信，美国在未来的岁月里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复兴”，在他看来，“美国的经济繁荣——富裕、低利率、低通货膨胀率——将会持续到可预见的将来。从现在起到2000年，美国经济应会是世界上最好的”。

从本书第二章的论述中读者也可以看到，由于技术进步、企业创新、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等因素，美国经济在世纪之交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是有可能的。然而，这只是一个孤立的看法。如果从全球力量对比的角度看，美国在经济上就是一个被紧紧追赶的巨人，它同紧随其后的那些国家之间的距离将日益缩小。

1994年，美国的GNP初步估算为6.7万亿美元；日本由于日元升值的关系，名义GNP升至约4万亿美元；德国大体是2万亿美元；中国的GNP按人民币计算1993年为3.138万亿元，如果按汇率换算，只合4000多亿美元，但被西方用购买力平价法算为2.6万亿美元，1994年GNP的人民币值为4.38万亿元；俄罗斯的情况难以精确估计。因此，1994年五大国的经济实力对比被某些西方人士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大致为：6(美) 4(日) 2.5(中) 2(德) 1(俄)。

俄罗斯在今后10到20年，由于难以实现政治和社会的真正稳定，经济转轨的进程也将是艰难的，看不到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景，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委员会提供的材料：1993年俄国内生产总值为162.3万亿卢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2年下降了12%，而1992年则比1991年下降20%。按1美元兑1000卢布的汇价，俄1993年的GDP只合1600多亿美元，只及美国的三十分之一。1994年，美国经济增长4%，俄罗斯经济在1993年的基础上又至少下降了15%，而且卢布汇价曾一度跌至1美元兑4000卢布，因此，1994年的俄罗斯GDP估计还不及美国的三十分之一。各种研究表明，俄罗斯经济至少在未来10年不会有大的改观。即使以一项乐观的估计，未来10年按年均4%的增长率推算，那它在经济上同美国的差距也可能不是缩小而是扩大的问题。

但其他几个国家的情况就不同。日本经济面临的问题要稍少一些，它在技术、资金、人才、管理经验等方面，存在着与美国一较高下的优越条件，但在对未来经济具有决定意义的市场竞争方面，由于它较早地经营亚洲和中东等地拥有巨大潜力的市场，未来10到20年，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如果不能说比美国大，至少同美国一样。当前日本经济规模相当于美国的二分之一多。据一项权威的预测估计，如果未来20年美、日两国的经济增长率在3%上下浮动的话，到2020年，美国的GNP可能接近12万亿美元，日本接近8万亿美元，日本将追赶至美国的三分之二。在同一个预测里，德国目前只及美国的三分之一，但估计未来10到20年其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潜力将得到充分挖掘，其年均经济增长率可能将略高于美国，2020年，德国的GNP可能为5万亿美元左右，接近于美国的二分之一。中国的情况较为复杂，如果在未来10年的某个时候，人民币在自由汇率的基础上成为可兑换货币，中国的GNP数字以更接近真实（一般可兑换货币间的汇率能较真切地表明它们之间的购买力差别）的汇率反映出来，那么，对中国经济规模的评价将较少争议、更符合实际，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现在国际上是一种极端的看法。俄罗斯

一位政论家在 1994 年 4 月就认为，中国向新的经济大国转变是客观现实，全世界都日益明显地感到了中国这个经济超级大国的诞生，她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超级大国，未来世界事务，特别是亚太事务将要靠美—中—日这个三角来决定。美国一位经济学家则认为，现在世界上关于中国将能很快赶上美国的说法是一个神话，他根据自己的计算认为，中国经济如果以年均 10% 的速度增长，赶上美国需要 30 年，如果以年均 8% 的速度增长，赶上美国需要 43 年，如果以年均 5% 的速度，赶上美国需要 60 年以上的时间，还很有可能在整个 21 世纪都实现不了，因为据说他的计算是以不发生战争和重大社会动乱为前提的。但无论如何，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势头及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而论，未来 10 到 20 年，仍将是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中国将因此而缩小它同美国的经济差距。

笔者的结论是，美国在未来 10 到 20 年仍将是世界上无可匹敌的第一经济大国，但这个经济巨人与五大力量中多数国家的经济差距将日益缩小，单从经济上看，由五大力量组成的多极框架将变得日趋平衡。

没有对手的士兵

正如本书第四章所认为的那样，由于拥有独一无二的技术优势、未雨绸缪的各种战争准备计划、全方位的强化训练、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网和各种形式的军事联盟，美国军事力量的未来面貌仍然是可信的和强大的。

在五大力量中，德国和日本在资金、科技和工业技术方面的优势，蕴藏着成为世界性军事强国的巨大潜力，但鉴于它们与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同盟关系，将这两国的军事潜力与美国相比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之间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出有交战的理由。因此，这里只打算分析俄罗斯与中国的情况。

冷战年代，苏联在军事上与美国比肩而立，是美国需要全力对付的超级大国。美苏军备竞赛曾在 70 年代末达到势均力敌的程度，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够在军事上与美国一较高下的国家。但苏联解体后，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前苏联红军被各共和国瓜分，幸存下来的俄罗斯军队，情况也非常不妙。首先，就军队员额而言，俄已越来越无力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1992 年 5 月 7 日俄军正式组建时，拥有近 280 万人。两年多来，主要由于经费短缺，进行了大量的裁减。据 1994 年 8 月 12 日俄罗斯国防部部长格拉乔夫大将在俄军成立两周年紀念会上提供的材料，过去两年俄罗斯已裁军 60 万，只剩下 220 万人，每一年俄政府在制定预算时，总要以经费的缺口而不是以武装力量的实际需要为标准，提出该年度军队削减的规模。按照 1994 年俄联邦预算法的规定，1995 年 1 月 1 日，俄联邦武装力量的定员人数应为 190 万人。1994 年 10 月，鉴于国家日益困难的财政状况，政府不断向军队施加压力，要求它进行更大幅度的减员。10 月 25 日，俄国防部部长格拉乔夫宣布，在 1995 年 1 月削减至 191 万人之后，俄军将继续加快削减步伐，争取在 1995 年底裁至 170 万人。但这还不是最后的定员，据说俄总统叶利钦要求参照国际上的通用标准，将俄军最终裁至 150 万人，占总人口的 1%，在俄军削减的过程中，由于军队声誉不高、住房和薪金等方面的待遇过低，军官的流失更为严重。1992 年，俄军原计划削减军官 3.6 万人，结果最后实际离开军队的军官达 5.9 万多人，1993 年计划削减 1.9 万多人，最后实际减少 6.9 万多人，1994 年计划削减 1.5 万多人，最后实际减少 2.6 万多人。流失的大多数是基层青年军官，据俄罗斯国防部人事局的一份材料说，单是 1992 到 1993 年，就有 6.85 万名年龄在 30 岁以下的军官离开军队，造成今天俄罗斯军队中陆、海军缺少近 10 万名军官。另外，俄军士兵的来源也日益枯竭。由于军队声誉、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的空前低下，它对俄罗斯青年已完全失去了吸引力。早在苏联时代，军队每年都难以征到足够数量的士兵，在目前的俄罗斯，每 10 个潜在兵员中只有 2—3 人应征入伍，1994 年秋天俄军只完成计划征兵数的 9%。其次，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议会和公众舆论要求削减军费开支的呼声强烈，俄军每年得到的钱已难以维持最低战备战态和最低生活标准，军队素质和战斗力的下降甚至比减员来得更迅速。1994 年度，俄罗斯军费开支为 40.6 万亿卢布，只折合 65 亿美元。（同年，美国军费开支为 2709 亿美元、英国 420 亿美元、法国 447 亿美元、日本和德国都在 300 亿美元左右。）据俄罗斯《红星报》的文章说，这笔钱连军队最基本的维持费都不够，而且还只停留在纸上，到 1994 年 10 月底本财年结束时为止，俄联邦财政部实际只拨给军队约 18 万亿卢布，谁也不知道托欠的 22 万多亿卢布是否还能得到、何时得到。俄军到处借钱度日，许多军官和士兵几个月都领不到一个

卢布。1994年10月，在俄政府提出的1995财年预算中，军费拨款为44万亿卢布（不知按什么汇价，它被折合成146亿美元）。这个预算一出，就引起俄军的一片谴责声，国防部部长格拉乔夫认为它“完全不能满足需要”。经费短缺已给俄军建设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俄军事科研部门已陷于瘫痪状态，几年未得到研究拨款，难以开展最基本的研制开发活动，俄军与西方的军事技术差距在拉大。由于无钱采购新的武器装备和对现有装备进行必要的维修保养，使俄军装备老化，战斗力下降。俄罗斯仍是一个核大国，但据说由于缺乏维修保养，俄战略核武库中一半以上的洲际导弹丧失了战斗力，它们大都已服役25到30年。俄国防部军费预算与财政局局长比约夫上将称，到2006年，俄军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将只占装备总数的5%，俄军的战斗力将因此而大受影响。俄军训练更难以保障，1994年俄国防部只得到维持正常军事活动59%的燃料，空军的燃料还不足其规定标准的50%，只好将正常飞行次数减少了44%。俄海军舰艇的维修保障率只达到36%，140艘核潜艇中有80艘常年不能出海参加训练和战备值班。俄陆军1994年全年都未组织过一次师规模的演习。俄军第14集团军司令列别德将军绝望地说：“俄罗斯已不再有一支军队，而只有一些由军事人员组成的编队，这种编队什么事都干不成。”俄军1994年底在车臣战争中的表现，已对它的战斗力作了最好的说明。显然，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俄罗斯军队已无力向美国军队挑战。（只是同美国相较而言，脱开这个参照，不能否认，俄罗斯仍然是一个世界性军事大国。）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笔者不打算在这里对中国军事力量作更多的讨论，这里只说军费。从政府公布的国家预算来看，近几年中国军费一直徘徊在60亿到70亿美元之间。1992年，中国的军费折合成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1/40、日本的1/5、德国的1/4，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的人数为美国的1.5倍、日本的15倍、德国的7倍多。这样，从人均军费负担和军人人均军费两个指标来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更大。1994年，中国的人均军费负担只有43元人民币（相当于5美元），同年，美国为1000美元，日本360美元，英、法大致是600美元，德国（1993年）接近400美元。1994年中国的军人人均军费只及美国的1/70、日本的1/55和德国的1/35。从这些简单的数字不难看出，中国军队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还很漫长。而对于美国军队，正如笔者在前文所述，在经历了海湾战争之后，美军不断增加各项军事费用，加紧开发高技术军事装备，大力调整美国全球军事战略，已向实现军队未来化的目标进发。

因此，可以说，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从现在到2020年），美国军事力量仍是无可匹敌的，它独在高位，没有对手。

患分裂症的巨人

在现代关于综合国力的各种研究中，专家和政府官员们一致认为，综合国力中最重要的软性指标是国家凝聚力，它是国家强盛的法宝，拥有了这个法宝，一个弱国终将走向强大，而一旦丧失了它，再强盛的国家也会走向衰败。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悲剧，就是对国家凝聚力作用的最好注解。

尽管美国的政治家们时刻不忘鼓吹他们的制度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和凝聚力，但现实是，美国在这方面的情况是十分不妙的。在走向新世纪之际，美国面临着如何找回其国家凝聚力的严峻课题。

美国总统克林顿比别人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在 1995 年 1 月 24 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惊呼：“我国公民的生活正在遭受损害。他们现在彼此合作少了，相互指责却多了，从一开始就是我国巨大力量源泉的维系社会的纽带已严重磨损……受到威胁的远不只是我们的物质财富，而且还有更宝贵得多的东西——我们的儿童、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价值观。”

1994 年 11 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有人评论说，美国社会正处在一次严重的“政治—文化分裂”之中，自由主义在挣扎，保守主义在复兴。聚集在大都市的贫穷的黑人和拉美裔移民渴望新自由主义，而聚集在中西部的富有的新兴贵族正在为保守主义大唱赞歌，他们都声称代表美国社会的主流而将对方视为异端，相互的容忍正在下降。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斗争中，人们似乎都已不在乎曾经将多样化的美国社会凝聚在一起的“美利坚主义”了。

民主制度的基本方式是投票选举，然而，美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对投票失去了兴趣，自动放弃了他们的“民主权利”。华盛顿和各州府的政治家们都是不被信任的人。

近年来，美国人在谈论生活质量时，安全问题像工资收入一样，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美国人越来越感到不安全了。美国是世界上犯罪率和监禁率最高的国家。强奸、杀人、吸毒贩毒、街头枪战不仅是美国独特的社会景观，而且成了美国影视文化的主题。80% 的美国人一生中至少有一次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多达 40% 的美国妇女有过遭受性暴力和性骚扰的痛苦经历。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弊端削弱了美国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据说有 7000 万人一生中有过吸毒的经验，占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吸毒不仅严重浪费了物质财富，而且为美国创造了一个令人难堪的世界第一：“爱滋病”患者最多的国家。

家庭价值观面临严重挑战。美国是世界上离婚人数最多和非婚生子女最多的国家。美国一半以上的单身女子失去了结婚和承担家庭义务的愿望。在美国人的头脑中，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都是过于模糊的概念，只有自己是清晰和重要的。

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也可能是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目前美国的贫富差距是自 1947 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开始记录不同人群生活水平以来的 40 年间最大的。美国一位专家忧虑地说：惊人的两极分化正在使美国社会陷于严重的阶级对立，这可能使近百年来致力于建立中产阶级社会的美国进入挫折期。

种族歧视、种族暴力与排外情绪也使这个国家出现日益涣散的趋势。1992 年的洛杉矶种族骚乱似乎是某种不祥的预兆，一位美国社会问题学者预言，

90年代可能成为美国种族暴力的新时代。近年来的经济衰退已引起针对外来移民的暴力浪潮，移民的悲剧将在美国上演：成功的移民既受本土富人的排挤又受本土穷人的怨恨和袭击，失败的移民可能结成犯罪团伙，开始对美国社会进行报复。

教育质量的下降正在损害美国社会的发展潜力。自1983年美国教育学家联名发表《国家面临危机》报告以来的10年间，情况并没有改变多少。1994年8月美国教育部发表的调查报告表明，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的下降趋势仍在继续。报告痛心承认，在美国教育史上，国家将第一次面对现在这一代人比他们的父辈学识更浅的窘境。

信仰危机在社会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人们不信任政府，不信任他们的邻居，甚至也不信任自己。各种邪教势力乘机泛滥，1978年11月“人民圣殿教”近千人在圭亚那热带丛林中的集体自杀，和1993年4月“大卫教派”在得克萨斯州韦科镇的残酷自焚，都是举世震惊的丑闻。更可怕的是，在目前的美国，像这样的邪教组织就有600多个。

种种迹象表明，在迈向新世纪之际，美国社会的种族和文化冲突、穷人和富人的矛盾、当地社会与外来移民的积怨。暴力犯罪的猖獗、家庭价值观的崩溃、政治文化的分裂等等，正在形成一种恶性病毒，日甚一日地腐蚀着美国社会的机体，使它变得日益涣散，脆弱和冷漠。国家凝聚力问题即使是一个被意识到了的危机，恐怕也是一个短期内难以摆脱的危机。

学会做平等一员

尽管美国拥有无可匹敌的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但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一个国家，无论有多么强大，都难以改变或阻遏历史发展的潮流。它只有明智地顺应世界变化的潮流，才可能正确运用和保住自己的强盛。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变化的潮流又是什么？

首先，国家的命运可能将更多地取决于经济实力而非军事机器。在这方面，美国仍然拥有别人没有的优势，但世界变化的速度之快，已使任何优势具有了暂时性。美国左右世界经济的能力与 20 年前不可同日同语，同样，世界其他地区迅猛的经济增长，将使美国在 20 年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更难于同今天相比，现在美国习惯于在七国集团内部讨论治理世界经济问题的方案，20 年后它必须取得更多国家的支持与合作才能这么做。

这将是一个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一个强大的国家只存在于同别国的友好相处之中，损害别国最终将是损害自己。发展和繁荣的强烈愿望将使世界更倾向于和平相处，一个军事巨人在面对世界时，其展示能力的企图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

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正在发展。在一个盛行以多边协商和合作处理共同事务的世界上，强国可能成为发起者，但越来越难以成为主宰者。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日益成熟，将国家独立的概念扩展为地区自主，给国际政治设立了新的限度，一个国家的到处存在将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例如，在亚太地区，美国主宰 APEC 的企图已经受到抵制，它主宰地区安全合作的愿望正在被警惕和防范。在欧洲，欧洲联盟希望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希望加强欧洲人占多数的欧安会。

随着国力的增强，国家主权和平等的意识将更加强烈而不是被削弱，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平等对待。美国现在不能控制德国和日本，将来也难以指望他们在联合国安理会内对美国言听计从。俄罗斯即使难以在经济上强大起来，它拥有核武器这一事实本身，也将迫使世界认真考虑它的要求。

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美国人只有学会平等相处才能避免冲突，只有远离冲突才能实现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尽管美国一再强调它要发挥对世界的“领导作用”，但事实上，在这个难以建立领导和权威的世界上，美国如果不想使其利益受损，就必须逐渐学会做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

多极世界中的“第一极”

关于美国在未来世界的地位，世界上有看法的人很多。

1993年，美国的哈伯柯林斯公司出版了美国著名的投资专家约翰·但普尔顿所著的《展望未来40年》一书。作者认为，尽管美国在世纪交替之际极力强调要建立一个以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大家庭”，但未来世界将不是一个单一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而是将分裂为以下三个经济实力和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世界，整个世界将更加分化和动荡不安。第一个是发达世界，到2020年，不仅包括现在的发达国家，而且还可能有东亚、拉美和东欧的一些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中国将处在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上，其国民生产总值将仅次于美国而雄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NP仍然很低。第二个是后共产主义世界，这有关俄罗斯的走向，改革成功了，美国和西方将支持它成为一个民主的非帝国主义国家，改革失败了，西方将转而将波兰、匈牙利等国纳入北约，防范俄罗斯可能的扩张。第三个是欠发达世界，到2020年，美国对世界欠发达国家的基本地缘政治战略将是有限的经济和军事介入。坦普尔顿认为，在未来50年中，美国仍将是世界上经济力量最强的国家，但它的经济将受到通货膨胀的严重干扰，在未来30年，美国的就业机会将增加60%，产品和服务质量仍将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是一种“三足鼎立”的看法。

日本有影响的政论杂志《选择》月刊在1993年1月号登载了一篇题为《21世纪仍将是美国世纪》的文章，作者称：“从20世纪最后10年的实际情况看，恐怕可以说至少在21世纪前半叶，将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既不会是日本或亚洲，也不会是欧洲，而仍将是美国。”这是典型的“美国世纪”论。

在中国，近年来，一种广为传播的观点是将美国称为“唯一超级大国”，并在此基础上将当前的世界格局定义为“一超多强”，这种观点难能可贵地从理论上揭示了“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层次性，但却忽视了另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一个国家要强大到何种程度才算是“超级大国”？或者说，“超级大国”与“强国”的区别在何处？另外，这种说法听起来更像是“一超”与“多强”的对垒而不是并存。

无论如何，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将未来世界格局说成是美国独霸天下的“一极世界”，包括那种关于下个世纪仍是“美国世纪”的说法，也并不认为美国可以决定世界的一切，成为世界权力的中心。

现在世界的一切变化都昭示出，未来世界将是一个多极化的格局。辨证地看，多极格局既是一个有层次的力量结构，又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组合，既是现状，又是过程。多层次的组合表现在：每一极自身力量的各个方面是不均衡的，各极之间力量有差异、不是等高的，极与极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等距离的。但多极化格局是在不断变化的，它使得格局内的力量对比日趋平衡，各极之间实力差距越来越小，这种格局也就越来越稳定。

未来多极格局的主体将是美、俄、中、日、德五大力量，美国毫无疑问地将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但它的综合实力较其他各极相对强大，它与另外四极的关系也可能好于另外四极之间的相互关系，它顺应变化的能力可能更强一些。因此，是否可以说。

美国是未来“多极世界中的一极”，而且可以说是“第一极”。

主要参考书目

1. 《美国两百年大事记》[美]加尔文·D·林顿主编，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
2. 《大国的兴衰》[美]保罗·肯尼迪著，中译本，求实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3. 《近百年美国经济史》[美]H·U·福克纳等编著，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
4. 《变化中的美国经济》[中国]章嘉林主编，学林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5. 《当代美国经济》[中国]褚葆一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
6. 《美国总统就职演说》岳西宽等译，北方文艺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
7. 《克林顿传》[美]乔纳森·波蒂斯、查尔斯·艾伦合著，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8. 《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中、下册）[美]阿瑟·林克、威廉·卡顿合著，刘绪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
9. 《美国的历程》[美]J·布卢姆等著，杨国标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11月第1版。
10. 《现代美国：1896—1946年》[美]德怀特·L·杜蒙德著，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1月第1版。
11.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主编的《美国史论文集 1981—198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12月第1版。
12. 《里根和里根总统》[美]赫德里克·史密斯等著，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2月第1版。
13. 《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美]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著，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
14. 《历史的终结》[美]弗朗西斯·福山，美国《国家利益》季刊，1989年夏季号。
15. 《文明的冲突》[美]塞缪尔·亨廷顿，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
16.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美国军事基本情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
17. 新华社《参考资料》、《参考消息》、《瞭望》，世界知识出版社《世界知识》杂志等。

